“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丛书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组织编写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

冯秋婷◎主编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丛书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组织编写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

冯秋婷◎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 / 冯秋婷主编. -- 北京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4. 9. -- ISBN 978-7-5035-7786-4

Ⅰ. D25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第2024Z3E723号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

策划统筹 冯　研
责任编辑 李俊可　魏晋茹
责任印制 陈梦楠
责任校对 王明明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电　　话 （010）68922815（总编室）　（010）68922233（发行部）
传　　真 （010）689228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8 千字
印　　张 24.25
版　　次 2024 年 9 月第 1 版　202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微 信 ID：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邮　　箱**：zydxcbs2018@163.com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丛书编委会

主　任：冯秋婷

副主任：张志明　崔宪涛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少洪　冯秋婷　孙占元　花恒一　李少军　李春林
李　新　邱伟年　张志明　张国玉　郑金洲　郑　寰
赵承松　胡忠昭　祝灵君　徐　闻　奚洁人　郭庆松
涂亚平　崔宪涛　程冠军　曾业松　裴泽庆　潘超英

讲好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丛书总序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丛书缘起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的品牌论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

为更好推进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智慧的领导科学学科发展，推动中国化领导力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经过充分的研讨和论证，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第四届理事会决定自2018年开始主办全国性的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为主题的常设性的大型论坛——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

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党的建设教研部为支持单位，以全国领导科学和领导力学界为主要研究力量，以全国各省市党校（行政学院）以及各省市领导学会为依托，每年举办一届，每届选择在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举办。举办城市的条件为：党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党的重要人物、重要思想、重要精神的诞生地。首届论坛于2018年七一前夕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举行，主题是“时代先锋，民族脊梁”；第二届论坛于2019年七一前夕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地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主题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70年经验和规律”；第三届论坛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主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力”；第四届论坛于党的百年华诞到来前夕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主题是“百年大党卓越领导力”；第五届论坛于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之后，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举行，分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两个主会场，主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第六届论坛于2023年10月在教育培训干部、弘扬沂蒙精神的沂蒙干部学院举行，以“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六届论坛均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产生了较大反响。谢春涛、虞云耀、王蒙、靳诺、李文堂、郑新立、李君如、孙庆聚、罗宗毅、李忠杰、冯俊、李洪峰、王庭大、张首映、王一鸣、唐洲雁、邵维正、韩庆祥、柳建辉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分别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论坛也受到了中央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等主流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发表了许多学者的理论观点。

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的质量，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领导科学发展和中国化领导力建设，2020年9月，在第三届论坛上，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领导学会，中共武汉市委党校，中共南方电网党校，中共国家电投党校，广东省领导科学与组织发展研究会，中共烟台市蓬莱区委、蓬莱区委党校，枫桥学院等单位共同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系列课题研究。同时决定，持续推进该系列课题研究，并在每年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力论坛上发布研究成果。

“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系列课题的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经验，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的壮美画卷、精彩乐章，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内在必然性，形成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战略思考成果，为百年大党和百年强党持续强大和基业长青提供领导力理论支撑、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系列课题研究，既为论坛提供高质量学术成果支撑，同时也更好地推进论坛成果的转化，使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为了开展好课题研究，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组织课题发起和承担单位多次召开论证会、研讨会，各课题参与单位高度重视，主要领导挂帅，组织本领域的专家和业务骨干组成课题组，各课题组进行了广泛充分深入的研究。2021年“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STA009）。经过多方努力，不断有课题结项并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呈现给广大读者。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包括持续举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论坛，以及与这一论坛相适应开展“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系列课题研究，为系统全面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锻造的经验和规律，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力话语体系构建，形成领导力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领导科学发展和中国化领导力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十九大前后特别是近年来，在我们党的话语体系里已经多次出现党的领导力的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提出："实践再次证明，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这表明：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第一大党、第一强党最鲜明的优势和时代特征。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其中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于

我们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我们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讲好中国领导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故事；也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继续讲好中国领导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故事。

冯秋婷

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第四届理事会会长

前　言

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常因惊涛骇浪留下不朽诗篇。从上海石库门到北京天安门，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号”巨轮，作为志在“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历经千难万险，始终初心如磐、矢志不渝，前仆后继、不懈奋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引时代大潮、建千秋功业、变世界格局，充分彰显了强大而卓越的领导力。

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全社会的公信力、凝聚力、动员力、号召力，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面貌，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的面貌，深刻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宏阔的历史视角和深厚的历史智慧，全面总结了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的“十个坚持”宝贵历史经验。在这十条经验中，坚持党的领导是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处于首要地位，发挥统领作用。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展望未来，党的领导、党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仍将是党和国家不断前进发展的定海神针，是中国人民风雨来袭时的主心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

1929 年，在毛泽东主导制定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针对党员质量不够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等问题提出警告，明确指出由于这些原因造成“党的领导力薄

弱”。党的十九大前后，“党的领导力”这一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逐渐多了起来。2017 年 7 月 26—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使用了领导力概念。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党的“四力”，即“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自此，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探讨逐渐增多。2020 年 9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鲜明地作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判断。2020 年 12 月 24—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首次明确提出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条件的论断。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报告，都重申了党的“四力”概念。这进一步推动了各方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问题的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从理论上研究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生成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利于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话语体系，形成本土化的中国特色领导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要确保党长盛不衰、枝繁叶茂，领导力始终无比坚强，也非常有必要认真研究、深入思考、多方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密码所在。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让广大读者从领导力的视角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不动摇，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不动摇。同时，尽可能为广大读者清晰地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的密码，并使读者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怎样认识、提升和锻造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从中找到答案、得到启示。

本书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的思考研究和阐发，主要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强在哪儿？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为什么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怎样强？本书的框架结构也是由这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二、三章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强在哪儿，主要观点包括党的领导力强在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并取得辉煌业绩；强在能够成功应对各种重大关头的重大考验，谱写出一曲曲壮丽凯歌；强在始终抓住关键的政治领导力的各种体现和要求不懈发力，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不断前行。第四、五、六、七、八、九章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为什么强，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有着深厚的根基及丰富的内在保障和支撑，包括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本领的力量、纪律的力量、制度的力量、组织的力量。第十章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怎样强，主要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自我革命、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锻造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本书在写作风格和形式上作了新的尝试，没有采用纯学术的论述形式，而是尽可能以事实说话，用故事讲思想，用史实阐明真理，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文字尽可能生动，以增强可读性。

希望本书能够受到广大读者喜爱，为广大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冯秋婷

2024 年 5 月 11 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 1

一、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判断依据 …… 1

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 5

（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 6

（二）党与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 9

（三）形成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号召力 …… 11

三、创造中国发展奇迹 …… 14

（一）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15

（二）从受奴役受压迫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 17

（三）从贫困到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 …… 20

（四）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 …… 21

四、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 24

（一）从“苦难辉煌”到“为什么是中国” …… 25

（二）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 28

（三）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 30

第二章　重大关头的领导力 …… 34

一、重大关头领导力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 …… 35

二、举旗定向 …… 38

（一）坚持独立自主 …… 38

（二）坚持开拓创新 …… 40
（三）坚持中国道路 …… 42
（四）坚持敢于斗争 …… 43
三、坚定信心 …… 44
（一）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关头的坚定信心 …… 45
（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关头的坚定信心 …… 46
（三）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关头的坚定信心 …… 46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头的坚定信心 …… 48
四、精准决策 …… 49
（一）长征过程中的精准决策 …… 49
（二）上海经济保卫战中的精准决策 …… 50
（三）应对三年经济困难的精准决策 …… 51
（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精准决策 …… 52
五、动员组织协调 …… 53
党领导应对四川雅安7.0级地震的动员组织协调 …… 54

第三章　关键的政治领导力 …… 57
一、政治领导力具有关键性、根本性和统领性 …… 58
（一）政治属性是党的根本属性 …… 58
（二）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 60
（三）党的政治属性和领导作用的实践关乎党的政治领导力 … 63
（四）政治领导力在党的领导力体系中至关重要 …… 66
二、始终把崇高政治理想、政治使命扛在肩头 …… 67
（一）为实现政治理想政治使命不懈奋斗 …… 68
（二）制定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 …… 69

（三）抓好决策贯彻执行 …… 72
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 75
（一）始终坚持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 75
（二）在一切工作、一切任务、一切领域的全过程践行群众路线 …… 79
（三）高度警惕和避免“塔西佗陷阱” …… 82
（四）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 …… 83
四、始终坚持“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 …… 84
（一）“两个维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政治原则 …… 85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协调一致的强大力量来源于“两个维护” …… 86
（三）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 89
（四）提高政治“三力” …… 92

第四章　真理的力量 …… 95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真理支撑和保障 …… 95
（一）1840—1919年期间多种思想武器都败下阵来 …… 96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 100
（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 104
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 108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中国化时代化 …… 108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 112
（三）“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密钥 … 116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 120
（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120
（二）推进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 126
（三）推进领导干部的理论教育 …… 129

第五章　人格的力量 …… 134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人格支撑和保障 …… 134
（一）崇高人格使人发自内心地产生信任和敬意 …… 135
（二）拥有崇高人格才有强大领导力 …… 136
二、党的伟大精神 …… 138
（一）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 138
（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 142
（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精神谱系 …… 143
三、党的优良作风 …… 147
（一）延安与西安两地截然不同的景象与作风 …… 147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 …… 149
（三）党的优良作风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要求 …… 154
四、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 158
（一）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 …… 158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崇高道德的核心 …… 162
（三）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 …… 166

第六章　本领的力量 …… 169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本领支撑和保障 …… 169
（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破解“本领恐慌” …… 170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警惕和破解“本领恐慌” …… 172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警惕和破解“本领恐慌” …… 175
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182
（一）开垦南泥湾解决生存问题 …… 182
（二）建设港珠澳大桥解决大湾区互联互通问题 …… 186
（三）解决实际问题蕴含着丰富的本领和能力要求 …… 188
三、高超的群众工作本领 …… 190
（一）闽西藏着当年红军走群众路线的办法 …… 190
（二）吴金印的群众工作本领 …… 191
（三）马善祥的群众工作本领 …… 194
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 196
（一）重视学哲学 …… 196
（二）实事求是 …… 199
（三）“六种”思维能力 …… 201
（四）抓重点 …… 205
（五）钉钉子精神 …… 207

第七章　纪律的力量 …… 210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纪律支撑和保障 …… 210
（一）纪律严明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 …… 211
（二）纪律严明由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使命决定 …… 213
二、纪律严明得民心 …… 219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民心 …… 219
（二）长征途中严明的纪律形成老百姓对红军的第一良好印象 …… 221

（三）纪律严明为共产党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民心民意…… 223
（四）从农村到城市，党和人民军队以纪律严明赢得民心…… 224
（五）执政之后党仍然以严明的纪律赢得民心 …… 226
三、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 226
（一）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 227
（二）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地重视政治纪律建设…… 228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突出政治纪律建设…… 231
四、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 237
（一）严格执纪一直在路上…… 237
（二）新时代以来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信心推动严格执纪…… 240

第八章　制度的力量 …… 246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制度机制支撑和保障 …… 246
（一）从制度不如人到新制度的探索…… 246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治党及局部执政条件下制度治国的探索…… 248
（三）延安时期制度治党及局部执政条件下制度治国的探索…… 249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252
（五）改革开放后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 253
（六）新时代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254
二、民主集中制 …… 255
（一）民主集中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256
（二）民主集中制为正确决策和有效执行提供了坚强制度保证…… 258
（三）民主集中制能使党和国家的力量强大…… 260
三、科学精准的选贤任能制度 …… 265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干部和人才制度建设…… 266
（二）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选贤任能干部制度…… 268
（三）干部工作各项制度在新时代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71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 275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276
（二）把党的领导这一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277

第九章　组织的力量 …… 284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组织支撑和保障 …… 284
（一）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群众组织起来了…… 285
（二）党能够有效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在于党自身的组织严密和坚强…… 287
（三）党的组织力的含义和特征…… 289
二、组织体系严密坚强 …… 292
（一）组织体系严密坚强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 292
（二）组织体系构建始于建党…… 294
（三）织密组织体系之网…… 295
（四）没有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组织是靠不住的…… 296
三、基层组织坚强有力 …… 297

（一）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298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更加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300
（三）把支部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 302
四、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 …… 306
（一）强化组织观念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重大课题…… 306
（二）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 310

第十章　自我革命的力量 …… 315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在自我革命的淬炼中锻造出来的 …… 315
（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316
（二）党始终重视并践行自我革命…… 317
（三）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321
（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底气在哪儿…… 322
二、持续全面地解决自身问题 …… 324
（一）党一成立就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325
（二）党成熟后更是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328
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 …… 333
（一）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 333
（二）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作斗争…… 337
（三）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 341
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 …… 343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的新境界…… 343

（二）把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根本保证…… 345
（三）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并上升到制度机制层面…… 347
（四）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351

参考文献 …… 354

后　记 …… 362

第一章
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1964年，浙江嘉兴南湖，一片烟雨朦胧之中，78岁的董必武登上了一艘游船，有感而发，挥毫题下此诗。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地方之一。1921年7月，就是在这艘游船上，代表们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展现出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一、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判断依据

2020年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①] 这次讲话首次鲜明地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

力”的科学判断。2021 年 2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明确指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①

领导力是世界管理学界最热门的一个词语，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由于种种原因，对政党的领导力的研究相对薄弱很多，但也并不是没有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作出研究和判断。

从国际范围看，早年，苏联人葛萨廖夫编写《中国共产党简史》，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当今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让越来越多的国际政要和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如：2015 年，美国的“中国通”，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其学术上追求寻找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利用这些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辨别中国真正在发生什么，并把真实的中国故事讲述给世界。他在采访十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后，更加欣赏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感和深谋远虑，以及对国家发展目标的不懈追求，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值得世界欣赏。

同年，美国学者熊玠主编英文图书《习近平时代》一书，专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从哪里来。

2019 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新加坡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与培养》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新加坡教育部人事司前司长吕正扬深入考察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党校的网络架构，围绕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选拔与培养，从思想源头和制度建设、人才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6 日。

培养等角度解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给出了一个新加坡学者的观察和思考。

2021 年 3 月，肯尼亚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在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成就并非一夜之间取得的”，“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屡创中国发展奇迹的要诀”。①

在美欧等西方国家的知名高校和智库，中共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热点，哈佛大学等已成为中共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一个机构有十几个研究中共的教授岗位。虽然他们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仍然存有偏见，但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辉煌成就，无法否认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度空前提升，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的与日俱增。

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党的领导力”这一概念在 1929 年就已经出现。这一年的 7 月 20 日至 29 日在福建上杭县蛟洋学校举行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红四军前委决定召开的，并派毛泽东、江华、蔡协民三人前来指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次大会，集中讨论了政治问题和土地问题，讨论并通过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为闽西党和人民制定了明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决案中，有一条是这样写的：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像一盘散沙。这是

① 杨臻：《全球连线：“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屡创奇迹的要诀”——访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新华网，2021 年 3 月 29 日。http://home.xinhua-news.com/gdsdetailxhs/share/9180713-?pageflag=iframe.

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党的重要文献中，最早见到的“党的领导力”概念。

时隔88年后，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后，党的领导力概念开始多次出现在了党的重要文献中。特别是2020年以来，面对抗击新冠疫情，面对全面脱贫攻坚，习近平总书记在几次重要讲话中都谈到了党的领导力，并鲜明地作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判断。

在我国，党的领导力特指作为国家和民族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族人民和国家各类组织、各项事业、各项工作施加影响而发生的一系列正向、积极变化的合力。这里说的一系列正向、积极的变化，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两个方面，具体说就是党的主张得到人们的接受并使其在现实中得以实现。这里说的合力，包括党的领导力的内容合力，如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等的合力；也包括党的领导主体——党的各级各个组织、党的干部、党员软权力（含能力）、硬权力等的合力，如党的组织力、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执行力等的合力；还包括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领导客体的人民群众相互作用对客观世界改造的合力。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根据什么作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科学判断？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用什么来判断、检验党的领导力的强弱。这个问题，说到底，是看领导效果、领导成就。具体来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看：一是看是否有追随者，尤其是看追随者的多寡、被影响的程度如何；二是看是否有业务和事业发展的绩效，尤其是看绩效的大小，是否持续地取得骄人的业绩。此外，判断党的领导力强不强，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值得重视和关注，就是领导力的方向维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作用的方向，就是实现党的政治追求、政治目标、

政治使命，简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党的领导的一切工作、一切努力是不是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来越近了，这应该是极其重要的考量标准。

以这样的效果框架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必然得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的判断。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任何其他力量无可比拟的领导效果和领导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没有群众的追随、拥护和支持，就没有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没有党的领导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就明确提出“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1929年7月20日至29日，一场由毛泽东亲自指导的大会在上杭蛟洋镇蛟洋村的文昌阁召开。这场大会就是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它所制定的闽西党的总路线即：“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1]可见幼年时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的重心是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正因为这种自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彰显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1] 林蕴晖主编：《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毛泽东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住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写于1930年。当年，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以伪江西省主席、国民党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总司令官，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毛泽东、朱德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的一、三两个军团一举击溃敌军并活捉张辉瓒及敌部9000人，歼敌军一半以上，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胜利之后，毛泽东挥笔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的“词眼”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毛泽东之所以确定

这个战略方针，源于他对中国革命重心的英明判断。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强调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令人惋惜的是，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有力地回应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指出“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①]，强调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它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指向问题。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错误：第一，在国民党问题上，党中央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始终没有当“主人”的思想；第二，在农民问题上，党中央不支持农民革命；第三，在军事问题上，“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毛泽东同时强调“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党“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强调，党今后的任务是“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实现这一斗争策略的具体方针是：第一，要更加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第二，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第三，要在暴动中组织共产党人占多数的、工农民权独裁的临时革命政府，并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等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

个议决案。

会议提出“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要由下而上地注意争取群众”，通过《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核心问题是组织和领导群众，争取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930 年 5 月毛泽东作了《寻乌调查》，10 月作了《兴国调查》，两个调查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彻底了解了中国农村经济和阶级状况，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实践路径、思想方法和理论基础。

党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有一支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组建的人民军队，首次出现“红军”的称呼是 1927 年 11 月的黄麻起义。同年 12 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首举“工农红军”旗帜。192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的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 年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这支军队就是当今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雄壮之师而闻名世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举行，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明确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古田会议决议》还指

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 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保证了这支军队真正成为人民军队，保证了这支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人民子弟兵”。

（二）党与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时十分感慨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陈毅元帅曾感慨地认为，沂蒙人民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纵观中国革命史，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人民用小船划出来的、用小车推出来的、用小米养育出来的。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②] 解放战争时期，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缩影。沂蒙根据地 420 万人口，120 万人拥军支前，20 万人参军参战，10 万革命先烈牺牲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

诞生沂蒙精神的革命老区临沂是一片英雄的土地，这里有用乳汁救活伤员的“沂蒙红嫂”明德英，有“肩扛火线桥”的李桂芳，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 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新时代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案例选编》，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91 页。

“支前英雄群体”陈毅担架队，有为了中国革命奉献了无私无畏之爱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祖秀莲，有拥军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有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渊子崖村……

在革命老区临沂，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解放战争时期，一个外国战地记者随国民党部队采访，在一次战斗中，国民党的这支部队被我军打败了，这个外国记者和一个国民党兵与所在部队失去联系，饥饿难耐，跑到一个村口找食物，一个老乡警惕地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国民党兵谎称自己是共产党。老乡一听是共产党，激动地说：“你们等着，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吃的。”老乡离开之后，外国记者不解地问国民党兵：“你明明是国民党，为什么说是共产党?”国民党兵回答说：“如果说是国民党，老乡不仅不给找吃的，还会打我们。”外国记者反问道：“你们国民党不是合法政府吗？老百姓为什么不欢迎你们合法政府，反而欢迎‘共匪’?”后来，这个外国记者终于想明白了，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必败无疑，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人民。”

1947 年 5 月发生在临沂革命老区的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全歼了国民党王牌师“74 师”，成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重要转折点。是什么力量让处于弱势的解放军在 3 天之内就消灭了敌人 3.2 万人？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个“火线桥”的故事。

孟良崮战役打响之后，解放军有一支部队需要迅速渡过汶河作战，但是河水汹涌湍急，过河的地方又没有桥梁。怎么过河？需要地方的老百姓修一座桥，但是村子里的男人都去支前了，只剩下老弱妇孺，怎么办？“没有桥腿用人腿，没有桥板用门板”，担任艾山乡妇救会会长的李桂芳与大家商量之后，想出了一个办法：时间不等人，来不及修桥，就架起一条人桥！于是她迅速发动村里 32 名妇女拆掉各自家里的门板，大家扛起门板，齐刷刷地跳进冰冷的河里，硬是用身体当桥墩架起了一座“火线桥”。主力部队的子弟兵一个个抹着眼泪从这座人桥上过了河。一座“火线桥”，架起了军民连心桥，彰显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所体现的党与人民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打败日本侵略者，赶跑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

反观国民党，恰恰走的是一条与共产党相反的道路。孙中山先生临终曾留下这样的遗嘱：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然而，之后的国民党却忘记了这个初心，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走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成为人民群众的敌人。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与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因此人民群众不欢迎执政党国民党，反而欢迎这个被国民党称为“共匪”的共产党。一个无法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干”的党，是无领导力的党，只能以失败告终，退出历史舞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且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

（三）形成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号召力

成为执政党以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在我们这个地域差异巨大、多民族且疆域辽阔的大国形成

了前所未有的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和号召力。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球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同心圆，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通俗易懂的代名词。

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2016 年 11 月，美国洛杉矶“2016 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传来消息：中国首部数字陇剧电影《陇上的梦》获得本届电影节“入围奖”。《陇上的梦》所讲述的是革命老区残疾乡村教师张学成的感人事迹。张学成是甘肃省陇东革命老区庆阳市镇原县殷家城乡李园子的一名小学教师，他下肢瘫痪，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在山区教坛上辛勤耕耘，被人们誉为“教坛保尔”。1971 年，18 岁的张学成被聘为乡民办教师。正当他在三尺讲台上大显身手的时候，一场疾病致使他下肢瘫痪。从此，他就和命运展开了抗争，每天早晨，鸡一打鸣他就从炕上爬起来，拄着拐杖，翻山过河，沿着十里羊肠小道去给学生上课。1993 年以后，他的病情加重，无法独自往返学校，他就让妻子白富秀牵着毛驴接送。从家里到学校十多里的陡峭山道上，有一道深沟，毛驴是过不去的，过沟的时候，白富秀就把丈夫从毛驴背上抱下来，自己“驮”着丈夫过沟。几

①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 年 11 月 30 日。

十年来，白富秀已记不清“驮”着丈夫到底走过多少回，也记不清自己流过多少汗，摔过多少跤。如今已经头发花白的张学成，虽然要依靠双拐行动，但一说到学校和孩子们，他与妻子白富秀的脸上马上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张学成每个星期一都要在学校举行升国旗的仪式！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像张学成这样一个身患残疾的乡村教师，以及白富秀这样一个乡村妇女，是什么力量在支撑他们？这就是在中国的西部，在黄土高原的陇上，身患残疾的乡村教师张学成和他的妻子有一个梦，这就是他们要为山村的孩子撑起美好的明天。张学成的梦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他的梦也是乡村孩子的中国梦！

中国梦画好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同心圆，有了这个同心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就发挥到极致，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和号召力就得到空前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就更加坚强有力。

这里说的党的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形成和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党不断完善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形成协调一致实现共同目标的工作格局。

第二，在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团结合作，为共同的目标团结奋斗。2018 年 3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参加联组会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

型政党制度。

第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20 世纪 50 年代，新疆有位库尔班大叔，多次想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毛主席，成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2017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库尔班大叔的后人回信，勉励他们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正是党的全社会、全民族的公信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形成和不断增强，实现了党中央有号召、人民群众有行动，上下协同、步调一致，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这种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使得我们在面对新冠疫情时，能够形成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各行各业各类组织、14 亿多中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的强大合力。在 2020 年 4 月武汉解封后不久，西方学者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网上一对一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达 98%。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之前没有哪个国家的老百姓的信任程度达到这个高度，今后也很难有哪个执政党的信任度超过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这一信任度。

目前，在世界上，如此强大的合力还是绝无仅有的。有了这种合力，不管前进路上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都难不倒中国人民，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三、创造中国发展奇迹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

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这些重大成就给我们四点重要启示。

（一）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一个怎样的历史跨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我国百业凋零、一贫如洗，经济基础极为薄弱。当时我国的“人均钢铁产量只够打一把镰刀”，连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制造不出来。自 2010 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

2023 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超过 32380 亿美元，连续 18 年稳居世界第一。

粮食总产量由 1949 年的 11318 万吨，提高到了 2023 年的 69541 万吨。

2023 年我国钢材产量超 13.6 亿吨，比 1949 年增长了 8606.59 倍。

2023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 15.9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4.5 万公里，电器化率达到 73.8%。

如果说上述一组组数据还不能使你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系列的巨变的话，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海尔智家”“全球店王”切实感受一下中国的巨变和中国人的美好生活。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要靠进口，并且进口量也少得可怜，原因是我们既不会造，也买不起。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家电行业的引领者。中国海尔已经成功收购了日本三洋机电、美国通用家电、新西兰斐雪派克等世界品牌，

一跃成为全球白色家电的引领者。下面就让我们来体验一下海尔智慧家庭场景：无论你是在出差回来的归途，还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只要通过手机告知智慧家庭管家——“海尔小优”你的回家时间，“海尔小优”就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安排妥当。当你推开家门的时候，智能空调已经调节到了你习惯的温度，甚至调整了空气的湿度和含氧量，电视开始播放你上次没看完的节目；如果你想冲个澡，浴室里的热水器估算好你每天洗澡的时间，水温调到了你喜欢的温度……当你早晨起床时，窗帘会为你自动打开，饮水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需要的温开水；当你走进洗手间，浴室镜会告诉你今天的天气情况，包括你今天的体重；当你来到厨房，冰箱已经为你准备好今天的菜单，并提醒你肉蛋奶和蔬菜的比例应该如何调配和下单购买；当你来到客厅，电视机会为你提供今天的新闻资讯，并随时按照你的口令切换频道；当你吃过早饭，准备上班时，你只要说一声“小优，小优，我要出门啦”，智慧管家“小优”就会为你关闭电视机、关上灯、拉上窗帘……这就是海尔智慧家庭为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①

2020 年岁末，位于中国首都北京 CBD 的华贸中心的“中国店王”北京 SKP 传来喜讯：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不利形势下，北京 SKP 逆势奔腾，2020 年销售额高达 177 亿元，成为全球第一，“中国店王”成为全球“店王”；2021 年和 2022 年进阶至 240 亿元，2023 年超过 260 亿元，连续 4 年稳居全球第一。华贸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100 亿元，是由国际写字楼、酒店、商城、公寓、广场等组成的高端城市综合体。自 2007 年投入运营以来，华贸中心推动了北京 CBD 东扩，改变了首都的城市格局，树立了国际化新地标，形成了世界级商圈。华贸商圈引入华贸丽思卡尔顿、JW 万豪两座国际五星级酒店，集聚了 2000 个著名品牌，主力店北京 SKP 自 2011 年即成为“中国店王”，连续 13 年蝉联中国百货单店销售额第一名，2019 年销售额达 153 亿元，位居全球第二。2020 年，北京 SKP 远超过英国哈罗德百货，成为全球第一。华贸商圈在这片约 230 亩的土地上打造了城市综合体的世界第一品牌，产生了全球最优质的 GDP，引领了世界潮流。华贸中心，为我们提供了时尚领导力的“中国方案”。①

① 程冠军：《海尔智家：推动家庭领导力的革命》，《中国领导科学》2020 年第 3 期。

70 多年时间，我国从白手起家到赶超世界、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建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0%左右。

（二）从受奴役受压迫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发出这样的感慨，“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②

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真正成为国家主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

① 程冠军：《华贸商圈：全球“店王”诞生之谜》，《企业管理》2021 年第 3 期。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中国制度面对面：理论热点面对面·2020》，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7 页。

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同时，人民群众还可以通过听证会、电视网络问政、政务公开、领导热线、监督举报和意见征集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比如2019年10月31日至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最后共有约4.7万人提出超过5.7万条意见，未成年人的意见占近一半。其中很多意见得到吸收和采纳，使这两部关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更加完善。

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中，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保证了过程民主和结果民主、形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统一，避免了西方国家“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进入休眠期”“国家权力被少数精英所把持”“政党轮替利益分赃”的虚伪民主。

民主选举全过程。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在县乡直接选举、省市间接选举的基础上，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在35个选举单位选出2980名全国人大代表。我国现有五级人大代表262万多名，其中乡镇级188万多名、县级59万多名，约占代表总数的94%。他们都是被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民主性、广泛性毋庸讳言。

民主协商全过程。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通过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把各方面的智慧和意愿凝聚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民主决策全过程。在我国，任何一项关乎全局的重大决策，都是经过充分的民主程序，最大限度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出的。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起草文件之前，中共中央就向各地各部门征集了109份意见建议；起草过程中，多次书面或召开会议征求意见，收到118份反馈意见和10份发言材料，共提出修改意见1948条，其中很多意见对《决定》的修改完善起到重要作用；全会召开期间和闭幕后，起草组对代表们在会上提出的意见进行了研究和吸收，力求使《决定》最大限度体现全党意志。

民主管理全过程。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工会都会定期组织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事关职工利益的重要事项进行研究讨论；在社区和农村，也通过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和管理辖区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住在哪里，都有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机会和渠道，“人人都是主人翁”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民主监督全过程。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构建起一张严密的监督“天网”，确保监督全覆盖无缝隙全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1949年9月下旬，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进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召开，商讨新中国成立大业。自此以后经过70多年的探索，我国政治民主制度体系日益健全。在根本制度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基本制度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重要制度上，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89年11月，当150多公里的柏林墙开放时，西方世界为之欢呼，称其为西式民主自由的胜利。西方甚至还有人鼓吹，社会主义的命运行将终结，西方民主制度已经站上了历史巅峰，成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终模式。

30多年过去了，今天当人们回首这一历史事件时，却看到了与西方人的预想大相径庭的情形：西式民主并没有高歌猛进，并没有成为解救世界的灵丹妙药。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因其高效、广泛、真实等鲜明特点，成为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星空中最耀眼的星簇。

（三）从贫困到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

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均仅209公斤原粮，许多人处于挨饿状态。解决吃饭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要紧的大事。中国在1955年不得不实行粮票制度，这也成为粮食短缺时代的历史印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脱贫致富，国富民强，成为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经过7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巨变。

民生改善有力度。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政策制定、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民生问题，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个一个解决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上至108岁的老人，下至出生仅30个小时的婴儿，我们不放弃一名患者，不放弃任何希望，一个个“生命奇迹”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

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摆脱贫困一直是困扰全球发展和治理的突出难题。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一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我们积极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履行减贫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做世界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纵览古今、环顾全球，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脱贫，这个成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四）从绿化祖国到美丽中国

2019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过跟踪地球研究20年之后发现，过去近20年来，全球植被面积“逆势上涨”，新增超过200万平方英里，约合5.18亿公顷，这相当于地球上多出一块亚马逊雨林，其中1/4的增长要归功于中国的植树造林工程。研究报告指出，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1/4来自中国，中国新增植被面积中有42%是森林，贡献

比例居全球首位。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球也不是一天变绿的。新中国成立之初，长期经受战火蹂躏的国土千疮百孔，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只有8.6%，导致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自然灾害频发。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①。满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成为摆在新生的共和国面前的头等大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成为一项迫切任务。1955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1958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②改革开放伊始，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启动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1982年，邓小平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③，并多次阐述绿化祖国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情，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
② 许耀桐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严格防治大气污染、严厉惩处环境违法犯罪、建设完整的制度体系……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加速前行。60余年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级党组织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期接着一期建，用智慧和双手在世界的东方筑起了“绿色长城”，打造了地球的“绿飘带”，织就了一条美丽的“绿围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矗立起两座具有代表性的精神丰碑，一是“塞罕坝精神”，二是“右玉精神”。

塞罕坝：荒漠沙地变身地球“绿围巾”。河北塞罕坝林场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塞罕坝林场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塞罕坝”是蒙汉合璧语，意为“美丽的高岭”。清朝康熙皇帝曾在此设立木兰围场，那时的塞罕坝“落叶松万株成林，望之如一线”。然而，随着清朝的衰亡，塞罕坝这片美丽的绿洲也随之被破坏。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的景象是“尘沙飞舞烂石滚，无林无草无牛羊”。1961年，负责考察塞罕坝的领导发出这样的誓言：“共产党为老百姓谋福利，就得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第二年，塞罕坝林场正式成立。60余年来，一代又一代塞罕坝林场干部职工不忘初心、艰苦奋斗，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成功培育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今天，塞罕坝林场的林地面积，已经由建场前的24万亩增加到目前的112万亩，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如果林木按一米的株距排列，可以绕地球赤道整整12圈，足足可以给地球系上12条漂亮的“绿围巾”。

右玉：沙漠风口变身“塞上绿洲”。右玉县位于晋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是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全县国土总面积为1969平方公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县仅有残次林 8000 亩，林木绿化率不足 0.3%，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经过右玉人民 70 余年坚持不懈造林治沙，坚忍不拔改善生态，如今全县有林面积达 160 万亩，林木绿化率达到 54%，变成了闻名全国的“塞上绿洲”。“右玉精神”就是坚持不懈的“种树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主政浙江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必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更加自觉地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70 余年间，中国共产党人以对人民负责、对中国负责、对大地负责、对地球负责的初心和使命，正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美丽中国，并且为美丽世界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中国国际地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之前，近代中国一直未能得到世界各国应有的尊重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尊重。经过 70 多年的艰苦奋斗和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小，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西方，成为独立自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2020 年，我国成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并积极参与和开展抗疫国际合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今天，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试看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中国人不仅可以登上世界舞台，而且终于在世界舞台上挺直了腰杆，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以此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一）从“苦难辉煌”到“为什么是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于 2009 年出版了一部引发较大社会反响的专著——《苦难辉煌》。该书全景式地揭示和剖析了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攸关之际通过万里长征的炼狱，通过严酷的围堵、不尽的跋涉、惊人的牺牲、无情的叛变形成的地狱之火，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浴火重生。中国共产党人以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坚韧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进程。

后来，金一南又一部著作《为什么是中国》再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原因是这部书深刻解读新中国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力量，倾心讲述中华民族重要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故事，回答“为什么是中国”这一历史之问，为党和人民提供强大的精神激励。全书以甲午中日战争至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间的历史事件为研究材料，深刻剖析了近现代初期的中国破碎山河中的世道人心，回顾了歧路惶恐间的挣扎徘徊，阐释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自觉，解读了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钩沉了中国崛起征途中的博弈较量，历数了改革强军的挑战与机遇，瞻望了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向，向读者生动客观地阐述了中国从百年沧桑到民族复兴的辉煌道路。《为什么是中国》一书中还特别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2015年访美时，金一南与90多岁的基辛格先生会谈，谈话中，当基辛格得知此时站在眼前的人，43年前只是一个小学徒，如今却能与他在一起面对面会谈，表示很惊讶。基辛格把身体转向会谈桌斜对面的金一南，鞠了一躬，说：“现在，为43年前那次耽误你上班，我在这里向你正式道歉。”此事过后，金一南常常在想：基辛格凭什么给我鞠躬道歉？因为我背后是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百年对比，生成了当今的中国；百年对比，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中国；百年对比，让中国重新回到人类世界的巅峰。①

为什么是中国？因为今日中国与昨日中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共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从

① 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

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2012年11月以来，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这四大成就，可以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即：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① 这四大成就，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回想100余年前的中国，那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1921年中国的春天，华北五省出现饥荒，赤地千里、村庄颓败。叠加在天灾之上的，还有人祸。皖系军阀刚刚在战场上被击败，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又因为争夺胜利果实而撕破脸，新一场大战已经酝酿多时。打赢的要征饷，打输的要抓丁，“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官过如剃”从来就不是一句玩笑话。

民生苦不堪言，国家更是如此。1919年的巴黎和会，虽然中国小心翼翼“站对了队”，并且向欧洲战场派去30万劳工，但是身为战胜国，却比某些战败国还要惨。1921这一年，胶州湾已被强占长达7年，日本人专营的鸦片馆和日语学校开到了青岛的大街小巷；这一年，北方再次陷入新的边疆危机，由于政府毫无控制能力，一个沙俄破败贵族都可以兴风作浪挑唆分裂。

当年还没有GDP的概念，如果有，这个国家的GDP和它的人口之比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笑的笑话。当时的西洋人、东洋人甚至南洋人都是需要仰视的对象，有钱人最好的前程是出国留学，没钱人则冒

① 曲青山：《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光明日报》2021年2月3日。

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去当华工……但无论他们多么勤劳踏实，都将承受歧视。

甚至连爱因斯坦都不能“免俗”。在访问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上海的时候，这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这样描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勤劳、肮脏和迟钝’——连中国人的小孩也是如此。”

历史的洪流托着嘉兴南湖上的一条小船向前奔涌，无数人在耻辱中奋起，无数人在战火中抗争，无数人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紧紧相连，数以亿计渺茫微薄的力量汇聚起来，支撑着贫弱衰微的国家垂死求生，而后一点点挺直腰杆，一步步开辟新路，一天天强盛壮大。

穿越一百年岁月的浩荡前行之后，中国共产党给了世界答案——今天的中国终于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二）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

在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5月2日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向航天战线全体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并向他们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9年来，从天宫、北斗、嫦娥到天和、天问、羲和，中国航天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梁、担重任，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一封回信，殷殷嘱托，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殷切期望，尤其是建设航天强国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航天事业一无所有。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战略家的眼光，着眼于国防建设、国家安全、世界和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决定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航天事业。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航天科学家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航天建设这一伟大事业。他们带领中国航天人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较少的物质投入和较短的研究时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接连攻克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创造了中国航天乃至世界航天事业的奇迹。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航天人的不懈求索，中国航天事业今非昔比，中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航天大国，并且正在由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

中国的航天事业经过60余年的发展，取得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三大成就。三大成就来自中国航天人筚路蓝缕的艰辛探索，在探索中，中国航天不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道路。航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航天道路助力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就航天道路。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科学谋划，作出建设航天强国的战略部署，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有力地推进一系列重大航天工程。航天科技面向科技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坚持不懈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取得长征五号等新一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中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探月工程圆满完成“绕、落、回”三步走战略，天问一号圆满完成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羲和号”成功发射等一系列世界领先成果的基础上，加速推动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和大推力固体运载火箭研

制、下一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深化研究和技术攻关、中国空间站建设和运营、下一阶段月球和行星探测工程等，不断强化进入空间、利用空间、探索空间的能力，全面提升中国航天的国际竞争力。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力争到2030年跻身世界航天强国行列。随着近年来中国航天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在一些前沿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我们离航天强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当前我们正在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新征程中奋力前行，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航天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中国人的航天强国梦一定会实现。

（三）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2022年2月20日晚，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中国首都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出席闭幕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致辞中说，本届冬奥会奥运村独具匠心，场馆令人叹为观止，组织工作非凡卓越。我们要向北京冬奥组委、中国政府部门以及我们在中国的所有合作伙伴和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冬奥会，我们欢迎中国成为冰雪运动大国。

① 吴燕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航天强国重要论述为指引　奋力谱写航天事业发展新篇章》，《党建》2022年第6期。

从2008年百年奥运梦圆，到2022年与奥林匹克运动再度携手，北京成为历史上首座“双奥之城”。16天里，北京见证了竞技体育的荣耀与梦想，凝聚了人类社会的团结与友谊。五环旗下，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运动员奋力拼搏、挑战极限、超越自我，刷新了2项世界纪录和17项冬奥会纪录，奏响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华彩乐章。中国克服疫情影响，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会付出巨大努力，一流的比赛场馆设施，出色的组织服务工作，赢得了奥林匹克大家庭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代表团以9金4银2铜刷新了单届冬奥会获金牌数和奖牌数两项纪录，名列金牌榜第3位，创造了自1980年参加冬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①

“双奥之城”北京见证了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又一个辉煌时刻。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揭开了中国体育事业新的一页，这一题词也成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1959年，新中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同年，容国团获得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此后中国乒乓球队荣获三连冠；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利用“乒乓外交”率先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小球转动了大球”，推动了世界形势的发展。1984年，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为中国赢得了第一块奥运会金牌；1990年，中国成功举办了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在人类奥运百年史册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① 《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人民日报》2022年2月21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以及体育对外交往等各方面协调发展，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体育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竞技体育成绩显著，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在国际大赛中屡创佳绩，展现了民族精神和中国气魄；体育产业快速发展，体育消费不断扩大；体育改革不断深化，发展机制更加健全；以成功申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积极开展体育文化交流，传递中国体育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

为进一步明确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措施，充分发挥体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2019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远景目标，擘画了“十四五”时期及更长远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站起来的中国人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富起来的中国人撕掉了“一穷二白”的标签，强起来的中国人正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新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 100 余年的不懈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切被外国经济学家称赞为“绝对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被外国历史学家感叹为“一个巨大的组织奇迹”；被外国政治学家评价为“中共治国理政智慧独一无二”。这一切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现在，中国共产党

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中国未来的发展必将进一步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第二章

重大关头的领导力

1927年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省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是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因为，就在10天前的9月9日，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秋收起义严重受挫。到达文家市时，工农革命军的人数已从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此时的起义军究竟何去何从？是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执行中央原来的决定继续进攻长沙，以免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等人，打着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旗号，要求“取浏阳直攻长沙”。团长苏先俊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

针对这些意见，毛泽东详细地对客观形势做了分析。最后，在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再图发展。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几经奋战，抵达江西井冈山茨坪，建立了我党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始从罗霄山脉不断发展壮大。

这次转兵，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实现了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揭开了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显然，在重大关头、重大考验面前，毛泽东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重大关头领导力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

2020年12月24日至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他在会上讲道：“实践再次证明，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是最关键的条件，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①]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重大关头重大考验面前领导力的极端重要性。

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走过了100余年艰难曲折而又光辉灿烂的历程。回首百余年历史，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无论哪个阶段，在取得辉煌成就的背后，都有这样那样的关头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

历史转折的时刻是关头、是考验。比如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由农村到城市的转折点。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经济到社会主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5日。

义市场经济的转折点。进入新时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折点。

挫折曲折的危局是关头、是考验。比如大革命失败关头及其考验。北伐战争胜利前夕，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亦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失败，党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党员人数从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中国革命向何处发展？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该怎样走？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关头及其考验。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博古、李德等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革命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1月，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进行异常艰苦长征的红军，到达湘桂边界的湘江。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在这里打响。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何去何从？

敌强我弱的险境是关头、是考验。比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做出很大努力，但国民党政府拒绝和平民主要求，公然发动内战。当时，国民党军队有430万人，人民解放军只有127万人。国民党军队拥有飞机大炮等各种先进武器，人民解放军主要依靠“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政府控制各大城市、交通干线以及绝大部分近代工业，统治着全国3/4以上的地区，还得到美国的巨大援助；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再比如1950年夏，美国乘

朝鲜内战之机，纠集了十多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出兵干涉朝鲜内战。不久，美军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图们江边。与此同时，美国军舰炮击我商船，美国飞机轰炸我边境城镇，形势极其危急。不仅朝鲜人民面临灭顶之灾，新中国的独立和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重大自然灾害也是关头、是考验。比如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食品供应极度短缺，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后来又有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1998年入汛后国内一些地方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长江发生继1954年以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给灾区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直接影响。2008年初，南方大部分地区遭遇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大面积雨雪冰冻灾害，5月12日四川汶川又发生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特大地震。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8月8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2020年，又突发新冠疫情，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国际局势巨变还是关头、是考验。比如1989年到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对我国在政治上施压，在经济上搞所谓“制裁”。又如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2008年9月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再如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战升级，中美关系日趋紧张，并由此带来世界形势复杂多变。

令人惊叹的是，中国共产党一往无前，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关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验，抵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不是靠别的，而是靠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概括起来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特别是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对中国共产党闯过难关、经受考验、抵御风险发挥了关键性决定性作用。

所谓关键性决定性作用，说的是事物发展变化最为紧要的因素，对产生某种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特别是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紧要关头，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机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因素。那么，在重大关头和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通过哪些表现得以实现呢？归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举旗定向，二是坚定信心，三是精准决策，四是动员组织协调。

二、举旗定向

旗帜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应对重大历史转折时刻以及复杂国际变局关头的考验，首先是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问题上，总能作出正确抉择，这就是举旗定向。那么，举旗定向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又是怎样体现和实现的呢？

（一）坚持独立自主

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数会议都要有共产国际代表出席，遇到重大问题要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解决，完全

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办事，结果导致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遭到重大挫折。比如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共产国际一味强调攻占中心城市，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大多数起义都失败了。由此，我们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而能否做到独立自主，关系党和革命的生死存亡。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1934 年 10 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中央红军顺利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来到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欲渡湘江，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命令中央军、湘系、粤系、桂系的 25 个师共 40 多万重兵赶往湘江两岸，组成第四道封锁线，妄图把红军歼灭。湘江血战，五个昼夜，战斗之后，红军从出发时的 8.6 万余人锐减至 3 万余人。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文献记载，遵义会议作出以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是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事实上的军事指挥者，在党和红军的重大决策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此后，经过一系列调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逐步形成。党在军事上也开始掌握主动权，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使得红军基本摆脱了险境，摆脱了长征以来被人追打的局面。邓小平见证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发挥核心作用的一幕幕。他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和我是

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①

遵义会议的重大成果，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在最危急关头拯救了党、拯救了红军、拯救了中国革命。1963 年 9 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指出，“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② 从那以后，独立自主的意志逐步镌刻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心中，党始终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信邪、不怕压，把中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百折不挠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坚持独立自主并不是自我封闭、盲目排外，而是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特别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二）坚持开拓创新

党在百余年奋斗中，特别是在重大转折关头，始终坚持开拓创新，

① 求是杂志社调研组：《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求是》2021 年第 8 期。

② 求是杂志社调研组：《中国革命从这里转折——从通道转兵到遵义会议》，《求是》2021 年第 8 期。

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的两三年间，出现了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似乎已经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1929 年 6 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 6.9 万人，1930 年 3 月又增加到 10 万多人。1930 年底，党在全国 17 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这期间，各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1927 年 9 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与会大多数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支持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正确主张。会后，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后来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将这一经验进行总结，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依托根据地积累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党进行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严重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

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的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蓬勃生机，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我们党始终坚持的开拓创新，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是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清醒的创造创新，是立足中国实际坚持并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创造创新，是饱含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最真挚最深厚的爱的创造创新。

（三）坚持中国道路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历程，每当我们改革发展遇到关卡，面临历史性关头的时候，就会遇到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追问和选择：是走“老路”“邪路”，还是走“新路”？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遇到了这样的追问和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以大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

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内外政治风波发生后的中国，遇到了这样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遇到了这样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又一次遇到了这样的选择。选择的结果，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每当我们的改革发展遇到重大历史考验，面临道路的方向性选择和历史性考验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党都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高举人民至上的旗帜，选择的坚持的都是走“新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选择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选择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坚持，为化解中国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解决各种难题提供了道路指引。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四）坚持敢于斗争

一方面，没有斗争，就没有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正确抉择；另一方面，党作出正确抉择后，依然要英勇顽强，依靠斗争战胜艰难险阻。

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

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

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斗争，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①]。

在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具有的举旗定向领导力，特别是党中央具有的举旗定向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就像“定海神针”一样，使全党在重大关头有了凝心聚力的“主心骨”，保证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行。

三、坚定信心

梁启超曾说过：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以无自信心，每处一事，既看得透彻，自信得过，则以一往无前之勇气赴之，以百折不挠之耐力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溃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于脚下，而不改其容。有了信心和勇气，才能心有定力、从容应对，拿

①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3日。

出办法、共克时艰。但如果失去了信心和勇气，即使有条件战胜困难、考验，也会坐失良机，留下可悲可耻的印记。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考验、多么大的困难和危机，信心总是比黄金更重要。千难万难坚定信心就不难，只有坚定信心、勇往直前，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没有信心，就没有动力，没有拼劲。中国共产党重大关头领导力的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第二个表现就是坚定人们的信心。面对重大关头的各种困难、危机、考验，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够及时传递攻坚克难、化危为机的坚定信心和力量。这里仅举几例。

（一）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关头的坚定信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当时，在强敌进攻面前，党内和军内弥漫着悲观情绪，怀疑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前途，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利用难得的战斗间隙，秉烛夜书，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中写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孕育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①]。从而一扫质疑革命的阴霾，打破了当时党内、军内对革命前途悲观和迷茫的情绪，坚定了党领导广大军民为理想信念继续奋斗的决心和信心，有效激励了广大苏区军民为革命胜利前赴后继、甘于牺牲。不到两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在瑞金成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关头的坚定信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攻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严重扰乱抗战军心民心。1937 年 9 月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1938 年三四月间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于是又有人高唱迅速击败日本的中国“速胜论”。为彻底批驳“亡国论”“速胜论”，1938 年 5 月毛泽东开始废寝忘食地写作。经过不分昼夜的反复修改，《论持久战》如及时雨般问世。《论持久战》有针对性地驳斥了彼时甚嚣尘上的“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预见了战争的前景和进程，提出了在战争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通过持久战不断削弱日军优势、壮大和发展自己的有生力量、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策略，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三）国际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关头的坚定信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事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共产党数量从 180 多个降至 130 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从 15 个减少到 5 个。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严重挫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此时，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一时间，全球范围内都在说“社会主义失败了”“马克思主义不灵了”。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我们党能不能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这又是一个考验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关口。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应对的重大举措也是坚定人们的信心。

1992 年 1 月，邓小平乘坐专列从北京南下，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重要谈话，给人们最大的印象，或者说传递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坚定信心。

他强调我们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他着力强调坚定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1992 年 3 月 26 日，《深圳特区报》率先发表时政性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集中报道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加快改革，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他特别强调坚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信心。他说：“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② 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

他还强调坚定人们对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信心。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82—383 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30—431 页。

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①

正是这些重要讲话，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信心，激发了攻坚克难的勇气和意志，不仅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而且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迎来连续两个十年翻两番的经济发展奇迹，2010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党和国家事业各个方面也大大推向前进。与此同时，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经济风险，战胜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成功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头的坚定信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历史关头，面对前所未有的可预见以及不可预见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应对的重大举措依然是坚定人们的信心。比如，大力解决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以及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口是心非、擅自行事等问题，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党自身和党的领导的信心。比如，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

这一切保证了全党和广大人民在重大关头获得了强大的精神支柱，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0 页。

并由此产生和释放出一往无前、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强大意志、巨大勇气及能量。这一切也充分说明，坚定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关键性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关头严峻考验的重要法宝。

说到信心，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特质。这一点，就连不赞同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的胡适也不否认，他说：共产党人意志的专笃，“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四、精准决策

精准决策，就是正确、精确、准确地决策，就是能够有针对性、有效地解决面临的困难、问题的决策。从一定程度上讲，领导活动就是领导者制定决策和组织干部群众实施决策的过程。无数的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表明：无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还是一个组织或部门，决策对了，就会绝处逢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决策错了，则会由胜转败，由兴到亡。强大领导力作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闯过种种重大关头、打过重大考验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是精准决策。这里展示几个案例。

（一）长征过程中的精准决策

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机。而不可否认的是，没有长征过程中的一系列精准决策，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这包括江西突围、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通道转兵、端正战略转移方向的决策，遵义聚首、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决策，赤水调

敌、摆脱10万敌军围堵的决策，凉山结盟、争取少数民族的决策，草地脱险、挑战人间极限的决策，先行北上、粉碎张国焘阴谋的决策，陕北安家、确定长征落脚点的决策，甘南握手、实现主力会师的决策等。没有这一系列精准的决策，就不会有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

（二）上海经济保卫战中的精准决策

1949年5月27日，作为近代中国经济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大国际通商口岸的上海正式解放，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国民党政权从军事、政治及至经济层面的全面溃退，也标志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活从这一天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能不能管理好城市，把经济稳定下来，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毛泽东曾将进入上海、接收上海、管理上海称为中国革命过一难关，认为这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大城市能力的考验。确实如此，尽管经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先后告捷，早前工作重点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已陆续解放并接管了一些大的城市，但这些城市都不可与上海等量齐观，有限初步的城市执政经验对上海这座当时拥有600万人口的中国和亚洲最大城市是否适用也尚待检验。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宣称，共产党政府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应该说，上海经济保卫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阴云笼罩和内外部市场通路封锁之下，解放之初上海的经济金融已遭受沉重的打击，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局面。为此，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陈毅为市长的上海市人民

政府在经济建设及对工商业的处理上遵循了16字方针——“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基于此，在1949年这样一个特殊年份里，上海经济经历了一个从萧条困境向复苏新生的转变，而金融秩序的重建则是这部经济新生大剧的序曲，为上海随后在新中国经济金融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奠定了基础。

上海解放之初，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黄金和银元早被搬运一空，只留下几近废纸的21万亿元金圆券。军管会确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在1949年6月5日前完全废止金圆券，以1元人民币折合10万元金圆券的比率进行兑换。上海市民用金圆券兑换完人民币后转身就去买粮食、布匹等，但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竟然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有人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侦查人员查明操纵黑市的投机分子，6月10日，时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率士兵抓捕了1500多名投机分子，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一举查封证券大楼，将200多位投机商人逮捕法办，银元价格应声大跌。

银元投机的路被堵死后，投机商又疯狂囤积大米、棉纱和煤炭，带动新一轮涨价风。党中央及时调运各省物资，大米、棉纱、煤炭源源不断进入上海。1949年11月，全市统一平价抛售筹措到的所有物资，物价基本回到了正常水平。

由此，上海的经济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

（三）应对三年经济困难的精准决策

为了应对三年经济困难考验，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其

中心是调整。但是，要真正实现“调整”，还需要全党各级领导干部付出巨大的努力。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 7118 人。人们习惯地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全国迅速执行新的调整措施，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第一，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第二，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第三，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第四，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 1962 年底，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的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及其举措，为当时恢复国民经济和搞好综合平衡作出了贡献。

（四）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精准决策

1997 年夏，亚洲爆发了罕见的金融危机。这场风暴自泰国始，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汇市和股市一路狂泻，一蹶不振，进而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妥善应对危机，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坚定信心，心中有数，未雨绸缪，沉着应付，埋头苦干，趋利避害”的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对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援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的框架内并通过双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的援助，向印度尼西亚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品援助。中国政府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本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出发，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决定，此举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启动以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保持了国内经济的健康和稳定增长，对缓解亚洲经济紧张形势、带动亚洲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香港的冲击，中央政府坚决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举措，成为中国香港战胜亚洲金融危机的坚强后盾。

以上所述重大关头的精准决策，为中国共产党经受住各种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解决各种危局困境，提供了正确思路对策以及迅速有效行动的保证。

五、动员组织协调

这里说的动员，是指发动全党各个组织和全社会各方面力量迅速行动起来贯彻有关决策、措施，也就是“一呼百应”地执行落实。这里说的组织，是指适应新的情况、任务和要求对方方面面进行安排、整顿、调动、调配。这里说的协调，是指方方面面配合适当，步调一致，井然有序，形成强大合力。强大领导力作为中国共产党能够闯过种种重大关头、扛过重重重大考验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党的高效动员组织协调工作也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体现。通过如下案例，可以充分看到这一点。

党领导应对四川雅安7.0级地震的动员组织协调

2013年4月20日8时02分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应对芦山强烈地震工作取得重大胜利，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动员组织协调工作。

及时、有序、高效开展动员组织工作。8时08分，地震发生仅6分钟，成都市公安局应急指挥部已发出了第一道指令。“全市民警取消周末休假，全员归队”“所有交警立即上路”……在路口、在学校、在广场……蓝色的警服和闪烁的警灯犹如一道抗击天灾的堤防，阻止了恐慌情绪的蔓延，使人们在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救援的节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迅速作出重要指示，受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抵达灾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力量紧锣密鼓地向灾区集结。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地震应急Ⅰ级响应，派出地震现场应急工作组赶赴灾区。成都军区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紧急动员部队赶赴灾区救援。9时18分，军区两架直升机在震后一个小时就从夹江起飞，侦察灾情，为救灾提供宝贵的信息依据。四川省军区迅速启动应急救援机制，组织动员雅安和附近成都、眉山等6个地区民兵及四川预备役高炮师、乐山预备役步兵旅、资阳预备役工兵团，共5600余人参加抗震救灾。重庆警备区出动民兵预备役人员300余人和指挥运输、医疗救护、卫生防疫等车辆45台及有关器材驰援灾区。武警专业应急救援部队、交通二总队紧急抽调担负向家坝、溪洛渡电站专用公路养护保通任务的40名专业抢险队员和6台大型救援机械，于10时紧急开赴地震灾区。四川省公安机关调集公安、消防2000余人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和道路疏导工作。卫生计生委紧急部署地震医学救援工作，组建派出国家卫生应急队，180多名医务人员及车载移动医院赶赴灾区。农业部紧急部署农业抗震救灾工作，要求农业系统全力以赴做好抗震救灾工作，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和灾后生产恢复指导，确保灾后无大疫，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密切协调配合，救援有序接力。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如何尽最大可能减少伤亡，挽回损失，考验着救援体系的整体协调与配合能力。来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的官方救援力量，担当起救灾的中流砥柱。截至20日20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有8014人投入地震救援，另有1万余人的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可以根据灾情随时出动。民政部门在前期紧急调运3万顶救灾帐篷、5万床棉被和1万张折叠床的基础上，再次调运2万顶救灾帐篷和5万床棉被，帮助做好受灾群众临时生活安置工作。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批救灾物资已经运抵灾区，首批500顶帐篷在灾区陆续搭建，家庭包及食品也陆续发放。中央气象台与四川省气象局发布震区天气预报，提示未来几天可能发生崩塌滑坡的区域。国土资源部启动Ⅰ级应急响应，研究地质灾害应急排查、地震调查和评估工作。水利部派出多个工作组、专家组赶赴现场，对水利工程震损情况和可能形成的堰塞湖进行全面排查，并通报灾区供水设施损毁情况，启动水利抗震救灾Ⅲ级应急响应。交通与通信的畅通，对于确保救援效率至关重要。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及成都交通运输部门，紧急疏导，取消收费，打通成都至雅安高速公路生命线。中国移动对雅安地区所有移动用户实施免停机服务，四川联通对雅安芦山、宝兴地区的语音和短信免收通信费。同时，发出提示，由于震区通话繁忙，建议尽可能利用短信、微博、微信联系。各类网络信息发布平台，也为此次地震救援提供了信息绿色通道，发挥出民众自组织的巨大能量。互联网上，满屏滚动播报；手机上，传

递着地震救援的最新情况；微博报平安、寻找亲人、发布路况。截至20日17时，“四川雅安地震”话题在新浪微博上就有近7000万人次参与。

协同发力，探索重建之路。芦山强烈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关心，第一时间对抗震抢险作出重要指示，并命令军队立即投入抢险救援。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全面部署抗震救灾工作。1个月来，他还就受灾群众安置、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5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芦山地震灾区考察，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对抗震救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芦山强烈地震抢险救援阶段工作取得重大胜利，抗震救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要继续大力发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科学布局灾后恢复重建，让灾区人民早日走出灾难阴影，开始美好新生活。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支持下，雅安探索出“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的重建新路，不仅实现了“三年基本完成、五年整体跨越、七年同步小康”的重建工作目标，还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发力、更好发展”的嘱托，深化乡村振兴，灾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和提升。中央统筹指导、地方作为主体、灾区群众广泛参与，三者构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政治优势、体制优势、机制优势、政策优势，既有助于中央政府统揽全局，提升应对危机效率，也有助于发挥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其应对危机能力，是对我国应对自然灾害体制机制的健全和完善。2022年，雅安又先后经历“6·1”“9·5”两次地震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建新路再次得到实践检验与拓展。

第三章
关键的政治领导力

1921年9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正式履行党的领袖职责。他要带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确定党纲、政纲，阐明党的政治主张。

同年11月，陈独秀向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这是中央领导机构成立后下发的第一份文件。文中写道：“明年七月开大会。”大会指的就是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召开时间是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会址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老成都路7弄30号（原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一幢坐北朝南一楼一底旧式石库门住宅，是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的寓所。

党的二大在党的创建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阐明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并将党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为了贯彻和实施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共二大还围绕民主联合战线谋篇布局，为实现民主革命纲领提供策略方针的保证。

党成立不过一年，就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使这个纲领很快传播开来，“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群众的共

同呼声。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党的二大提出的革命纲领，既坚持和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高理想，又第一次明确提出党在现阶段的行动方针和革命任务，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展现出非凡的政治领导力。

一、政治领导力具有关键性、根本性和统领性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那就是不断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早在春秋时代，管仲就揭示了政治领导力对国家实力的决定性影响："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管仲的思想在2600多年后美国学者克莱因提出的国家实力评估公式中得到了呼应。在这一公式中，克莱因赋予了战略意图和国家实施战略的意志这两大领导力因素乘数效应。由此，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力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国快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快速上升的一把钥匙，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启示。政治领导力与党特有的政治属性和领导作用紧密联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体系中的根本和统领。

（一）政治属性是党的根本属性

中国共产党是秉持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而建立起来的新型政党，其特有的政治属性即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规定的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探索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把握其发展

规律而得出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政治这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列宁认为："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而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所揭示的政治，是指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或利用国家政权来维护自己统治而进行的全部活动。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政党组织为夺取政权或维护自己统治而进行的全部活动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开始，就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公开向外界申明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肩负重大而崇高的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包含两个目标，推翻旧社会、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最终理想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是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交织在一起的。根据这一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的思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有政治属性，当他们看到在联合中党的领导或多或少地落到了德国资产者手中的情况时尖锐地批评道，"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这里的"锐气"是指无产阶级政党要高度重视和保持政治属性，明确并坚持政治诉求、政治领导，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无产阶级政党联合其他政党一同革命的行动是可行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被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无产阶级政党要坚持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原则，实现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直至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最终目的，而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

级政党的尾巴。

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也特别强调党的政治属性，反复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首先应当从政治上加以考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务表象中把握政治因素，避免出现政治上的极端幼稚和政治上的极端近视。早在建党初期，列宁就强调社会民主党人必须透过工人阶级经济问题的表象把握政治因素，发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在列宁的早期著作中不乏“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来进行推断”“从政治上考虑”“善于在政治上估计”等字眼，足见他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

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我们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最初只有58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一个一穷二白、四分五裂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整体摆脱贫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政治纲领的先进性、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和政治方向的前瞻性。

（二）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科学论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的革命力量，负有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以建设一个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要建设一个新社会，最为关键的是组成一个先进的统一的具有自己独特政治属性的政党来进行领导。他们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应该使自己的每

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①]。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党在革命进程中要努力同其他可以参加革命的阶级、政党和社会力量结成联盟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领导权的思想，同时坚决反对那种可能损害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丧失原则的联合。

列宁在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强调为了实现党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要牢牢掌握领导权。党不仅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还要实现对国家政权和不同阶级、群体的全面领导。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党的领导是革命事业的可靠保证，是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他明确提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里，已经有了党是特定阶级及其同盟者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思想。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曾因对与国民党联合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和实现领导权的途径缺乏深刻认识，放弃了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致使大革命的领导权被国民党右派掌握，大革命陷于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逐步在这方面掌握主动权。到抗日战争时期，党成功纠正了“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的错误倾向，掌握了抗日战争的最高政治领导权。我们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并提出“党领导一切”，成功坚持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对此，毛泽东讲过，“领导权并不依赖于力量的大小，而要看领导者的纲领和所做的努力……如果战争胜利了，日本被赶出去了，如果形势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革命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①]。中国革命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始终坚持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领导地位受到高度重视、得到空前巩固。毛泽东在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强调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②] 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二大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写入党章。后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并多次强调，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第一次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

明确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可以说，这个论断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实践逻辑的准确把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实践的深刻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新贡献，是中国共产党自身领导地位的结晶和总结，也体现了党的政治属性、使命担当和执政自信。

（三）党的政治属性和领导作用的实践关乎党的政治领导力

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抽象的、虚幻的，不是不可捉摸、无法把握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

第一，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外化于存在于历史实践和现实实践中的，是能够被大家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感受感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人民在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战胜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巩固新生政权，成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全面开展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开展变革性实践，取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所有这些，都是党特有的政治

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实践中的卓越呈现。

第二，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特有的工作内容。特别重要的包括：一是始终把崇高政治理想、政治使命扛在肩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百余年奋斗中，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二是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在百余年奋斗中，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不断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三是始终坚持“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把党的一切力量聚在一起，形成全党团结统一的力量，并使这个力量集中在同一个点上。在百余年奋斗中，始终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illegible]，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全党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做到[illegible]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

第三，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实践中还形成一系列特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比如着眼于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正确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党的各级委员会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善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凝聚智慧和力量，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善于通过协商的方式增进共识、凝聚力量，同时善于集中、敢于担责，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比如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和创新联系群众的途径方法，汇集民智民力，善于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为群众自觉行动。比如坚持依法执政这一基本领导方式，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自觉把党的领导活动纳入制度轨道。比如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诸如此类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实现程度。

上述党特有的政治属性以及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实践中的应有表现聚合而成的力量、效力和效果，就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换句话说，这些在实践中的应有表现，都是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原则、全局的问题，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都是政治领导要关注要解

决的内容，而政治领导力就是处理这些事务所需能力和条件的实际运作状态和效果。由此而言，政治领导力这一概念虽然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概念，但其实际存在则是与党的成立同步的。

（四）政治领导力在党的领导力体系中至关重要

所谓政治领导力在党的领导力体系中至关重要，是说政治领导力具有执本末从的效果。政治领导力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概念，与此概念同时提出的还有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党的二十大重申了这几个概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本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这“四力”是党的领导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按照前面我们对政治领导力的理解和把握，或者说从广义上理解和把握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都是政治领导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蕴含在政治领导力的分析框架之中的。政治领导力的内容要求的形成需要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是政治领导力的内在要求和集中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可有可无，没有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也就形不成政治领导力。

从狭义上理解和把握，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党把控方向性、原则性、根本性问题的能力及其运作的效果；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党推进理论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能力和效果；群众组织力主要体现为党能够有效地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的能力和效果；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处理好与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群体、各方力量的关系的能力和效果。这里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主要功能服务于党的政治领导力，也就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为前提和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实现党的政治目标的磅礴力量。离开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都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政治领导力在领导力体系具有贯通性、统领性、关键性。一方面，政治领导力是领导力体系的统领，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政治领导力的提升提供实现路径，缺一不可。另一方面，政治领导力具有“定盘星”作用，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寓于政治领导力之中，受党的政治方向、政治路线的指引和约束，并为提高政治领导力提供实现途径和有力保证。

具有自觉把政治领导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体系的统领，全面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失去或弱化党的政治领导力，党的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就无从谈起；失去或弱化党的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党的政治领导力也就形不成。

二、始终把崇高政治理想、政治使命扛在肩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余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的强弱，首要的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在于党对崇高政治理想、政治责任、政治使命的态度和行动。100余年来，党始终把崇高政治理想、政治使命扛在肩头，保证了党始终没有犯颠覆性错误，保证了中国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不断前进、不断发展。

（一）为实现政治理想政治使命不懈奋斗

理想是人们的梦想和奋斗目标。理想的最大作用是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以引导、激发的愿望，凝聚人们的力量。从领导学角度看，政治理想和政治使命具有前瞻性和统领性，很好地解决了党为什么建立、存在和发展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党作为领导力量往哪里“领”、往哪里“导”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力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政治使命，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视域中的崇高的理想、使命，即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其次来源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前赴后继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和使命。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①

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信念无比执着、意志无比坚强。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不懈奋斗史。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今天又带领人民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经不可逆转。

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成为拥有9000多万名共产党员，并且在14亿多人口的国家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靠的就是党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丢掉了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党的政治方向就丧失了，党的政治领导力也就丧失了。

（二）制定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

党领导人民实现政治理想政治使命，重要的责任是要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包括党的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等，以此统一全党意志、行动和步伐，以此号召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战略是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带有长远性全局性的问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内，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尚未达到以前基本上是不变的。策略是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相对短时性局部性问题，在战略要求许可的范围内它随着形势任务的变化而经常地变换。战略和策略相互依存、互相作用。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制定策略就失去依据；没有正确的策略支撑，要完成战略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把战略策略提到关系党的生命的高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事业就大有希望。”①

党注重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正确制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和纲领。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注意到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每个阶段的奋斗目标即最低纲领统一起来，不仅明确并坚持长远的远大理想、奋斗目标，而且制定和确定每个阶段的任务、奋斗目标，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所以党仅仅成立一年，党的二大就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愿景、政治目标和政治使命。不过，党的二大只是提出这一纲领，这一纲领的形成和成熟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动力和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的长篇演讲，全面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制定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低纲领（总路线），并开启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实践，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战略部署。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①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页。

[illegible]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提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明确并完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体系。

为实现上述纲领、目标、愿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还不断制定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大政方针、政策策略和战略部署。在党成为执政党后，从1953年开始还以五年为一个发展阶段，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到2021年已经制定了十四个五年规划。

通过上述战略策略的正确制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基本遵循。百余年来党在正确制定战略策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重视调查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世情、国情、党情等）调查了解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使战略策略决策举措符合现实情况、符合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注重战略预判与战略谋划，胸怀大局、审时度势，着眼大事，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有前瞻预见力，是领导者的重要特质。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个将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① 坚

①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持问题导向、问计于民，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制定切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决策程序，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试点先行，然后总结试点经验，以点带面、以点串线地推广到其他地方，实现探索、试错、纠错、前进的螺旋式发展等。

（三）抓好决策贯彻执行

抓好决策贯彻执行，通常也叫抓落实，就是把党和国家战略策略，包括路线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注重执行落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品格的重要表现。马克思曾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决策执行，历来善于把远大目标、奋斗纲领、方针政策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紧密结合起来，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早在1928年，毛泽东就指出因为条件的艰苦和复杂，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1949年，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他强调“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②。邓小平一直强调路线、方针、政策、意见、方案必须得到落实的重要性，认为任何好主意不会自动实现。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把真抓实干上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

江泽民始终认为“正确的决策制定出来以后，必须抓好落实”。胡锦涛也强调，“现在，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方向明确，目标清楚，政策措施都很具体，关键是要落到实处”③。习近平更是反复强调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早在2011年，他就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对抓落实专门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执行落实问题强调了很多。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成为其治国理政的关键词。总结习近平总书记谈落实的重要文章和讲话，会发现其中既有方法，也有态度，更是不断强调落实的重要性。在谈落实的重要性上，他强调，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真抓实干再难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果不动手去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幸福美好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勤劳奋斗来创造等。重视决策落实、狠抓执行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色。

1947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党中央决定，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战线从黄河推进到长江，牵制敌人，减轻山东和陕北的压力。这对刘邓大军来说困难重重、危险万分，但他们“不讲价钱”，迅速行动，此举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不同执行力，导致了两支军队不同的命运。时至今日，反对空谈、注重实干、注重落实，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就，都是抓落实抓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党的政治理想、政治使命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③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25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3页。

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115页。

停留在口号层面，我们才能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贯彻落实，是把决策变为人们的实践行动、由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过程，无疑需要克服主观和客观上的诸多障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1948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份电报中详细分析了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各种偏差和错误的四点原因。一是政策界限不明确；二是没有作系统说明；三是上下联系不够，主要包括下级对上级请示汇报不够和上级对下级联系指导不够两个方面；四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或不完善。所以，抓好落实的前提是要决策本身正确，在这个前提下要有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要用思想解放引领行动“突围”，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往往离不开解放思想，只有在解放思想中才能统一思想，才能引领行动“突围”，促进党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要注重系统推进，防止对政策的一知半解、断章取义、生搬硬套，弄清楚整体政策安排与某一具体政策的关系、系统政策链条与某一政策环节的关系、政策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的关系、政策统一性与政策差异性的关系、长期性政策与阶段性政策的关系，既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又不能以整体代替局部，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又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明确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任务，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分解，一件任务一件任务落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推进，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抓到底。要激发“关键少数”担当作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要选好用好管好干部，有一支对党忠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骨干队伍。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百余年来中国的改变令世界瞩目，中国奇迹令世界惊叹，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超强的决策力与执行力完美结合。既有宏大的长远目标和战略谋划，又有实现这些长远目标和战略谋划的方针政策和部署举措，还有脚踏实地地大抓落实，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政党具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领导力。

三、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使命的确立，合乎了时代潮流、顺应了人民意愿；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使命，也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史，其政治领导力也就是党同人民群众充分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形成的改造社会、实现政治使命的合力。离开人民，仅靠少数共产党员的奋斗，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会落空，而且会变得毫无意义，也无领导力可言。这告诉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的根本方面在于汇聚民心、激发民力。一百余年来，党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保证了党始终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形成了万众一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一）始终坚持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做到始终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始终坚持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是基础。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代表他们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建立在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根据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础，而从事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也理应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人。尊重社会历史的主人，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是尊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并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

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象、中国风格的群众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英雄的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人民至上的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观点等。

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并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贯穿的一条红线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1939年2月，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最早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①] 在这个报告中他又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党的七大将这一宗旨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亲自为河南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群众的一面。”并且，党中央把题词做成木匾送去。这其中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故事。194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下令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把郏县打下来。不打下它，西北野战军就如同胸上插了一把刀子。然而，部队要打仗了，手中却一点粮食都没有。为此，毛泽东亲自筹粮，交代郏县想办法准备三天的粮食。全县的老百姓随即把口粮和坚壁清野的粮食全部拿出来，供军队吃了一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军队吃了一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子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把粮食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献出来，老幼一起吃观音土。这给战士们极大鼓舞，终于把郏县打了下来。后来，《郏县县志》记载了这件事：“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郏县县委“站在大多数劳动群众的一面”，从而使得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页。

发挥，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标志，是我们党一切时候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以贯之地秉承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精神，接续“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强调“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并将其作为党的初心、党的恒心。他还特别提醒全党：“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①]，“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改变性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②]。

2021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人民就是江山”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一种政治理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情感符号。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利益至上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融入自己全部奋斗实践中。从“为人民服务”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党的所有工作，不论是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武装力量、构建政治制度、进行经济建设，还是推进改革开放、推动文化发展、创新社会治理等，都以人民利益为根本考量。100 余年来，中国共产

① 崔耀中：《旗帜鲜明讲政治：基层如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30 页。

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人民”二字已经深深融入党的血脉，党领导人民建立的国家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府称为“人民政府”，党缔造的军队称为“人民解放军”，党的干部称为“人民公仆”，党中央的机关报称为“人民日报”，中央银行称为“人民银行”等，党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越来越坚实。

（二）在一切工作、一切任务、一切领域的全过程践行群众路线

以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价值观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实践中提出并坚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人民价值观富有特色的伟大创造。建党初期，党就开始在革命实践中探索群众路线，经过不同历史时期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总结升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党的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三大党章又加上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100 余年来，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于我们党的一切工作、一切任务、一切领域的全过程，并日益增强其制度化水平，实现了三个确保。

一是确保党的大政方针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100 余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如果大政方针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认同和真正支持，党的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如果大政方针不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甚至损害群众利益，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只

有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保证党的大政方针符合群众愿望与要求，赢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使党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是确保党创造出人民满意的业绩。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早在创建瑞金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为群众服务。他明确指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红都瑞金沙洲坝有一口"红井"，井旁一块石碑上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原来，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村庄，当时村民非常迷信，认为挖井会破坏当地的风水。1933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后，毛泽东就住在这个村子。同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带领几个红军战士在村前几十米的地方进行了水源的勘探，并破土动工，群众见毛主席亲自在开挖井水，也纷纷带着工具一起动手，在挖到5米深的地方，一股泉水喷涌而起，村民们的吃水问题终于解决了。"红井"也成了党、红军和苏区人民血肉相连的见证。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所到之处，都主张"打土豪，分田地"，给劳苦大众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组织领导了"三大改造"，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群众享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先后推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系列改革举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明显改善。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让人民群众享有了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确保党创造出人民满意的业绩，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为实现人民民主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工农民主、人民民主等政治主张，创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民主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重大问题，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推进选举民主，发展协商民主。

三是确保党有效地引导群众回应群众的各种关切和疑惑。绩效的改善提高与民众满意度并不必然正相关，甚至在绩效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民众可能还是不满意。因此，长期以来，党贯彻群众路线不是自然主义的，更不是尾巴主义的，而是善于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做好群众思想教育、说服引导工作，真正达到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密切关系、凝聚力量、共同奋进的目的。

古人云："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100余年来，正是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了实际工作中的这三个确保，进而赢得了民心，确保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确保了党与人民"天生就是一家人"的本质联系。

（三）高度警惕和避免“塔西佗陷阱”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有忧患意识，必须从各方面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2014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提到著名的“塔西佗陷阱”。他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人们不信任政府、不支持政府，从而引发一系列信任危机和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失信于民”那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党，这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党的十八大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由于各种原因，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的确面临弱化的风险。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努力，党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在新时代，党有效地解决和防范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弱化风险是从党的作风入手，而且是从党的最高层的作风入手，通过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2014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这里提到党的良好形象对增强党的政治认同的极端重要性。近些年，为了全方位塑造党的良好形象，中国共产党不仅把党的形象与作风建设联系起来，更创新性地将其理解为一个更为丰富的系统的立体工程。既注重筑牢党的形象的客观基础（执政实绩），又重视从各个方面塑造党的形象；既

注重塑造党的现实形象，又坚决维护党的历史形象和展示党的国际形象；既塑造党的集体形象，又塑造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的个体形象；既注重传承优良传统，又注重创新，积极借鉴新媒体新技术等。实践证明，这些思考和探索，对有效防范“塔西佗陷阱”，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密切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

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不仅要有群众组织力，还要有社会号召力。

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还在于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战胜强大敌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给予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以致命打击。抗日战争时期，党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抗日战争成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农村、在城市、在国民党军队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军队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解放战争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与各方广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党建立人民大众

的、各方面共同参与的人民政权，为民族复兴大业汇聚起各方力量；探索形成新型政党制度，真实、广泛、持久地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和全国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旧式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有效克服了政党之间互相倾轧造成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凝聚海外侨胞力量，团结号召海外侨胞，投身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积极热情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建立并巩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其核心密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结合起来，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坚定不移的拥护和支持。

在谈及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诀时，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说："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刻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这样才能制定正确的、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果。"①

四、始终坚持"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

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政治使命，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拥护支持不行，没有全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也不行。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

① 钟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4日。

的强弱，核心的问题在于党能不能始终坚持"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100多年来，党坚持了这一政治原则，保证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没有这一条，党只能陷入瓦解，党的一切政治任务使命目标，党为实现使命目标而确立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密切联系，都会落空。

（一）"两个维护"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政治原则

在党的政治领导力中，之所以把"两个维护"作为重要方面，甚至处于核心地位，是由党的使命、目标、任务的艰巨性和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对手的强大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开始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就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对巴枯宁所主张的"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等观点进行严厉批判，强调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不能各行其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①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重中之重、要中之要。核心就是主心骨，就是掌舵人。马克思曾借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举例说，铁路运转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如果碰到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这个人是谁？就是这艘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

的船长。列宁也说过，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领袖，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还说："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①

（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协调一致的强大力量来源于"两个维护"

小河村，杨家沟，西柏坡；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一边是偏僻遥远的小山村，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大战场，是什么让远隔千山万水的前后方步调一致、密切协同，兵随将转、决战决胜？

几十年后，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给出了答案：战争年代，毛主席用电台指挥作战，全党全军都无条件地执行"嘀嗒、嘀嗒"的命令，上下"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二话没说"、立即执行在我党我军是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中国共产党在早年时期就对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毛泽东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验，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③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29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也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① 后来，邓小平又讲："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 正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我们党和党中央开始逐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便焕然一新。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和党中央形成了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就大大推进了。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我们党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第一条就是"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继续坚持"两个维护"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实现了"两个确立"，并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自觉行动。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全党才有了顶梁柱，14亿多中国人民才有了主心骨；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才有了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新时代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使我们党团结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在新时代的战略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100多年来，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坚强领导核心的形成和维护，没有党的团结统一的巩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巨大成功，是不可能的。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党中央有权威，全党有核心，党才有力量。

说到维护核心，不得不说到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周恩来堪称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234页。
②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1页。

维护核心的典范。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①]。会后又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队伍到了陕北要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提出周恩来继续当主席。周恩来坚持让毛泽东当主席，他当副主席。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定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衷心拥戴主席，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巩固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始终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始终秉持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不做。因为他深切地知道：维护党的核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多么重要。

今天，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向前进。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像周恩来那样自觉维护核心，自觉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对违反中央精神和政策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需要指出，党形成并拥护领导核心，决不是庸俗化的“个人崇拜”。党的十二大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写入党章，此后党章虽历经修改，对这一规定却一字未动。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任性决策，而是担负着为大党大国掌舵领航的重大职责。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核心也要按照民主集中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0页。

制原则发挥作用，遵守集体领导制度，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党的领导核心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正确领导形成的，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选择。[①]

（三）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100多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维护领导核心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在各项工作中使党中央的正确决策部署能够毫不动摇、百折不挠地贯彻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指出过，所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并不等于包揽一切，不是具体事务上的大包大揽，更不是“包打天下”。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这方面的认识和实践都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8日。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①]。他还提出并反复强调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必然要着眼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着力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大力提高党发挥这些作用的能力和定力。

一是把方向。方向问题，涉及根本、关系全局、决定长远。党着力发挥把方向的作用并提高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归结起来就是不断解决好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的问题，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终目标和最高政治责任，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现实使命和政治责任，要在这方面有战略定力，有高度的自觉，并善于以此影响和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防止发生颠覆性错误，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头脑清醒，有效发现处置改革发展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二是谋大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善于观大势、谋大事，自觉在大局中想问题、做工作。谋大局，必须牢固树立大局意识，自觉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布局，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126页。

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要善于牵“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落一子而全盘活”，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善于把局部利益放在全局利益中去把握，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眼前需要与长远谋划统一起来，不能急功近利、投机取巧；把解决具体问题与解决深层次问题结合起来，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始终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度，也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不断增强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

三是定政策。政策是体现执政党性质宗旨的试金石，是反映治国理政水平的标志。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眼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制定切实管用的政策措施。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政策决策、方案举措符合现实情况、反映客观规律、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分析研判，完善决策程序，增强法治意识，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四是促改革。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提高政治“三力”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维护领导核心，真正使党中央的正确决策部署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地贯彻落实，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增强政治主动性很重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总结道：“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①] 为了增强政治主动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在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创造性提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要求。此后，这一重要论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和中央的重要会议上频繁出现。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许多炊事员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从实践中看，要真正做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及维护领导核心，使党中央的正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需要各级党组织、全体党的干部和党员增强政治意识，善于把握政治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国之大局、国之大要、国之大事、国之大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提高政治判断力，就是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做到在党和国家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的能力，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

提高政治领悟力，就是要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能力。政治领悟力既决定党员干部看问题、察形势、想事情的高度、深度和广度，又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境界、视野胸襟和前途命运。提高政治领悟力，首先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在学懂弄通做实上走在前列、当好表率。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

提高政治执行力，就是能够把决策付诸行动、把愿景变为实景，也就是能够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贯彻执行，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提高政治执行力，要对标对表抓执行，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经常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坚持局部服从整体，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

综上所述，百余年来，不管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党的坚强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我们党始终锚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不断前行，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继续走好

① 洪向华主编：《完全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98页。

未来的路、创造新的伟大奇迹，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只要我们抓住提升党的政治领导力这个关键，特别是抓住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这个关键的关键，党就能在人民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地走下去，并且会走得更稳更好！

第四章
真理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有着深厚的根基和丰富的内在保障和支撑。一个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之所以能够发展为9000多万名党员在14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始终朝气蓬勃、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根本就在于我们党具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正确道路，就在于我们党坚持用这一科学的理论及其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中，真理的强大力量铸就了党的强大领导力。

一、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真理支撑和保障

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两件大事。在东方，殖民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走上了追求复兴的艰辛求索之路。在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这两件大事所开启的发展脉络，历史性地交汇在20世纪的中国。从此，中国有了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有了新

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一）1840—1919 年期间多种思想武器都败下阵来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①] 1840 年鸦片战争揭开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帝国主义国家在军事上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使得近代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有数据显示，晚清 70 余年间，中国被迫签订了 1145 个不平等条约和章程。[②] 与此同时，封建帝国内部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空前严峻的社会危机。据不完全统计，仅辛亥革命前十年，农民骚乱更达高峰，十年之间竟达 320 多次。[③] 近代历史第一次向国人抛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中国各阶级、各阶层都开始了新的反思与探索，从地主阶级"睁眼看世界"的觉悟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从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太平天国"运动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从资产阶级"变法自强"的社会改良到推翻帝制的社会革命，无数先进仁人志士在中西文明的激荡中寻求救国真理、治世良方，各种社会思潮交迭消长、互相激荡，绚丽多彩的思想巨流奔腾在近代中国"文化昂进之时代"[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03 页。
② 王炳林：《大国追梦》，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7 页。
③ 周志初：《试析清末农村人口问题》，《江苏社会科学》1993 年第 1 期。
④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大变局"面前，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有识之士最早将眼光望向天朝帝国以外的世界，并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主张。魏源编写《海国图志》一书，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科学技术、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学校教育等基本情况，为当时的国人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提供了重要参考。魏源在书的序言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①] 这一观点代表了封建地主阶层中的进步人士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最初方略，迈出了传播西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第一步，但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的思想禁锢，这一先进主张淹没在"华夷之辩"声中，没能引起大的波澜。

鸦片战争之后，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阶级遭受的剥削压迫更加沉重，掀起了风起云涌的反抗浪潮。这其中，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高潮。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宣扬"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政治理想，对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农民产生了极大的感召力。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还提出了向西方国家学习、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新方案《资政新篇》。然而，囿于农民阶级固有的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这些都严重脱离实际而流于空想。但是其所发出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利益诉求、揭示的人民群众的斗争力量，都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清廷内部产生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官僚。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武器"断不足以制洋人，亦不足以灭土寇"[②]，主张向西方学习。他们

①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 1998 年版，第 21—25 页。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3—47 页。

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原则下，领导了一场以引进、学习西方先进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旨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历经30余年，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推动了近代中国工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但是囿于自身的阶级属性，洋务派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的自救运动注定不可能改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1895年清王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终破产。

甲午战争的战败，不仅使帝国主义国家看到了清王朝的虚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且从精神上给了中国人以致命一击，天朝帝国的盲目自信顷刻间土崩瓦解。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 残酷的现实使得先进仁人志士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主张在政治制度上向西方学习，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们不仅几度上书争取光绪皇帝支持变法、推行新政，而且组织强学会、保国会等各种政治组织，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实务报》等诸多刊物，宣传变法主张和政治改革思想。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说》《社会通论》《法意》《名学浅说》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著作，广泛传播了“天赋人权”、社会进化、自由、平等、民权、立宪、议院等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康有为、梁启超等则借用封建传统语言宣传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宣扬资本主义思想，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改良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百日维新”在经济方面制定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政治方面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在文化教育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造旧学、传播西学的措施，播下了民主主义的火种。但是，其寄希望于封建皇帝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以改变现有体制的想法无疑是幼稚的，不可避免地遭到统治阶层顽固派的极力抵制和血腥镇压，这也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进入20世纪，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愈发激烈。先是爆发了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以“反洋”“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这一农民革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但是其极大地彰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捍卫民族的决心和意志，提高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尤为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使先进中国人看清了封建统治阶层与帝国主义联合剥削中国人民的事实，认识到要救亡图存必须推翻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们成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形成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革命纲领，树立起为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斗争的新目标。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了，在“假共和”的旗帜下，军阀之间割据混战。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①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出出政治闹剧中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继续迈出探索的脚步。

①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9页。

在总结反思辛亥革命经验教训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为以往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国民思想之落后而对于革命持隔岸观火、熟视无睹之态度。因而，他们认为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发起一场思想上的启蒙运动，以改造国民性。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起猛烈的进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大力宣扬西方政治思想，科学主义、实用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修正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新村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主流都被介绍进来，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文化运动以批判精神重建价值体系，以理性精神唤醒人的自觉，在重建一种新的文明的努力中实现了对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促使他们用新的眼光和新的价值观看中国的落后现实。

（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 新文化运动使得西方各种政治学说和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国内，当国人在各种各样的“主义”中寻找出路的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大变动吸引了他们的注意。1914—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也使一直钦慕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人产生了动摇和质疑。李大钊认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大权威大生疑念。”[②] 陈独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44 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8 页。

也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以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西方近世文明的这种缺点是毋庸讳言的。”[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俄国情的相似性让在救亡图存道路上屡败屡试、苦苦求索的中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1899 年英国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学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如梁启超、朱执信等都曾对马克思及其学说做过某些介绍，但是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十月革命的发生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重，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②]。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获得了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1918 年下半年，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当着中国思想界正在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愈发浓厚兴趣的时候，1919 年上半年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慨，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端于爱国学生的集会，在学生运动遭到北洋政府镇压的危急关头，工人阶级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罢工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 20 多个省 100 多个城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最终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

①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新青年》1915 年 9 月 15 日。
② 《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77 页。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高潮。茅盾就曾回忆道“五四运动的大功劳是解放思想”，他“把从前读过的经史子集统统置于高阁，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①] 一时间，大批马列主义的译本和文章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李汉俊翻译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恽代英翻译了《阶级争斗》，陈望道翻译了第一个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张西曼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纲》，邵飘萍编著了《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劳农政府与中国》等研究和阐述马列主义的译著。各大杂志也陆续刊载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了系统的译介和传播。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北京和上海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经验。陈独秀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任务呼之欲出。各地纷纷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成立专门宣传机构，以出书、办报办刊的方式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轮高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新青年社，先后出版了“社会主义小丛书”“新青年丛书”，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自叙》《科学社会主义》等数十部著作，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很大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 页。

的影响。1921 年 9 月成立的人民出版社更加有计划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展过“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等三次意义重大的论战。这几次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改造社会的根本之道，是直接地解决具体的一个一个问题，还是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造；改造社会和国家的根本方式是改良，还是革命；中国是发展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传播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等。[①] 正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得到了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出的幼芽在经历风雨洗礼后，更加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此外，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还格外注重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一批专门供工人阅读的刊物，比如上海的《劳动届》、北京的《劳动音》《工人周刊》等。同时还积极创办补习学校、工人夜校、识字班等，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宣传教育，邓中夏在北京长辛店，李启汉在上海沪西开办的补习学校都很有名。通过宣传教育，不少工人意识到了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各地纷纷成立了工会、工人俱乐部等工人组织。为了培养革命力量，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还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团结和教育进步青年，为党培养了一批后备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

① 李敏煊、金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学习与实践》2020 年第 5 期。

先进分子找到了观察和认识国家命运的科学武器和有效工具，“自从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①]。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实现了结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一部分进步工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阶级觉悟。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张人亚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大包珍贵书报文件秘密送回老家宁波霞浦镇霞南村，交给父亲张爵谦保存，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非常珍贵的一些文件，关系十分重大。随后他的父亲张爵谦对外宣称，儿子张人亚外出找不到了，十有八九是去世了，便在后山上挖了一座衣冠冢，张爵谦就把这包东西用油纸层层包裹起来，悄悄地放到这个衣冠冢中。之后的日子里张爵谦日夜盼望着与儿子重逢、把这包文件亲手交还给他的那一天。可一直盼到全国解放，张人亚却始终杳无音讯。直到 24 年后的 1951 年，年事已高的张爵谦请人打开了儿子的空坟，将文件取出捐献给了国家。其中就有 1920 年 9 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原来，自 1927 年辞别父亲后，张人亚先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 年赴瑞金成为中央苏区出版事业的负责人；1934 年 12 月 23 日，张人亚在外出检查工作时，积劳成疾、因病去世。这本中国现存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如今已是上海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6 页。

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1848 年 2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发表。《共产党宣言》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之作，矗立起一座马克思主义精神丰碑。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根和思想源头，正是《共产党宣言》。2018 年 4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①]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 1920 年，李大钊、陈独秀通过上海著名的报刊《星期评论》，给当时因参与领导浙江新文化运动而丢掉工作的陈望道送去了一封信：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就这样陈望道带着英、日两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浙东小山村分水塘，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3 个月后，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发行，共计印行 1000 册。

①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人民日报》2018 年 4 月 25 日。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推出后，迅速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掀起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或许连陈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不仅热销，而且会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强烈反响。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最早、影响最大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下，催生了中国第一批共产党人。1920 年 8 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陈望道等在上海正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并于当年 11 月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虽然文字只有 2000 多字，但转述和阐释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尤其是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第一次明确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表明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新型政党已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

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先后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都和《共产党宣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分不开。1936 年 11 月，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说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察普著的《社会主义史》。”邓小平也讲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 ABC》。”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先后谈到过《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他们走向共产主义道路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南，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改变过、放弃过，无数共产党人为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如何救民于水火，挽民族之沉沦，扶大厦之将倾，建崭新之国家？自 1840 年以来多少仁人志士苦苦探寻救亡图存真理，一次又一次失败，各种流行思潮都无法解答时代之问，未能改变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1917 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得苦苦求索救亡图存道路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历经百余年奋斗，一个曾经衰落的东方大国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奇迹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这说明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强大的力量支撑。正如毛泽东说过的那样：“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

从 1920 年陈望道翻译的首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00 多年间，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带领中国人民一路乘风破浪，完成了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预见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57 页。

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前瞻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并进一步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奥妙所在："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①]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之"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只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真理的力量才真正强大，才有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推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月12日。

的，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①] 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②]。恩格斯也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③]。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列宁也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④]。这些论述说明，任何科学理论，必须本土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悠久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独特的中国国情。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④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政治态度宣示党的纲领。党的二大即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等问题，形成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流行过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并曾一度占据统治地位，导致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有两个相映成趣的称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与"二十八画生"。前者是以王明为首的一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尽管这些人后来的人生取向各有不同，但常常被代指那些喝过洋墨水，自诩为"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是毛泽东年轻时曾用过的笔名，"二十八画"是他名字繁写体的总笔画数，这是一位经由中国土生土长孕育出来，引领中国革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领袖。两个相似称谓的背后，却寓指着对待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的主张曾经被那些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年轻领导人讥讽为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王明等人认为，山沟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被扣上了"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毛泽东也一度被剥夺了在党和军队中的权力。

在抵制和消除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进程中，逐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于1930年发表了声讨教条主义的檄文——《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大声疾呼："共产党

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全会。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等问题作了精辟论述，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全会还以决议的形式，号召全党要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②]。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步伐。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重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03页。

大课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同时代的进步和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强调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主题、回答时代课题、应对时代挑战、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党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次又一次飞跃，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2000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尊重价值规律，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正是在这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党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党从新的实践

和时代特征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政治保证、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 21 世纪。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要求，迫切需要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入回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治国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的成就”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了

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密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扎根中国土壤并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僵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和具体特点相结合，以特有的民族形式呈现出来，才能真正地“具体化”和“中国化”。这里说的“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经验，是对党的百年理论创造史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的深化。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 100 余年，就是坚持和实践“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 100 余年。

中国国情不同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欧，也不同于产生列宁主义

的俄国。因此，不能直接把经典作家的论述拿来就用、照搬照套，而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研究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从而回答和解决在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革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100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特别是离不开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认识和把握，离不开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找准主要矛盾，围绕解决主要矛盾明确主要任务并组织实施。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告诉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能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取决于我们能否准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确定中心任务。”[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基于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深刻认识，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以此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基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深刻认识，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对我国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我们党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① 《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 年 1 月 12 日。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并以此作为一切工作和任务的前提，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在正确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的社会实践，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独特标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对等的外在的结合，而是马克思主义居于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是通过吸收、改造和转化，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100 余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 5000 多年创造的伟大文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使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跃升为现代形态。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哲学中“实事求是”这一命题相结合，用“实事求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关键词。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理想相结合，规划了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在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价值的挖掘阐发与传承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述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以高超的中国智慧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贯通、相互提升、相互融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焕发蓬勃生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深地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展现中国气派，体现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

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才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只要我们党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15 页。

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

理论来源于实践，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根本目的。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使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决定因素。理论只有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使实践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做好理论武装工作，坚持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回望百年党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跨越国度、跨越时代，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还在于党始终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在人民群众心中落地生根。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古田会议，延安整风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活动，以及新时代以来的学习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武装都贯穿其中，都带来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大提升，都引领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发展。

（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大众化的努力。他们办刊物、写文章、办夜校、开讲座，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出最早的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者。1925 年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党应当作群众中的鼓动和宣传。每一个党员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宣传我们党的主义及口号。在大革命时期，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革命，党采取民歌、戏剧、标语、图画和讲演等农民喜闻

乐见的形式来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曾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治宣传普及乡村……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①

大革命失败后，针对中国革命中心开始由城市向偏远农村逐步转移的情况，毛泽东指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重要性问题，并在 1929 年的古田会议上正式确定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会议决议明确要求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编制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对不认识字的党员要求学会读书报，上政治课实行十大“教授法”等。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度陷入了机械和僵化，革命也遭到了巨大损失。为此，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解读。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不得不提艾思奇与《大众哲学》。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1934 年 6 月，在社联的安排下，艾思奇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申报》当时设有副刊“读书问答”专栏，刊登读书指导部回答读者提问的文章，公开解答各地读者提出的各种思想问题，深受读者欢迎。“艾思奇”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用的一个笔名。因“读书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35 页。

问答”只占《申报》1/5 版面，已不能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申报》在 1934 年 10 月 8、9、10 日连续三天，宣告“读书问答”栏停刊，另出《读书生活》杂志。

艾思奇在“读书生活”主持内部编辑业务。他从大量的读者来信中了解到，广大青年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再加上连年内战，天灾人祸，经济破产，又面对失学、失业的威胁，产生了许多苦闷、疑问和焦虑，许多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也看不到国家的出路。针对这种情况，艾思奇决心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实际，用深入浅出的手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众写哲学，使抽象、深奥的哲学具体化、通俗化、大众化，使人民群众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1934 年 11 月，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专为大众写的《哲学并不神秘》。此后，他在《读书生活》杂志上每期发表一篇通俗易懂的哲学文章，到 1935 年 10 月，共发表了 24 篇。这 24 篇文章在 1935 年 12 月结集成书，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哲学讲话》。《哲学讲话》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36 年 6 月，艾思奇对该书稍加修改，更名为《大众哲学》，重新出版。到 1938 年，《大众哲学》已出了 10 版。到 1948 年，已出到第 32 版。《大众哲学》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它的影响下，许多青年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意识形态，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一支歌”“一本书”的说法，“一支歌”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大众哲学》堪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之作。

新中国成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为此，在解放每一个城市后，党都要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短期政训班，提高各方面人员的基本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特别是针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党通过开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参加政治大学、政治训练班学习的人数达 47 万，参加工人夜校、工人业余文化学校学习的人数约 50 万，参加市民业余补习学校学习的人数约 70 万。另有全国大中学校师生 100 多万人参加了政治学习。”[①] 在社会主义改造任务顺利完成之后，党又领导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工人群众、知识界和高等院校、工商界和民主党派等不同群体中开展了各有侧重的思想教育。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学理论，学哲学”的号召。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从学校到里弄，到处刮起群众学哲学之风，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78 年 5 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实现了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也是一场引导广大群众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理论意义。要求尽快组织宣传思想战线上的骨干力量，早作规划，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研究、出版一批内容新、思想新、语言新的文章、著作、教材，以弥补一段时期以来的遗憾和空白。邓小平也身体力行推动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提出了“不管白猫

① 郭沫若：《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陕西政报》1950 年第 4 期。

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大众耳熟能详的思想观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为应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以更大力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宣传普及工作，在全党上下深入开展了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时，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

2019年1月1日，一个功能强大、内容丰富的新思想学习平台——“学习强国”全新亮相，上线仅三个月注册用户就突破1亿人。今天，上“学习强国”App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讲话已成为亿万干部群众每天的“必打卡”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也已成为人们理论学习的案头册、必备书，一个平台、一本读物会受到这么多人关注、产生这么大影响，还从来没有过。

为了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我们党坚持党内集中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坚持抓好“关键少数”与覆盖全面相结合、坚持集中教育培训与深入宣传阐释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以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参加的形式和方法开展宣传阐释，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传播这一思想，综合运用各种教育平台、各种栏目形式、各种节目形态进行报道，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群众、引领青少年学生教育的时代最强音。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播的主题“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特别节目，从“习近平用典”的角度出发，用日常的语言，生动的案例，感人的故事，讲述深刻的道理，把理论“落细落小”，让思想“绵绵用力”，做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落细落小”，也做到了宣传效果的“走心入心”。同时，一些主流媒体还积极适应网民的接受习惯，综合运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形式对理论内容进行再创作，实现内容产品从可读到可视、从静态到动态、从一维到多维，使这一思想动起来、活起来，更加有温度、有色彩、接地气，达到个性化制作、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交流的效果，让网民在“悦读”中受到理论教育和熏陶。此外，中央主要媒体“中央厨房”的做法，加快构建党的创新理论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矩阵，形成线上线下相互配合、网微端同频共振、中央和地方遥相呼应的大格局，达到“一次生成、多媒体推送”的效果，大大提升了优质内容在网上的到达率、阅读率、点赞率、转发率，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在网上高高飘扬。

100多年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极其注重寓教于文、寓教于乐，注重并善于用优秀文化和文艺作品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是我们党加强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也是不断提升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制胜法宝。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要求艺术家和作家的个人创造力服从于中华民族奋斗目标，作家要为人民创作，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进入新时代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以优秀的文艺创作融入并记录壮阔时代，生动塑造革命先辈和模范的光辉形象，弘扬崇高理想和英雄气概，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二）推进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更要面向全党。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措施，也是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展了十余次党内集中教育。虽然每一次集中教育的主题、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但每次都是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对解决当时的突出问题，对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党员头脑，起到了强大促进作用。

1942 年至 1945 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先河。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1947 年至 1949 年的整党运动，主要是为解决一些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

1950 年的整风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展的第一次整风运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1951 年至 1954 年的整党运动，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尤其是那些新近建立党组织和发展新党员较多的地区，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旨在普遍地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的队伍。

1957 年的整风运动，主要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

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1983 年至 1987 年的整党活动，主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999 年至 2000 年的“三讲”教育活动，主要是讲学习，包括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则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

2005 年至 2006 年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以“增强党员素质、加强基层组织、服务人民群众、促进各项工作”为目标，重点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标准。

2008 年至 2009 年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紧紧围绕“党员干部受教育，科学发展上水平，人民群众得实惠”的总要求，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全体党员参加，自上而下分三批进行。

2010 年至 2012 年的创先争优活动，主要内容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继续。

2013 年至 2014 年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突出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2015 年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这次专题教育作

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延展深化，把学习教育放在首位，组织专题党课、专题学习研讨、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着力解决“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

2016年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即“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

2019年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这一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2021年的中共党史学习教育，重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2023年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为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2024年的党纪学习教育，在全党进一步营造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浓厚氛围，推动各级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强化遵守纪律的自觉，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全党自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知行知止、令行禁止，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合力。

党内集中教育成效明显。集中教育往往适逢重要理论创新节点，或者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时刻，并且普遍以“团结党内思想认识、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服务工作实践”为目标，每一次集中教育都有力提升了全党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整风运动、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教育活动，还是新时代以来的集中教育，无不有力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实现了全党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上的统一，推动了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在理论武装、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每一次集中教育都有效地解决了当时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保持并推动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历次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虽然名称各异，时间也横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多个历史阶段，但从总体上看，每次主题教育都是坚持问题导向，都是着眼于解决一些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现实问题，使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好守住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进而为各个历史阶段党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提供基础保障和内在动力。

（三）推进领导干部的理论教育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关键是武装领导干部的头脑。党校就是中国共产党用来系统教育党员干部、强化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和理论武装，培养提高党员干部能力素质的专门机构。1938年10月，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大众化的历史任务，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

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为彻底纠正党内不良风气，20 世纪 40 年代毛泽东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三次改组中央党校，并以中央党校为大本营领导开展了全党的整风运动，纠正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据记载，1924 年创办的安源地委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党校。1933 年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则是中央党校的前身。中央党校、省级党校主要承担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任务。市县两级党校数量多，大约承担了 90%以上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任务，是教育培训基层党员干部的主力军。

哪些人需要到党校学习，怎么确定，谁来确定呢？通常是按照计划选调。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培训，由党的组织人事部门统一选调。选调的对象主要是干部队伍中的精英和骨干。此外，中央党校和省级党校还承担着理论宣传干部和党校师资的培养任务。中央党校和部分省级党校还招收培养国民教育学位研究生。

教学是党校（行政学院）的中心工作。202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对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体系构成作了进一步概括和完善，明确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体系主要包括 4 个方面，即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和知识培训。其中，党的理论教育是根本，党性教育是核心，履职能力培训是关键，知识培训是基础，四者共同构成了特色鲜明、主次分明、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中国特色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体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4 页。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本遵循，也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题主线、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运用党校这个阵地，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组织保证。其中，以中央党校为中心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期间正是中央党校历史上规模最大、学员人数最多的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各方面的 1000 余名高级干部、2000 余名中下级干部和延安之外的七大代表（占代表总数的 53%）集中在中央党校。党校的整风实际上是全党高级干部的整风和七大代表的整风。[①]

改革开放后，党校紧紧围绕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全局，为推进党的理论建设、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发起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党校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78 年 5 月 10 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 60 期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一场全国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展开。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事业发展也迎来了新的黄金期。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党校姓党，决定了党校工作的重心必须是抓党的理论

① 赵理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90 页。

教育和党性教育。如果党校把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这个主业主课放松了，甚至荒废了，搞了很多其他方面知识、技能、兴趣的东西，那就会喧宾夺主，甚至会在政治方向上发生偏差。他还说："党的十七大后我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就不断讲这个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在教学中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自2013年起，中央党校每年都举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讨班，实现了对现任省部级干部集中轮训的全覆盖。中央党校校委还组织修订了教学计划，在各主体班次和学位研究生教学中开设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单元。与此同时，在全校所有主体班次普遍开设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课，引导学员从理论源头上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在中央党校的精心指导和示范带动下，全国省级党校及基层党校也陆续以各种方式推进领导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上而下、覆盖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热潮，促进了各级干部思想理论水平的提升。

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也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武装领导干部头脑的重要形式、途径。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是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职理论学习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制度，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独特的政治优势。201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这是关于中心组学习的一部专门党内法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心组学习的重要体现，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理论武装工作深入开展，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章
人格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①] 邓小平也曾说过："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②] 党的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精神风貌、崇高的道德风范和优良作风，是党的软权力的重要内容。人格力量能够形成强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带动力，焕发出党和群众的磅礴力量，甚至让敌人都不得不羡慕。10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用伟大精神、优良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凝结而成的人格力量，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最直观、最感人、最具魅力的力量，是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无比强大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人格支撑和保障

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人格力量，焕发出了强大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进而产生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领导力。那么，什么是党的人格力量？党的人格力量与党的领导力有什么关系？人格的力量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57页。
② 张世良：《怎样炼成好干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2页。

最直观、最感人、最具魅力的力量，又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新时代严峻挑战和各种风险，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永远站在历史制高点的伟大力量的呢？

（一）崇高人格使人发自内心地产生信任和敬意

我们通常说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崇高品格、崇高风范，使人们发自内心地产生信任、产生敬意，进而决定追随党、拥护党、支持党，这就是党的人格力量。具体反映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崇高品格、崇高风范的词语有很多，如信仰坚定、大义凛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克己奉公、两袖清风、鞠躬尽瘁等等。概括反映共产党人崇高品质、崇高品格、崇高风范的表述，当属毛泽东在其名篇《纪念白求恩》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还有一个我们常说的觉悟一词，差不多和我们党的历史一样漫长。周恩来早期革命活动就包括创办"觉悟社"。

不少老党员，不会讲什么道理，但他们懂得觉悟一词，并能够准确诠释：打仗时，扛着炸药包往前冲不要命，叫觉悟高；面对危险时，不要滑头、不当逃兵，用生命掩护组织和同志，叫觉悟高；与人相处时，总是想着战友和同事，把仅有的一点干粮和水让给别人，叫觉悟高。

时代变了，但觉悟的思想内涵没有变：立功受奖了，甘愿和大家拿一样多的奖金，这叫觉悟高；到艰苦地方工作，不讲困难，不计得失，这叫觉悟高；受了委屈，不闹情绪，任劳任怨，继续努力工作，这叫觉悟高；不徇私情坚持原则，把超出常理的好处坚决退回去，这叫觉悟高。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觉悟是具体的，也是实在的。在老百姓眼里，这些具体事、实在事，展示出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让人佩服甚至崇敬。从这个角度说，共产党人应有的觉悟，以及这种觉悟带给人的感受和效果，就是党的人格的力量。

（二）拥有崇高人格才有强大领导力

提升党的领导力需要很多条件，铸就党的崇高人格、增强党的人格力量，是提升党的领导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赢得民心。"①

1949年我们党夺取政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真理的胜利，也是人格力量的胜利。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上海。从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上海的统治彻底结束，也在此时，诞生了一张新中国创建时期著名的经典照片——解放军夜宿上海街头。因为在上海战役前，陈毅等领导人就制定了《入城守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市区不使用重武器，二是不入民宅。这一举动，不仅让上海百姓感动不已，也让原本担忧安全没有保障的西方各国外交官震撼。美国合众社的报道记录了当时的场景："中共军队军纪优良，行止有节，礼貌周到……虽然有许多大厦是大开着，可以用来做军营，而中共军队仍睡在人行道上。"

后来，我们又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同样是真理的胜利，也是人格力量的胜利。

① 习近平：《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页。

在党的全部历史进程中，体现共产党人人格力量的人和事数不胜数。

抗战时期的一天，萧劲光来见毛泽东，发现毛泽东大白天盖着被子在炕上读文件。一了解，才知道毛泽东将仅有的一条棉裤洗了正放在火盆上烤。萧劲光要去军需仓库给毛泽东拿一条新棉裤，被毛泽东果断制止：共产党人不能为己谋私，一丝一毫也不能多占！

还有深为人民群众怀念的周恩来总理，他顾全大局，能力超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其高尚的人格，给后世留下无尽的美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曾经说："是周恩来的人格力量说服了我。我觉得，一个拥有如此高尚的领导人的政党是值得信赖的。"①

再看21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处于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兴利除弊，革故鼎新，兼具历史特点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整体人格正在得到重新塑造和弘扬光大。

古往今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党的1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赢得人民的认可、尊敬和追随，靠什么？靠真理的力量，靠人格的力量。让党的崇高人格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升华和发扬，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是锻造中国共产党强大领导力的重要内容。

既然人格力量对党的领导力这么重要，那么崇高人格究竟是从哪几个方面表现和体现的呢？在我们党的话语体系中，有三个内容最能充分体现党的人格力量：一是党的伟大精神，二是党的优良作风，三是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① 刘明：《大题小论》上册，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摸得着、叫得响、能共享的当代理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是指引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就是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0 多年来，围绕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结束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为了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人民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为了这个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党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作为，自觉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责任扛在肩上，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为的是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凝聚人心、带领人民坚毅前行的根本动力。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就是始终保持斗争精神、顽强意志，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斗争就会有牺牲。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骨和品质。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就是在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从古至今，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干这样的大事。世界上也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1 年至 1949 年，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 370 多万人。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前进的道路上团结带领人民不怕牺牲、向死而生，毫无畏惧、毫不退缩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才能创造伟大成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就是无条件地爱党护党为党，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根本要求，做到忠诚于党的信仰，忠诚于党的组织，忠诚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因传统和道德自觉，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以贯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100 多年来，无数中国共产党人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落实在行动上，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乃至宝贵生命，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党忠诚与不负人民从来都是一致的，凡是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凡是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伟大建党精神是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先驱在20世纪20年代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民族复兴历史任务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正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主题下，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各个因素开始孕育、形成，并在不断的斗争中丰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来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陷于彷徨和苦闷中的中国人民由此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和希望，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道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出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先进分子集合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积极投身群众斗争实践，到工人中调查生活、宣传革命、办学校、办工会。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推动了伟大建党精神的萌发。

伟大建党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先进分子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组织，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组织工人群众，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领导各地党组织开展劳工运动和党团建设。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诞生第一部党章，健全中央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工作顺利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在实践中建立了党的组织，在精神上形成了伟大建党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文化土壤。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中国先进分子以国家兴亡为己任，郑重选择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滋养。

（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精神谱系

党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征程的起点，经过百年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铸就了一系列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0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

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②]

1921 年 7 月 23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13 位代表以及马林、尼尔克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聚齐，召开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 月 30 日，因法租界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开会。自此，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的同时，铸就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等伟大精神。

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伟大飞跃的同时，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等伟大精神。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在实现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同时，铸就了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等伟大精神。

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党团结带领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同时，铸就了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伟大精神。

这一系列伟大精神，在不同时期体现出各自特点、不同含义，但本质内容和精神实质却一脉相承、相通相融，追根溯源，都可以在伟大建党精神中找到其精神渊源和底色底蕴，因而是伟大建党精神这一“源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水”涌流，是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不同历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87 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78 页。

史任务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具体表现，共同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每一种精神，虽然都有自己的特定内涵，但其实各种精神都有共同的“内核”和不变的“基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崇高人格，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并取得辉煌成就，与共产党人具有这些伟大精神密不可分。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在当代同样受到广泛认可和追捧。2021年，中国青年报社在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2064名青年进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专项调查显示，97.7%的受访青年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调查显示，让受访青年感到无比敬佩的精神中，长征精神（58.9%）、抗战精神（46.0%）、“两弹一星”精神（43.2%）排在前列。其他让受访青年无比敬佩的精神还有：井冈山精神（41.4%）、建党精神（37.3%）、延安精神（36.5%）、改革开放精神（36.0%）、抗疫精神（35.8%）、抗美援朝精神（35.4%）、科学家精神（28.8%）、载人航天精神（28.7%）、抗震救灾精神（28.7%）、工匠精神（26.8%）、抗洪精神（26.5%）、西柏坡精神（26.3%）、劳动精神（23.4%）、脱贫攻坚精神（21.0%）、劳模精神（19.1%）等。调查还显示，一个政党要能成大事、立伟业，不可或缺的精神还有：坚定信仰、坚守理想（62.5%），担当有为、无私奉献（60.1%），独立自主、自力更生（59.4%）。受访者认为不可或缺的精神还有：清正廉洁、严守纪律（55.2%），开拓进取、自强不息（53.1%），团结互助、和衷共济（52.1%），敢闯敢干、敢为人先（49.8%），舍生忘死、视死如归（47.8%），大胆实践、勇于创新（47.1%），百折不挠、艰苦奋斗（44.0%）等。[①]

三、党的优良作风

党的优良作风与党的伟大精神一样，不是虚幻的、难以把握的，其核心和本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崇高人格，既是形象，也是力量。

（一）延安与西安两地截然不同的景象与作风

1940年，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战火纷飞，物资匮乏。这时，曾经多次为祖国募捐、支援抗战物资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决定亲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

在延安，陈嘉庚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就被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所震惊。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所有的陈设，不过是墙上挂着的一张地图，地上摆着大小不一的木椅，还有一个旧式木桌。吃饭时，餐桌上最贵的菜就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毛泽东有贵客来了，主动把还在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

大街上，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官员无关。这里的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这里没有失业游民，更没有盗贼乞

① 王志伟、王九龙：《97.7%受访青年认同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受访青年感到无比敬佩的精神有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中国青年报》2021年9月23日。

亏。更令陈嘉庚震惊的是，部队都是自己种粮食种菜，自给自足的。

其实在此之前，陈嘉庚曾受到蒋介石接待。其景象与这里截然不同。那里弥漫的是奢靡的气息，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官员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大街上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浪费严重，一切景象与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粮食、弹药紧缺的抗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陈嘉庚在延安只停留了 8 天，但延安的景象与作风，让他懂得中华民族的救星在延安，让他从之前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也由此诞生了“延安作风”与“西安作风”两种概念。其中，“延安作风”是指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再具体一些，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朴素等；而“西安作风”是指国民党的作风，概括来说就是贪腐之风、结党营私、生活奢靡等乱象。

1940 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到延安马列学院讲课，蹚过延河时碰到前来迎接的邓力群等四人。他当即批评：一人做报告，四人来迎接，要不得！要养成新的、清正的、廉洁的、不搞歪门邪道的“延安作风”，打败国民党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的“西安作风”。

那么，为什么“延安作风”能够打败“西安作风”呢？我们不妨对比一下。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这样的时局转换，给党带来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明确提出把“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目标，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他还向全党高瞻远瞩地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缺一不可的任务，为此必须和各种“党内的腐

化思想作斗争”。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绝不因资格、官职和曾经的业绩而姑息或宽恕腐化分子，“黄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证，以此强化党抵御歪风邪气的肌体，树立昂然向上的正风。

反观国民党，在抗战之初，国民党曾要求其党员“不容再有丝毫因循泄沓，更须发挥实干精神”，但并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来根治久已存在的歪风邪气，其结果是顽症勃发，贪污腐化、结党营私、欺压百姓、浮报夸功、敷衍塞责、弄虚作假、文过饰非、裙带作风、文牍主义等不断蔓延加深。这种腐朽风气愈演愈烈，在日本投降后达到极致。

国共两党迥然不同的作风，产生的作用与影响自然迥然不同：中国共产党作风优良，朝气蓬勃，受到群众支持，结果是战胜了国民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国民党则在严重的腐化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离心离德，最后分崩离析，以失败告终。毛泽东预见和期望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最终成为现实。

成为执政党后，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党的优良作风不断得到弘扬、丰富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开局，驰而不息纠“四风”，雷厉风行抓作风，刹住了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中央八项规定改变了中国，作风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亮丽名片，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交口称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二）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

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对作风建设有过精辟论述，都非常重视抓好作风建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战争环境下，党把作风建设作为安身立

命的重要法宝，与不正之风坚决斗争，以优良作风赢得民心。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开创了党的优良作风。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 1930 年，毛泽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寻乌调查》《调查工作》[②]《兴国调查》等光辉文献，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与此同时，在红军建设方面，毛泽东同样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1927 年 9 月，针对军队的现状，毛泽东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于一体的"三湾改编"。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均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开始走向成熟。1942 年到 1945 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从延安延伸到各敌后根据地、从高级干部到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并强调"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延安整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比如，学习整风文件、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除此之外，在秉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下，对犯过错误的人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教育。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进一步深化。1945 年 4 月 23 日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1—112 页。

② 《调查工作》一文后来散失，30 年后重新找到，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作风概括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春节，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为重点的整党工作。此次整党工作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结合新式整军运动开展整党活动。新式整军运动从 1947 年冬一直延续到 1948 年夏。通过整军，部队的作风得到改进，军民关系也变得更为密切。面对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1949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并作出 6 条具体规定：不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回望历史，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作风优良，保证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所预言的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执政兴国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作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快速发展，党员人数大增。到 1951 年 4 月，党员总数达到了 580 万人。然而，在党员人数大增的同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新党员思想作风不纯，一些老党员则骄傲自满。面对新情况新问题，1950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次整风运动从 1950 年下半年开始到年底结束，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1951 年 3 月 28 日至 4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对整党工作做了部署。这次整党主要是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目的是提高党员素质，纯洁党员队伍。在整党期间，党中央还开展了"三反"运动。"三反"以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城市和机关展开。"三反"运动与整党运

动相结合，使整党达到了更好的效果。1956 年 9 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认真总结了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分析了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党的八大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要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经过整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队伍作风明显改善，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凝聚了广泛力量。这一时期，我们党及时警示和打击了新的历史环境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有所滋长等作风问题，引领了一种新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邓小平反复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他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 他进一步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②，要求整顿党的作风，把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持下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③。进入 21 世纪，胡锦涛要求全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这一时期，为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教育、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使全党精神面貌和作风状况焕然一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

①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8 页。
③ 《江泽民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1 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作风建设放到更加重要位置，将其作为衡量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和人民忠诚的一把十分重要的尺子"①。创造性地提出从政治上认识和把握作风建设问题，将作风建设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联系起来，警醒全党必须始终站在关乎党生死存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看待作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执政党如果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② 推动作风建设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联动发展，使改进作风的过程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重大理论命题，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永远没有休止符""以钉钉子精神驰而不息纠正'四风'"解决作风问题，"要像人防止疾病复发一样来抓"，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坚决克服"疲劳综合征"，

①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3 日。
②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 页。

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紧紧抓住作风建设这条主线一以贯之，步步深入。创造性地提出抓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比如，坚持问题导向；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让一个个节点变成作风建设“加油站”，形成驰而不息的工作节奏，上下一体同频共振；坚持把系统观念作为推进作风建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保持纠治这一手不放松，也同步抓好制度建设、日常教育，彰显“三不”一体推进的综合功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总结继承党的作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既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作风建设的基本理论，同时又赋予了作风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开辟了作风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新境界，取得了作风建设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开创了从严管党治党的新局面。

（三）党的优良作风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要求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其基本精神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党从六大到现在，之所以能够经历国内外重大事变和考验，成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强大的共产党，是从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中锻炼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93—1094 页。

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中锻炼出来的。党的七大第一次正式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提出来。1949 年 3 月，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即“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他进一步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2001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着重研究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优良作风的内涵和要求做过多次论述。2021 年 3 月 1 日，他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作了系统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

①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57 页。

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就是：对党忠诚、理论联系实际、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开展自我批评、敢于斗争、艰苦奋斗。[①]

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对党忠诚，必须一心一意、一以贯之，必须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其节。要立志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

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

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共产党的干部要坚持当“老百姓的官”，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不要做官当老爷。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从政干事，首先要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不断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要拜人民为

① 《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们共产党人开展自我批评，根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要有“检身若不及”的自觉，经常对照党的理论、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初心使命、对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动查找、勇于改正自身的缺点和不足。要本着对党、对事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精神大胆开展批评，帮助同志发现缺点、改正错误，团结同志一道前进。要涵养虚心接受批评的胸怀和气度，胸襟开阔、诚恳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一点也不会比过去少。要自觉加强斗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要坚定斗争意志，不屈不挠、一往无前，决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缩不前，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要善斗争、会斗争，提升见微知著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先机、趋利避害。要加强战略谋划，把握大势大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轻重缓急，科学排兵布阵，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增强底线思维，定期对风险因素进行全面排查。要善于经一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练就斗争的真本领、真功夫。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要接过艰苦奋斗的接

力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年轻干部要时刻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四、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

中华民族自古有重视德育的优良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到以德修身、以德为政。《礼记·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品德修养列为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党的道德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无数共产党员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用牺牲和奉献打造了共产党人的道德大厦，形成了我们党在道德上的政治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道德在治党、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名篇，刘少奇写下了被人们赞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经”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们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型道德观。

党执政以后，特别当历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我们党一直在强调“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两次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问题，并通过了专门的决议。进入新世纪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以德治国”的主张，并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作为今后的治国方略。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提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①]，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②]。同时强调“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并进一步强调“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③]。

正是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使党站在了道德制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0 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7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21 页。

高点，极大地促进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回顾党的历史，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共产党员宁愿背叛剥削阶级的家庭，放弃个人安逸舒适的生活，甘愿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投身革命；许多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坚守党的秘密和操守；许多共产党员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冲锋在前，流尽最后一滴血。在“二七”大罢工中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林详谦；大革命失败后，喊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等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誓言的夏明翰；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人民英雄方志敏；抗日战争时期，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悬崖的“狼牙山五壮士”，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解放战争时期，“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挂帅”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等，是这一时期具有崇高道德情操的共产党人优秀代表。

革命胜利以后，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革命建设和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许多共产党员辛勤劳动、无私奉献，在工作岗位上以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为荣；许多共产党员甘愿当一颗平凡的螺丝钉，为人民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忠诚和汗水。这一时期，同样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抗美援朝战场中的“最可爱的人”——飞身堵枪眼的黄继光、烈火烧身却纹丝不动的邱少云；带领兰考人民治理“三害”的好书记焦裕禄；“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在平凡的岗位上，勤恳踏实，干一行爱一行，甘当“螺丝钉”的雷锋。这些英雄模范人物的高尚道德风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民奋勇前进。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许多共产党员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搏击中，立下了新的历史功绩。这一时期涌现了孔繁森、牛玉儒、杨善洲等一大批无私奉献的

榜样人物。党的好干部孔繁森三次援藏，热血洒高原。孔繁森第一次援藏是在1979年。他到西藏后，便任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在3年的任期里，他跑遍了全县所有的牧区和乡村。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援藏，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在到任的4个月里，他就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村办小学，为的就是更好地解决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1992年底，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孔繁森为阿里地委书记。面对这一任务，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阿里工作的第一年，阿里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为了更好地发展阿里的经济，孔繁森决定去新疆西南部的塔城进行边境贸易考察。1994年11月29日，他在返回阿里的途中因发生车祸殉职。孔繁森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无数共产党人用自己的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书写着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风范。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的黄文秀就是崇高道德风范的典范。黄文秀生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干部。201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便自愿回百色革命老区工作。2018年3月，黄文秀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到边远的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在担任第一书记期间，黄文秀把私家车当作工作车，花了2个月时间遍访全村195户贫困户，并绘制了“贫困户分布图”。想要富，先修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文秀天天往村里跑，带着村“两委”班子，画下了详细的地形图。在黄文秀的带领下，百坭村的贫困发生率从23.88%降至2.71%，88户418人顺利脱贫，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增收6.38万元。2019年6月17日凌晨，黄文秀在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不幸遇难，年仅30岁。

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展现出了令人仰慕的崇高道德情操。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情操是中国共产党伟大人格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崇高道德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其萌芽、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其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的马克思。17岁的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出要“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为全人类作牺牲”的伟大志向。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们在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无产阶级道德观作了具体的展开和分析。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就包括对“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道德观的发展。1944年9月，为纪念张思德同志，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首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印刷厂礼堂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指出：“为人民服务，不能是半心半意，不能是三心二意，一定要全心全意。”[①] 此前，1939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倡导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向全党提出了“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① 刘思妗：《“为人民服务”：何时被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为何要“全心全意”》，《北京日报》2020年4月9日。

的道德要求。[①]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标准和根本宗旨，是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以贯之的基本内容。

从实践来看，从党的领袖到普通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道德情操，集中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谈及毛泽东的人民情怀时曾说：“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中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②] 虽然这是作者20世纪30年代的预言，但已完全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任何脱离群众的作风都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有6位亲人先后光荣牺牲，这其中就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弟弟和妹妹。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大众福祉而殚精竭虑的一生，也是人民大众对他的感情日渐浓郁的一生。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动情地如是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邓小平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坚强的意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6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

1984年10月1日，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活动中，出现惊奇一幕：只见在天安门城楼前游行队伍中，突然自发地展开一条横幅，写着“小平您好”！这是来自人民内心的呼唤。事实证明，一个人唯有一心为百姓着想，为人民谋利，人民才会拥护他、爱戴他、追随他。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习近平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正定工作的3年，他为民造福，解决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任伊始，他就解决了关系全县人民温饱的征购负担过重的问题，摘掉了正定“高产穷县”的帽子。他重视教育工作，改善小学办学条件，关注教师待遇，还使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汽车的县。到正定工作后，他经常骑自行车下乡调研，走访群众。在得知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后，他便与当时的县长程宝怀商量，选取几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大包干”试点。一年后“大包干”试点便取得了成功，公社农业产值翻了一番半。程宝怀曾说，“他无时无刻不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在他心里重于泰山。他把人民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说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我们再来看一个基层村党支部书记的事迹。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能吃亏自然就少是非；
当干部就应该肯吃亏，肯吃亏自然就有权威；
当干部就应该常吃亏，常吃亏才能有所作为；
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吃亏才能有人跟随；
能吃亏、肯吃亏、不断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
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亏，在人前你才好吐气扬眉；
吃亏吃亏能吃亏，莫计较多少赚与赔；
吃亏吃亏常吃亏，你永远不会把包袱背；
吃亏吃亏多吃亏，吃亏吃得众心归；
吃得你人格闪光辉！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戏曲也不例外。这是河南豫剧《村官李天成》选段《吃亏歌》的歌词，取材于河南濮阳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带领全村勤劳致富的故事。一个小村子的书记，为何会被传唱呢？

早年的西辛庄由于受黄河侧渗的影响，盐碱遍地，庄稼很少有好收成，李连成想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于是他将自己的两个蔬菜大棚无偿转让给村里的两个贫困户，并公开承诺，谁搞蔬菜大棚，他就帮助垫借钱，跑贷款，义务提供技术指导。就这样，西辛庄蔬菜大棚很快就发展了起来，仅此一项，使村里年人均增收500多元。

1994年，李连成带领村民办再生纸厂。然而那时，村集体没有积累，银行贷款困难，村“两委”决定由村民共同入股。李连成自己率先入股，并向乡亲们承诺“赚了大家按股分红，办砸了我自己赔”。没想到仅两年时间，纸厂就获利200多万元，每股分红达12.7万元。但是考虑到当初还有人没入股，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李连成就把正红火的纸厂低价转让给了全村，让全村农户“家家是股东、户户有工人”。

在新村宅基地划分时，李连成家附近的6家需要搬迁一家，让谁搬？李连成说：“数我的房子好，我又是支书，我搬。”往哪搬？他给别人说：“咱是支书，要带头吃亏，哪没人要往哪搬。”正因如此，全村80幢二层小楼顺利建成并交付使用。有周边的村干部来取经，问西辛庄怎么能顺利解决农村宅基地这一难题，李连成说：“这好办，村干部能带头吃亏就行了。”

李连成为村民利益吃亏，表面上看，自己失去了一些物质利益，

但收获的是村民的信任和拥护，这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李连成为了群众甘愿吃亏，体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道德情操，因此也得到了群众的支持，使西辛庄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列。

在这里我们看到，“德”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有着实实在在的内涵。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所带来的巨大力量。正因为如此，党章把“发扬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作为党员必须遵守的八项义务之一。

（三）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新时代党员、干部的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内容内涵问题。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就强调：“‘德者，本也。’蔡元培先生说过，‘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这就是我们的用人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①]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①]。2018 年 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②] 2018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古人讲：‘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③]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验总结，是对治党治国规律的深刻把握。在这些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党员、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是对党的道德建设内涵和要求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明大德主要是锤炼政治品格，就是要铸就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和民族的良好品格，坚定信仰，保持政治定力。要做到在政治上不迷茫，思想上不偏向，是非上辨得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

① 《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人民日报》2014 年 5 月 5 日。

①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7 年第 1 期。

② 《领导干部要讲政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 页。

③ 习近平：《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求是》2019 年第 1 期。

旗帜鲜明；在大风大浪面前，始终保持坚定立场，笃志躬行；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始终坚如磐石。

守公德主要是严守公众之德、公权之德和工作之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做到“身处闹市心如止水”“身外之物无贪无求”，一心为公、用权为民，心底无私天地宽。共产党的权力姓公不姓私。俗话说，“做人可以一生不仕，为官不能一日无德”。人民公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杜绝以权谋私、结党营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一心为私。

严私德主要是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就是要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要正确对待友情、亲情，要从党性原则的高度交友，远离功利、势利、唯利的“朋友”。在亲情的问题上，要守住底线，既要讲亲情，更要讲家国情怀。要严格家风，对待家庭要修其家廉，对待子女要修其美德。

新时代以来，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离不开高尚道德情操的弘扬光大。总体来说，共产党人的高尚道德情操不管有多少要求和表现形式，其共同特征仍然可以归结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崇高人格。它与党的优良作风、伟大精神共同构成的人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卓越领导力的强大支撑。

第六章
本领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十三亿多人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①] 实现党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归根结底要靠党的政治过硬和本领高强。没有政治过硬，就没有正确的方向；没有本领高强，就没有党的伟大成就。本领，也就是才学、能力、技能。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古之成大事者，不仅要有“坚忍不拔之志”，还要有“超世之才”，必须“才”“志”兼备，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只有大力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做到“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是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解决“本领恐慌”问题，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练就了出众的能力、高强的本领，才使党和人民事业实现了大发展大进步。这就是本领的力量，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力离不开本领的支撑和保障。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本领支撑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一个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重要条件在于始终警惕和破解“本领恐慌”，不断增强领导能力和本领。

（一）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积极破解“本领恐慌”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走上国民革命领导地位。随着党组织迅速壮大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干部恐慌”和“本领恐慌”同时困扰着中国共产党，各地纷纷向中央要干部。这一问题在大革命高潮中尤为突出。“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至少需要区执委、地执委、特支干部355名，而当时只有120名，为实际需要的三分之一”[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把开办党校、加强党内教育作为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认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根据这个决议，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

在创办地方党校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办中央党校。1926年2月，党中央特别会议通过《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北京及广州各办一长期党校”。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五大所设立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机构中，增加了“党校委员会”，书记为瞿秋白。后因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央党校没有办成。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但“干部恐慌”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和“本领恐慌”问题随之又突出起来。1928年7月8日，江西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党在各种斗争中，虽然有新的发展，质量有相当的进步，可是得力干部分子仍然感着极度的恐慌……目前不仅感觉工农干部分子之缺乏，而且还感着知识干部分子缺乏之恐慌了，各地秘书之缺乏，苏维埃政府写布告都没人。”[①] 1929年6月25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来白色恐怖的严重压迫和牺牲，“各级党部都发生人才缺乏的恐慌，而向上级党部要人，这是没有出路的”。1929年2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举办了三期中央干部训练班，共培训学员50余人。在周恩来主持下还开办了中央特别训练班（包括军事训练班、兵运训练班、无线电训练班等），为红军和苏维埃区域培养各种急需的人才。学员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这类训练班一直开办到1930年底，因环境持续恶化而停办。与此同时，各苏维埃区域陆续创办党校，大量培养红军指挥人才和苏维埃工作干部。

创办于瑞金叶坪洋溪村的苏区中央局党校是中共中央局党校的前身，校长为任弼时，办学时间从1931年11月至1933年1月。赫赫有名的王震将军就曾经在这所党校学习过。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往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苏区中央局党校成为中共中央局党校。为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改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于1933年3月13日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1934年10月，随着中央苏区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葬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被迫停办。师生100余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共中央首次在自己掌权的区域公开举办的党校，也是建党之后党中央举办的规模最大、存

①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续时间最长的党校，标志着中央党校的创办。从1933年3月举办开学典礼，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停办，在一年半时间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共培训学员1000余人，在校学员最多时达10余个班600人左右。许多学员在党校不仅学到了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而且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素养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途中牺牲，幸存者中有不少开国将领、中央和省部级的重要领导人。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警惕和破解“本领恐慌”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势：一方面，要抗击侵华日军；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反共高潮和自己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而在当时，缺乏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成为困扰我们党的严重问题。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本领恐慌”问题提到全党面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①] 在这里，毛泽东将本领恐慌与政治恐慌和经济恐慌相提并论，甚至比政治恐慌、经济恐慌更加可怕，足见毛泽东对党和干部本领恐慌问题的极度重视。

面对干部队伍里的“本领恐慌”问题，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30多所干部学校应运而生，成为在艰苦条件下培养党员和干部的摇篮，为抗日战争新局面的到来以及全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好了准备。同时，毛泽东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号召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的前提下，加强学习，并且把学习办成一场运动。1940年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动干部学习，并采取一系列举措抓好贯彻落实。

这一时期，为确保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中共中央确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并将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进一步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主的学习内容，并组织编撰和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及苏联的教科书，例如《马恩丛书》《列宁选辑》《哲学选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为了“使每个人都学有所得”，普遍建立干部学习小组，并根据参加学习的干部从事工作、文化水平等的不同，划分为甲、乙、丙等不同类别的小组，分别规定不同的教育课程，分别指定教员、指导员帮助学习。为了督促干部学习，注重开展经常性学习检查。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4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举行。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

针对干部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同时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1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页。

定》，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12 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这一时期，为克服只注意马列主义抽象原则学习带来的危害，中共中央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加强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的主要内容，并陆续组织编撰了一系列学习教材，同时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调研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更加注重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 年 6 月 2 日，中共中央又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负责监督和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由毛泽东担任主任。总学委每周或者每两周召开一次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会，讨论学习问题，并先后派出许多巡视团和巡视员，深入各个机关和学校检查学习的情况。通过整风运动期间的进一步学习和讨论，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延安时期的大学习全面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全党用科学理论解决政治、军事战略、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能力，也为今后党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开始，通过学习增强本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和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使全党适应工作重心由武装斗争到和平建设的伟大历史转变，毛泽东又号召并大力推动全党努力学会过去不熟悉、不懂得的东西。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 年 12 月 13 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邓小平强调，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曾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学习什么？邓小平提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说，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此后，党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也像毛泽东、邓小平等同志一样重视全党的学习，在许多场合就学习的意义、学习的内容、学习的原则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还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任务，这都有力促进全党在本领和能力上适应了领导全国人民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警惕和破解“本领恐慌”

进入新时代，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的本领，随着形势和任务不断发展，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2013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 8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1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重提“本领恐慌”，强调

“‘本领恐慌’在党内相当一个范围、相当一个时期都是存在的”。现在形势发展变化很快，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难程度远远超过以往，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由于缺乏本领，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候也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实现党的各项目标任务，做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我们的本领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①

此时，习近平总书记重提“本领恐慌”，意在告诫、鞭策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以保证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他说，“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他提出：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既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他特别强调：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还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这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要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真正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① 他还就学习的目的意义、学习的方法作了深入阐发。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又向全党发出号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个大学习。”

①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

新时代以来，全党大学习制度得到有效健全和发展。一是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2002年12月26日，刚刚选举产生一个多月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进行了第一次集体学习。自此，政治局集体学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项制度建立以来，十六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33次集体学习，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3次集体学习，十九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41次集体学习。十八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的这80多次学习既坚持了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制度，同时又结合新时代的实际作了重要创新，除大部分学习由各方面的专家讲解之外，有四个新的安排：其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和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谈学习体会。其二，由中央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体会的有8次。其三，由有关省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谈体会和意见的有10次。其四，80次学习中有3次是先到现场参观之后再进行的。

二是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这一学习制度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并制度化。2017年3月，

①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3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共5章17条，对中心组学习的性质、原则，中心组的组成，有关成员的职责，学习秘书及有关部门的任务，学习内容、形式和要求，学习计划、督查、考核、通报、问责等，作出了更加明确的制度化规定。按照规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主要由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组成，可根据学习需要适当吸收有关人员参加。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学习的形式包括集体学习研讨、个人自学和专题调研。按照要求，集体学习每年不少于4次，每次都要精心设计学习主题，认真安排重点发言，有时也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组织专题讲座、辅导报告，组织党员深入开展学习讨论和交流。此外，党委中心组成员还被要求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实调查和研究问题，每年撰写一至两篇调研报告，并组织学习交流。在实践中，各地区还结合自己的实际推进这项制度创新，如有的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定期举办读书会，有的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建立了中心组学习巡听制度。这些学习制度，使领导班子成员能够坐在一起，互相交流，增进政策共识，以此来向党中央看齐。一年一至两篇调研报告，也让整天从事事务性工作的领导干部能抽出一定时间进行“冷思考”。

三是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学习制度与党员干部自主在线学习制度。“三会一课”，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党支部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时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从而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一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员学习的重要制度保障。2016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必须参加党员大会、党小组会和上党课，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委员会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内准则的形式，完整地将“三会一课”制度作为党内生活基本制度固定下来。为了保证“三会一课”取得应有的效果，很多地方和单位不断进行探索和创新，如有的基层党支部自2014年以来组织开展“我来上党课”微型党课，受到各方肯定。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中共中央大力推进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工作。全党层面已经建立了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在线学习平台。每个省市区，绝大部分的地市州，都建立了自己的党员干部在线学习中心（平台），出台了相关的在线学习制度。有的地区和单位还建立了自己行业或者内部学习网站，并实现了全天候、全方位、全覆盖的中国共产党现代学习网络。

四是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制度和各级领导干部脱产集中到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培训制度。这两项制度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也都得到完善和加强。

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起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党内先后已经开展了六次党内集中教育，包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已经开展的几次集中教育坚持守正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每次集中教育活动，党中央都要求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回应和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统一党内思想，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努力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党的宏伟目标、历史任务的实现。这几次集中教育都有明确的主题，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指导原则、方法步骤、组织领导都很明确，教育的对象也有所侧重，特别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注重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注重区分对象、精准施策，各级党组织坚决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贯彻落实，根据各自实际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教育活动方案，确保取得实效。这几次集中教育，都强调建章立制，注重长效。中央一再强调，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不能搞一阵风式的教育，要在活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提高活动成果，认真总结活动经验，举一反三，搞好建章立制工作，完善集中教育同经常性教育相结合等学习制度，形成长效机制，推进党员干部学习教育的常态化规范化，以制度化的学习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

各级领导干部脱产集中到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培训制度，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同样得到完善和加强。其一是干部教育培训机构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2015 年党中央颁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23 年修订后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颁布；2019 年党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条例》。这两个条例，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在培养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担负着重要责任。2023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 90 周年庆祝大会暨 2023 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提出并阐述了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为新时代党校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二是更加突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改变一段时期以来主业主课不明、对理想信念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把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第一位的任务，突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主课地位，坚守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数量的底线，优化教学设计，建构完善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课程体系，全面提高干部执政能力和领导本领，促进干部养成良好作风，提升党性修养。其三是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和效益，从搞好需求调研、改进方式方法、严格质量评估等干部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进一步完善保证质量、提高效益的办法措施。其四是更加注重师资、课程教材等基础建设，在打造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课程教材等方面，采取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措施和办法。其五是更加强调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始终紧绷作风建设这根弦，把从严的要求贯穿到干部教育培训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坚决克服不良之风影响，大力弘扬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引导教育干部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所有这些，有效保障并促进了干部素质和能力的提升。

总之，“本领恐慌”问题的提出和应对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党的能力、本领的高度重视。古人说，“政善治，事善能”。正是中国共产党时刻警惕“本领恐慌”，高度重视不断增强本领，才能领导人民完成一个又一个阶段性任务，不断地逐步接近党的远大理想。而学习则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本领恐慌”，不断增强本领的根本之举。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八大本领”。在此前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本领要求。如要求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要求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要求提高“七种能力”；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求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等。从这些要求来看，本领的内容很多、很丰富。那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什么本领更具有抓总的意义呢？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我国的实际问题。”[①] 显然，中国共产党本领高强，直接体现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到开始强起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党员、干部来说，无疑具有抓总意义。

（一）开垦南泥湾解决生存问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扫荡围攻，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那是极为艰苦的一段时期。用毛泽东的话讲，“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

① 《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11 日。

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生存，成为一个严峻问题。

1939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发出号召：“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自己动手”，绝非一句轻飘飘的话语，而是包含着一个政党栉风沐雨的决心。一场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目标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保证了抗日力量的巩固和发展。其中，尤以南泥湾最为知名。

位于延安城东南方向约 45 公里处的南泥湾，是延安的南大门。由于连年战乱、土匪肆虐，人们纷纷逃离，方圆百里的富庶之地变成了荆棘遍野、人迹稀少、野兽出没的“烂泥湾”。1940 年 6 月 14 日至 7 月 30 日，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的乐天宇带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员郝笑天、曹达，光华农场技术员江心，农校教员林山、农校学生王清华，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由延安出发，经南三十里铺、华池口；过葫芦河，到大麦河；由黑水寺到甘泉城；经杨家板、庙台，最后返回延安。历经 47 天，行程几百公里，考察了陕甘宁边区的森林和植被分布情况，带回了 2000 多种植物标本，为摸清边区的自然状况提供了珍贵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事后，考察团将考察报告上报给李富春。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烂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时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兼延安自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92 页。

科学研究院院长的李富春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并上报给中央领导传阅。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开始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1940年底，朱德指示王震带领359旅到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地区屯田垦荒。

部队刚到这里时，几十里没有人烟，仅有的村镇只有几户人家，几间破烂不堪的窑洞。山民和牧民几乎都患有大骨节病，因为那里的水中有一种致病的化学物质。举目四望，只见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草，荆棘横生；深山尽是遮天蔽日的树林，野猪野鸭成群；沟底则是黑暗阴森的溪流，浸泡着腐烂的古木和野兽的尸骨。原始森林里的落叶有一尺多厚，人走进去，仿佛走在橡皮上面，忽上忽下，行动艰难。

在这样荒凉的地方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生产？王震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旅长到每一个战士、勤务员、炊事员，无一例外地参加生产，开荒种地。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搭起简易的帐篷，露宿在山林野谷之中。没有粮食，就赶到100里甚至数百里以外去背粮、运盐。没有菜吃，就到河边山上去挖野菜，打野兽。没有衣穿，夏天光着膀子，冬天砍柴烧炭取暖。缺少开荒工具，就运盐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换农具，从倒塌的古庙中抬来破钟，从敌人扔下的弹片和破坏的铁轨中，打铁制造工具。

359旅上下同心，艰苦奋战，1941年当年就取得了丰收。全旅开荒种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担，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猪20头，经费自给78.5%，各部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王震趁热打铁，提出奋斗目标：1942年做到大部自给，1943年做到自给有余，争取向政府交公粮1万担，并为扩大再生产积累更多的资金。在经营方针上，他提出要搞多种经营，养猪养羊，开工厂，开

作坊，发展纺织、缝纫、造纸、肥皂工业，开办各种商店和供销合作社，抽出部队大部骡马组成各种长短途运输队，保证部队生产生活供应，为地方贸易提供方便。

到了1942年夏天，整个南泥湾已经呈现出了田间肥美、猪羊成群、窑洞满山、市场繁荣的动人景象。经过三年奋战，南泥湾大踏步前进，超额完成了王震提出的奋斗目标。1943年，开荒种地10万亩，全年收细粮1.2万余担，都是1941年的10倍，还达到了王震提出的“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到1944年，南泥湾播种面积已达26万亩，在延安要算“肥得流油”了。

随着南泥湾的发展，越来越多知名人士到这里小住。著名诗人萧三、艾青、何其芳，作家吴伯箫，音乐家贺绿汀以及农学家陈凤桐也到这里访问，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在这里作客，他们用自己的笔，将南泥湾的业绩和精神传遍了全世界。

在赞颂南泥湾的作品中，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当首推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
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往年的南泥湾，到处是荒山，没呀人烟。
如啊今的南泥湾，与那往年不一般。
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

没有高超的本领，南泥湾是开发不出来的。

（二）建设港珠澳大桥解决大湾区互联互通问题

“我喜欢出发。凡是到达了的地方，都属于昨天。哪怕那山再青，那水再秀，那风再温柔。太深的流连便成了一种羁绊，绊住的不仅有双脚，还有未来……”

这首诗，来自汪国真的《我喜欢出发》，这也是林鸣最喜欢的一首诗。林鸣就是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的总工程师，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港珠澳大桥东接香港，西接珠海、澳门，全程55公里，为世界之最，也是中国交通史上技术最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工程之一，尤其是海底深埋沉管隧道工程，只有极少数国家具备这个建设能力。

港珠澳大桥仅主梁钢板用量就达到了42万吨，相当于10座鸟巢或者60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它有全长约6.7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隧道，由33节沉管对接而成，每一节重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的重量。

2005年工程筹备阶段，林鸣组织项目组到国外考察。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并开出了1.5亿欧元，当时约合15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咨询费……合作谈崩了，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自主攻关。

林鸣带领团队开始从零起步，攻克一个个技术难题。终于，2013年5月1日，历经96个小时的鏖战，海底隧道的第一节沉管成功安装。建设者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解决了外国人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攻克了世界深埋沉管隧道的一系列难题，成为世界上“深埋沉管结构设计”“深水深槽沉管安装”等技术的“领头雁”。

正是这种不服输、敢钻研的精神，以及高强的本领，才有了奇迹一般的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被誉为桥梁界的“珠穆朗玛峰”“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为什么要建设港珠澳大桥，难道就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奇迹吗？当然不是。而是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区域更好发展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刚刚起步，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向内地转移。虎门大桥、广深高速、沙头角电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但是烟波浩渺的珠江口却羁绊了两地的交往，阻隔了车辆的通行，延宕经济的交融，铁路到了东岸是“断头路”，公路到了西岸成了“肠梗阻”。能否有一座桥，从香港屯门最西部建到内伶仃岛，再到珠海的淇澳岛，香港实业家胡应湘最早提出了建桥的设想。改革开放以波澜壮阔之势，给中国带来了沧桑巨变。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和工程技术进步，梦想终成现实。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为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首先，它为港澳居民赴湾区内地居住、创新创业、寻求发展机会提供了交通便利；其次，大大提高了货运的便捷性，成为连接香港、澳门、珠海三地的世界工程；最后，让三地之间人员往来愈加频繁，有助于港澳与内地同发展、共繁荣，走向“民心回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这是一座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这样一个解决香港、澳门和珠三角区域更好发展问题的港珠澳大桥建设，是一个超级复杂且有着超级难度的工程。就拿林鸣负责的港珠澳大桥建设中的节点工程——岛隧工程来说，它是整个建设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决定整个港珠澳大桥能否顺利贯通的关键工程。这是世界最长的海底深埋沉管隧道施工，是一个人类未曾跨越的禁区。国外

权威专家曾预言：中国不可能造出如此超前的桥梁，特别是这样一条超长、超大、超深的外海沉管隧道。10 多年间，林鸣坚持靠前指挥，勇于担当，是工程建设的“定海神针”，几乎每到关键和危险的时刻，他都会像“钉子”一样，几小时、十几个小时、几十个小时，“钉”在工地。与此同时，林鸣和他的团队在几乎空白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攻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奇迹发生了：建设过程，实现一项又一项“零”的突破——零借鉴！（安装）零失误！由他主持研发并实施了众多新结构、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申报专利 400 余项。被国外专家预计要两三年工期才能完成的人工岛，被林鸣的团队仅用 7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当前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最终接头偏差只有 2.5 毫米，是验收标准（7 厘米）的 1/28。在港珠澳大桥深埋沉管隧道技术突破后，当时开出天价咨询费的外国公司又特意邀请林鸣去做交流，还在公司升起了中国国旗。

（三）解决实际问题蕴含着丰富的本领和能力要求

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古往今来，人类总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也同样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进程中前进的。

中国共产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结果。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与此同时，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随着世界格局正在进行深度调整，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网络安全问题更加突出，维护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正如邓小平曾经预言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与此同时，还存在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管党不力、治党不严问题，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这些问题特别是“七个有之”问题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威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引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不满和义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正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结果。

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都是超级复杂有着超级难度而又有着超高要求的问题，一点都不比开垦南泥湾解决生存问题、建设港珠澳大桥解决大湾区互联互通问题容易，甚至比它们还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因而对领导者的本领具有超高要求。也就是说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不应是单一的、也不应是低水平的，而是多样的、丰富的、高超的。尤其是在当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要解决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八大本领”，以及在谈提高解决实际问题本领时强调的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七项能力”，缺一不可。

三、高超的群众工作本领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没有群众，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党是靠群众工作起家、发展、壮大起来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力量的独有认识，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有谁真正认识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强大伟力？又有谁能把这种伟力激发和组织起来？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这种伟力激发和组织起来，靠的是党做好群众工作的真本领。高超的群众工作本领，对党员、干部来说，无疑也是具有抓总意义的。高超的群众工作本领说到底就是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不懈坚持与有力践行。

（一）闽西藏着当年红军走群众路线的办法

在闽西，在辛耕别墅，在老古井旁，藏着当年红军走群众路线的办法，那里有做好群众工作的灵魂。1929 年，毛泽东来到汀州后，便要来几种汀州志书，买了各地报纸，还让当地干部请来了老佃农、老裁缝师傅、老教书先生、老钱粮师爷、老衙役和老流氓头子这“六种人”，开了调查会。没有实际情况的调查，不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不知道群众的所思所想，是做不好群众工作的。

毛泽东在长汀期间，经常来到老古井和打水居民拉家常，在聊天中了解到当时长汀百姓没有柴烧，没有盐吃，米价又贵，但当时的汀州市苏维埃政府没有顾及这些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毛泽东写出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提出如何做好群众工作的问题。“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①] 据说，当时毛泽东将初稿写在了当地盛产的毛边纸上，并让警卫员将文稿一张张贴满卧室及大厅的墙壁。当地政府的干部被喊来后，就站着一条一条地看。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井冈山时期相继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井冈山土地法》，通过制度规范和纪律约束红军的行为，保证对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宁愿自己受冻挨饿，也惦记着当地群众的冷暖；宁愿自己流血流汗，也要保护当地群众的安全。

（二）吴金印的群众工作本领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吴金印同志作为“乡镇基层党员干部的优秀代表”，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奖章。

① 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4 页。

在河南省卫辉市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1. 把群众当亲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2万多人口，有90%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老百姓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2. 把群众当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但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3. 把为了群众当职责

吴金印深知，老百姓的心思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就是三条：有饭吃，有房住，有钱花。一句话，就是过上富裕的生活。他说：“啥叫联系群众？当干部的，把大伙领上致富路，才是最大的联系群众。”

为了让群众有饭吃，几十年来他造地不止，人们称他为“造地书记”。

群众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如何让他们尽快过上城里人那样的生活，是吴金印一个新的梦想。

吴金印说：“说一千道一万，谁能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群众就愿意跟着谁。明白了这个理儿，我就想啊，一切为了群众，是干部的职责，只要群众还需要我，我就会一个劲儿地干下去，决不松劲儿……”

（三）马善祥的群众工作本领

马善祥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负责人，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老马就来到观音桥街道当了一名调解员，一干就是30多年。

人民调解工作就是跟老百姓打交道，问题多、很具体。从干这一行开始，老马就给自己立下了接待群众的24字规矩：“起立迎接，请坐倒水，倾听记录，交流引导，解决问题，出门相送。”他善于调研分析，撰写152本520多万字工作笔记，面对基层群众工作中的“疑难杂症”，总结形成“老马工作法”66种，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余起。正是在一个个矛盾的解决中，老马走进老百姓心里，成为老百姓幸福生活的守护者。

无论是革命年代、建设年代、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群众工作。毛泽东把群众比喻为“铜墙铁壁”“眼睛”“上帝”“土地”“水”，告诫全党同志要敬畏群众、植根群众、珍爱群众、依靠群众，绝不能脱离群众。群众工作能力因此成为党员干部需要着力提高的“第一能力”。人们常说，“做人的工作不好做”，马善祥却将群众工作做到了老百姓的心坎儿上，荣获了“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改革先锋等多项殊荣。2018年，以老马事迹为原型改编的电影《幸福马上来》上映。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习近平总书记点赞：“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老马同志这样的基层干部。”

老马群众工作本领强，来源于深厚的群众感情。做群众工作，群众感情是第一位的，能力、方法都建立在深厚的群众感情基础上。在30多年的群众工作中，老马始终有一颗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因此，他给自己的工作提出了更高标准：让群众享受服务，使群众不仅能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内心愉快的感觉。

群众带着怨气来，带着满意走，是“老马工作室”的写照。

老马说：“有人认为基层干部官不大、事不少，一辈子都在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意思。可我认为，基层岗位固然平凡，却是基层干部不负党和人民重托、顶天立地的地方。”

在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老马经常感觉到，为群众解决问题之后，群众非常感激。这种感激当时就转化为一种很直接的效果，群众就说基层组织好，基层干部好，党和政府好，就直接赞扬习近平总书记好，说习近平总书记把干部队伍的作风带好了。所以说，群众服务好了，它就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密切干群关系，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都像老马同志这样认识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党的群众工作一定会越做越好，党的群众基础就会更加牢固。

老马群众工作本领强，也离不开有效的方法。比如他善于进行思想疏导。街道里的一位退休老人说：“现场正确引导，安抚情绪冲动的问题群众，三言两语就熄灭了来访百姓心头的怒火，维护了党的形象，这个老马有两下子！”熟读党章，学习各项政策精神……文字的东西，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在实践工作中灵活运用。这是马善祥能成功进行思想疏导的秘诀。

群众工作本领，是学出来的，练出来的，干出来的，也是根据新的情况新的要求创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必须根据形势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而不断创新。网络时代，人民在网络活跃，民意在网络聚集，我们的群众路线也要扩展到网络空间。为适应这一新情况，现在的“老马工作室”开通了微

信公众号，拓展了区内百姓的求助渠道。马善祥将其作为网上群众工作平台，每周都会结合社会热点或纠纷撰写三篇心得体会，并提出调解建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党的诸多本领中，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有特殊意义。2013年末，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不到两年时间，两次聚焦哲学，其重视程度之高可见一斑，习近平总书记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升到看家本领的高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如此重视哲学？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个比喻说得很形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眼力不够”的问题。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发展史也是一部学习掌握、用好用熟、创新发展“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不断增强。在技艺中，看家本领是某种“绝活”；在武林中，看家本领是某个门派高人一等的“绝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根本原因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一特有的看家本领。这一方法掌握得好、运用得妙，干起工作就事半功倍，否则就事倍功半。

（一）重视学哲学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从1931年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到1992年从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长期处在党中央的最高决策层中。

陈云极端重视学哲学，要求人们把学哲学放在生活和工作中异常突出的地位。他的女儿回忆道：“爸爸在江西工厂‘蹲点’的时候跟我讲：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每当他讲到毛主席在延安要他学哲学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两眼放光，非常激动。”①

陈云重视学哲学，从来不是把它当成单纯书斋中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谈，而是出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力求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引导行动的指针。

他多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学习理论，“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② 他认为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陈云认为：全国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我们身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得失。③

陈云谈学哲学重要性最多的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整风中，另一个是改革开放时期。这都是中国共产党面对重大历史性变化的时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并且在变化中跨出重大的新步子，首先需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处在

① 《为党和人民事业学哲学用哲学——陈云学用哲学启示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5日。
②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62页。
③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7—298页。

这种时刻，更需要把学哲学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上来。

延安整风的基本问题是整顿“三风”，其中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也就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总结党以往犯“左”倾错误的根源。陈云于1947年2月在《怎样才能少犯错误》的报告中讲道：“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后来，我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同时再次考虑，错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认识支配行动，行动是认识的结果。”①

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在组织部内组织了一个包括副部长李富春在内的6人学习小组，学习哲学。参加这个小组的王鹤寿回忆道：“陈云同志规定的学习办法是，对很厚的一本哲学书，从头至尾一章一章一段一段地读，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在学习小组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如实报告是否精读了规定的章节，谁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段，这是学习的纪律。然后开始讨论，各抒己见。”② 这个学习小组每星期一上午开会，雷打不动，一直坚持下来。小组成员中陈云的工作是最忙的，但从来没有欠读一章一段。以后他多次说：在延安那一段学习，得益很大。他的夫人于若木说：他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程度。毛泽东也称赞道：“陈云同志有‘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①

①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② 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载《缅怀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大量出现的新问题，更要求主观认识能符合迅速变化着的客观实际，这是很不容易的。陈云和许多老同志又正要退下来，对缺乏足够经验的年轻领导干部抱着殷切的期望。于是，陈云便再次强调学哲学的极端重要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陈云向邓小平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两天后，邓小平向《决议》起草组谈了陈云的意见，并且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② 陈云也对起草组负责人说：“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③

（二）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讲的是河间献王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

①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③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求得事之本真。唐初贞观年间，经学家颜师古对该词的注解，为其注入了“得实”与“求是”的方法论内涵。

到南宋朱熹，“是”则被赋予“理”的涵义，“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戴震在《原善》中评价程颢、张载、朱熹说“三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本夫求是心”。“是”即“理”，指内在规律，所谓格物穷理而致知。由此，“求是”获得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内涵。

清代乾嘉学派虽将“实事求是”作为考据学方法，但与“格物致知”结合所凸显出的认识论意义已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而这尤受湘派学人推崇。如，曾国藩强调，“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此后，“实事求是”成为湘学重镇岳麓书院的“训”与“旨”。1917 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任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引导学子从事实出发、追求真理。曾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此时（1916—1919 年）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更是得此一脉亲炙。

师古而不泥古，投身革命与救亡后的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科学结合，对“实事求是”进行伟大改造。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到《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内涵逐渐清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5 年，中共七大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至此，“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科学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为什么要坚持实事求是、怎样坚持实事求是等问题作出深刻论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回顾了坚持实事求是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六种”思维能力

2019 年 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把握规律，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所谓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就是要能够做到站得高、看得远、抓重点和善创新，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历史思维能力，就是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提高历史思维能

力，就是要能够做到知古鉴今、古为今用。在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中发挥历史知识应有的积极作用，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辩证思维是人们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方式。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就是要能够做到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过时的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能够做到有敢为人先的锐气，突破思维定式，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思维，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提高法治思维能力，就是要能够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要挺身而出、坚决斗争，自觉当依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者。

底线即最下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低限度。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前瞻意识，把工作预案准备得更充分、更周详，做到心中有数、处变不惊。

思维能力是其他能力之源，决定着领导能力。这“六种”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总结，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增强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一定要在提升这“六种”思维能力上下功夫。

10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现在，在我们党内，贯彻执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状况总体是好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和干部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还存在一些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虽然不是主流，但如果不重视、不警惕、不纠正，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要紧紧抓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这对我们坚持和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新的要求。

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必须真正把握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搞清楚“实事”，就是了解实际、掌握实情。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系统而不是粗枝大叶的调查研究，使思想、行动、决策符合客观实际。而这始终是我们进行一切科学决策所必需的也是唯一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尤其

是在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内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各种风险挑战、困难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正因为如此，2023 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使调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更好为科学决策服务，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服务，为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服务。

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求是”，就是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再用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在实践中使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的必由之路。我们作决策、办事情、谋发展，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坚持实事求是，能否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决定我们的工作特别是领导工作有无主动权和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

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的。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坚持群众路线是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一方面，实事求是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要通过“从群众中来”才能实现。人民的伟大实践是认识的真正源泉。只有切实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意愿，及时发现、总结、概括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才能获得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制定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又是在实践基础上改造世界的过程，这一过程只有通过“到群众中去”才能实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党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是根本一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必须把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意见、办法，拿到群众中去实践和验证，使正确的意见和真理性认识为群众所掌握，成为群众实践的思想武器，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所有这些说明，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必须增强党性。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这一思想观点，将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宗旨统一起来，将党员个人的党性修养与求真务实的干事创业精神统一起来，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精神的光辉体现。这要求我们坚持并贯彻好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为党性修养和锻炼的重要内容。

（四）抓重点

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22 页。

作”。注重抓重点、善于抓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工作方法，强调集中优势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渐次展开。

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反攻从东北开始。随着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逐渐平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计划首先在东北战场发起第一次战略决战。这是因为东北战场的双方力量对比形势对解放军最为有利。国民党军队虽然还有 50 多万人，但他们长期困守在互不相连的长春、沈阳、锦州 3 个孤立据点，军心涣散，补给困难。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已达到 100 万人，兵力在所有战场上是最大的，而且装备较好，士气高昂；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和清剿土匪都已完成，有着巩固的后方，早已蓄势待发。只要乘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尚未决策撤走时把它就地消灭，解放军便可以大举入关，使整个军事局势改观。

东北战场的决战又从哪里打起？中国共产党权衡后选择了锦州。锦州是北宁铁路上联结东北和华北的咽喉要道，又是对长春、沈阳进行空运补给的基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也有困难，它距离解放军主力集结的北满根据地较远，需要长途奔袭，补给线也长，如果不能把锦州迅速打下，而受到来自沈阳和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两面夹击，就会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反复权衡利弊，认定先打下锦州、切断东北国民党军队同关内的联系，把它封闭在东北各个击破，最为有利；而且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是可以做到的。国民党锦州总指挥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攻占锦州的重点在塔山。取得锦州胜利的关键环节有二，一是攻城部队要在尽快短的时间里攻下锦州，二是有效阻止国民党部队对锦州的增援。在攻占锦州双方力量对比占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能否阻挡住敌军的增援就成为攻占锦州的关键，取得东北战场胜利的关键。

而攻占锦州的关键就是塔山。塔山阻击战从 1948 年 10 月 10 日开始到 10 月 15 日结束，一共激战了六天六夜，最终我军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确保主力攻打锦州取得胜利。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说：“塔山这个仗，锦州这个仗，的确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打到了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垂死挣扎，集中其一切可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①] 经过一个月的战斗，解放军成功攻占锦州，关闭了东北国民党军出关的大门，奠定了东北战场胜利的基础。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通过重点工作来带动全局，这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没有重点，眉毛胡子一把抓，工作就无法取得突破。只有明确主攻方向，分清轻重缓急，集中精力保重点，才能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五）钉钉子精神

如何抓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过一个重要方法论，那就是坚持钉钉子精神，“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2013 年 2 月 28 日，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钉钉子精神进行了详细阐述：我们要有钉钉子的精神，钉钉子往往不是一锤子就能钉好的，而是要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不断钉下去，必然大有成效。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结果很可能是一颗钉子都钉不上、钉不牢。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扭住关键、精准发力，敢于啃硬骨头，盯着抓、反复抓，直到抓出成效。钉钉子精

① 李捷、于俊道主编：《实录毛泽东·3》，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年版，第 202 页。

神是一种责任感，是一种优良作风，是一种科学方法。

摆脱贫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初心、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

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几乎走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在梁家河，他最大心愿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了正定，他甘冒风险也要摘了“高产穷县”的帽子；在宁德，他带领探索“弱鸟先飞”的脱贫路。一直到省里、到中央，扶贫这件事他始终“花的精力最多”。习近平总书记说：“我提倡钉钉子精神，这得从我做起啊！这件事我要以钉钉子精神反反复复地去抓。”

为了“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为了打赢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既挂帅又出征，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督战：

走遍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每年新年国内首次考察看扶贫，

每年新年贺词讲扶贫，

每年全国两会同代表委员共商脱贫，

每年扶贫日作出重要指示，

每年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部署推进，

每年主持会议听取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情况汇报，

在重大场合、重要会议、关键节点反复强调脱贫攻坚，

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推动脱贫攻坚始终保持正确方向和良好态势。

越是到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求速成，脱贫摘帽后还要稳一稳、沉淀沉淀，确保经得住历史的检验。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你不能松气，就算真完成了也不能歇歇脚、松口气，还要落实“四个不摘”的政策，还要保持政策的总体稳定，扶上马还要送一程。还要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帮扶，还要乡村振兴，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检验。[①]

① 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奇迹》，《求是》2021年第4期。

第七章
纪律的力量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要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中进一步重申，党纪国法的红线不能逾越。纪律规矩约束是一种硬权力，这种铁的刚性的约束对保证全党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一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纪律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一点也不为过。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基本要求，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铁一般的纪律赋予党强大的力量，是保证党具有无比坚强领导力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纪律支撑和保障

纪律严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和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入了纪律严明的基因。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管党治党的重器。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铁一般的纪律锻造自身，为党和国家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说，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纪律严明始终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始终是党

的无比坚强领导力的可靠支撑和保障。

（一）纪律严明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

政党是有着明确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规矩就是纪律，规矩意识就是纪律意识。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政党必须严明纪律，以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

与一般的政党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更加注重纪律建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组织之所以强于单独存在的个体，是因为有纪律的保障，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赋予政党组织强大的力量，“正是这种纪律才是每个成员相对的无个性的必要保证，才是全面胜利的条件，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纪律才能够团结真正的组织，并且建立集体的革命力量”[①]。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建设问题，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组建和发展实践中积极推动纪律建设。1847年，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组建时，马克思就鲜明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②]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他们明确写道：“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③] 恩格斯进而提出，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法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1860年至1862年，在为《朗卡郡和柴郡志愿兵》杂志和《军事总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4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9—420页。

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恩格斯强调，严格的纪律是一支部队训练有素的重要条件，只有部队全体人员严守纪律、严格履行条令和教令的各项要求，才能保证部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最优途径达到预定目标。在与巴枯宁宗派分裂主义激烈的斗争中，1872 年 1 月，恩格斯深刻揭露了巴枯宁否认党的纪律的目的和实质，深刻阐明了坚持党的纪律对坚持党的性质、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恩格斯强调："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①

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围绕无产阶级政党为什么必须有铁的纪律、铁的纪律是什么、怎样严格执行纪律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粉碎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列宁认为，这是因为"党纪律严明"，如果"没有纪律，没有集中，我们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②。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他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否定党的纪律，"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③。

总而言之，注重政党的纪律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始终如一的基本原则。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① 严明的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519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3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4 页。

中国共产党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入了纪律严明的基因。在后来的党的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加深对于纪律严明重要性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中国是有 5000 多年文明传承的国家，中华民族有着深刻的规矩意识，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是我们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着大量关于规矩的阐述，例如"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等。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兴衰历史也深刻表明，"规矩"是个人成败、组织发展乃至国家治理的重要保障。对于个人而言，为人处世要遵循道德和法律规范，中国传统家庭特别注重对于礼仪和规矩的培养，规矩意识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对于组织而言，规矩就是纪律，没有规矩，组织就没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组织就会沦为"一盘散沙"。对于国家治理而言，"规矩"就是法律和制度，没有规矩，国家将无所依据，社会将走向失序。守规矩作为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这些思想和历史经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及行动方式，也自然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理念和实践。

（二）纪律严明由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使命决定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生存发展环境极其严峻，如果没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1 页。

有纪律约束，党员各行其是，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生存并发展起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①]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此时的中国，革命前途未卜。中共一大召开时，党面临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中共一大于 1921 年 7 月 23 日在上海召开，7 月 30 日，会议受到法租界巡捕骚扰，后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继续举行。参加中共一大的中国代表一共 13 人[②]，代表当时全国 50 多名党员。当时，一方面党面临的外部环境极其严峻，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力压迫；另一方面党自身的力量极其单薄，党员数量不多，党组织相对分散。在这种极其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党要发展壮大，除了要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吸引人，更要用严明的纪律将党员组织起来，形成合力。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提出了"两个断绝"的纪律要求，即"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以及"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专列一章阐述纪律。严明纪律使党在严峻的生存环境中得以生存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党面临的生存发展环境极其严峻，不仅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实，即使到了当今新时代，党面临的发展环境依然极其严峻。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34 页。

② 中共一大的 13 名中国代表分别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会议的包惠僧。

这种长期存在的严峻环境，决定了纪律严明作为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绝不能丢。

严明的纪律不仅是党适应严峻生存环境的重要保障，也是党承担伟大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从 1840 年到 1921 年，在 8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但都未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用了不到 30 年的时间，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是靠人数取胜，而是靠纪律严明。早在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作出关于纪律方面的规定，强调"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均设有"纪律"专章，对严明纪律的重要性作了明确阐述。1928 年 7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明确提出"严格的遵守党纪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1938 年 9 月，六届六中全会制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从制度上规定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机关及党的委员会产生、工作任务以及纪律原则。1945 年 6 月，党的七大强调："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纪律涣散与共产党及其军队的纪律严明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原本计划要打 5 年的解放战争最终只打了 3 年，战争形势可谓"摧枯拉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靠着铁一般的纪律武装起来的，纪律严明不仅使这支队伍获得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也让这支队伍赢得了民心民意。在艰苦的革命岁月中，中国共产党用严明的纪律武装队伍，依靠严明的纪律战胜强大的敌人，

并形成了纪律严明的光荣传统。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充分印证了毛泽东“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经典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艰巨历史重任。面对执政考验，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明纪律，用铁一般的纪律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从一个领导革命的政党转变为一个全国执政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身上的担子并没有丝毫减轻，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如何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必须要用更加严明的纪律锻造一个更加强大的政党。1949 年 3 月 5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加强党风建设，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外，七届二中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的六条规定。毛泽东在“进京赶考”前夕为全党立规矩，可见纪律对我们党应对执政考验的重要意义。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纪律建设持续推进，党的纪律法规日益完善。1949 年 11 月颁布的《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2 年 2 月颁布的《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以及 1955 年 3 月颁布的《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堕落问题，1962 年 12 月，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颁布了《关

于严肃处理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等错误和反对特殊化行为的意见》，大力纠正党内不正之风。

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党和国家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纪律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系列涉及党的纪律的党内法规相继制定。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供了基本依据。1989 年 6 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印发《关于严明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通知》；1993 年 10 月，《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印发；1997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印发。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试行条例进行了进一步完善。2004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对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召开，指出“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此后，党中央相继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重要文件，进一步增强了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情国情世情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着严峻的“四种危险”[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圆满完成历史和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5 页。

人民赋予的崇高使命？中国共产党给出的答案是："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用更加严明的纪律锻造自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高质量管党治党水平应对"四大考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纪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纪律建设在党的事业布局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纪律建设，重塑了党的形象，使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一是对纪律建设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重要性更加凸显，确立了纪律建设的治本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有力唤醒了全党的纪律意识，也极大地推动了纪律建设的实践。在明确纪律建设重要地位的同时，明确党章的"根本大法"地位，党的纪律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二是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突出党的政治属性。通过政治纪律建设，有效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三是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夯实纪律建设的制度基础。2015年8月，《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颁布，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颁布。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9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四是严格执纪，明确纪律红线，提升纪律意识。完善纪检监察制度体系，使执纪更加坚强有力。2017年1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和2019年1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制度规范为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扎实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完善派驻机构的监察机制，为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党中央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严字当头、严格执纪，不断提升纪律威信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

①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二、纪律严明得民心

任何一个政党，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那时候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党员数量不多，党的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但党很快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人民群众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具备的纪律严明的特质。这一特质是党的一切行动和能力的基础和前提，一个不能依靠纪律约束的政党，根本无法管理好自身，更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这一特质能够产生有效的约束力，防止和克服不良行为对组织对人民群众的损害。正如《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所说："'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民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党纪严明赢得民心的典型案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铁一般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革命队伍，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进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中国。

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着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朱德后来回忆说："在井冈山的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二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许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第二次回来，都算了账，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①] 实践充分证明了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所说，"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

1927年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简略地介绍了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指挥。此后，在部队官兵与当地老百姓的日常交往中，时常出现官兵吃老乡红薯的现象，老乡对此有意见，毛泽东得知此事之后，给部队确立了不拿老百姓一块红薯的规定。在打土豪中，一些官兵将没收财物据为己有，毛泽东对此又作出打土豪归公的纪律要求。1928年1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攻打遂川，并在当地开展调查研究，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工作，领导组织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在与当地群众的密切接触中，出现了一些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又给部队规定了上门板、捆铺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六大注意事项。这便是最早的三条纪律六项注意，这些纪律要求均是从人民

① 刘志新：《百年党史关键词》，人民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24页。

群众利益出发，纪律要求通俗易懂，一方面有效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党和人民军队的形象，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党和人民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升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此后，毛泽东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进行了修改和完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后来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形成。

1931年，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即"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经提出便广为流传，并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纪律规范。与此同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人民群众中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塑造了人民军队纪律严明的光辉形象，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创造了新的革命军队，还创造了新的革命纪律。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制度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军队能够自己管理自己，并受到老百姓的敬重"。

（二）长征途中严明的纪律形成老百姓对红军的第一良好印象

翻开长征经过地方的老百姓关于长征的回忆记录，他们首先被红

军吸引和折服的，几乎无一例外是红军的严明纪律，这与他们以前所知道的土匪、国民党军阀大不一样。一开始，老百姓因为受国民党的虚假宣传都很害怕红军，想方设法逃到山里去。然而，当他们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不扰民、不损害群众利益，还给大家办好事，便纷纷转而信任红军、依靠红军，甚至加入红军。正是严明的纪律使红军迅速与国民党军阀区分开来，形成老百姓对红军的第一良好印象。

那么，红军的群众纪律内容是什么？

陈云说："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而实际行军途中，考虑到长征的具体情况和长征中战士的实际素质，总政治部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稍作调整，提出了7点要求：（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铺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这7点要求极为通俗，从具体内容上看，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略低，总政治部也指出"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与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但这7点要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如红军在苏区所使用的苏维埃纸币，在白区根本不能流通，因此，提倡"买东西要给钱"，要使用能在白区流通的银元。但是，仍有红军战士使用苏维埃纸币，于是，总政治部决定每到一处，以师为单位由供给机关设立临时兑换处，专门兑换居民手中的苏维埃纸币，并张贴布告使群众知道；没有设兑换处的地方，坚决不允许使用苏维埃纸币。如此群众纪律，条条制定在实处，处处落在百姓心坎上，自然迅速拉

近了红军与群众的距离，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目前保存下来的长征期间的《红星》报中，涉及群众工作的共有64篇报道，关于红军纪律问题的相关报道就有17篇之多，可见党和红军对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而红军严明纪律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马上就发现了"秋毫无犯"的红军与反动军阀的差别，迅速消除隔阂，与红军交了心；群众的心地也是最质朴的，一旦交了心，成了朋友，便竭尽全力给予红军各方面的支持。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保障。

（三）纪律严明为共产党赢得了解放战争的民心民意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军队的纪律松弛形成了鲜明对比，纪律严明为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民意。

"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这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与部队官兵的"约法三章"。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反动派对该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的反攻倒算，当地农村革命力量遭受很大损失，人民军队发动群众工作极难进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部队供给困难、减员严重、装备奇缺。刘伯承、邓小平不但给部队"约法三章"，邓小平还亲自部署成立执法小组，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凭借着铁一般的纪律，人民军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军民关系坚如磐石。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毛泽东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撰写的《八连颂》中，道出了人民解放军和群众的深厚情谊。在"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画作。

解放战争期间，八连驻扎在莱阳，梨园里都是黄澄澄的大梨，指战员在周边学习训练，休息时帮群众干活，却从不吃群众一个梨。老百姓称赞："解放军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

塔山阻击战即将打响之时，国民党军将村民的房子拆掉来修建工事，塔山村农民王树德因不配合被打得遍体鳞伤。而进驻到此的解放军修筑工事时，王树德却将藏在地窖里3间房的木料全部拿了出来。

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除了依靠脆弱的铁路运输外，到战争后期基本上依靠空投，这种耗费巨大财力的补给行为效果甚微。在同一个战场上，共产党军队却能得到来自人民群众强大的补给支持，为决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四）从农村到城市，党和人民军队以纪律严明赢得民心

1949年5月，上海战役即将打响。1949年5月14日，第三野战军政治部转发华东局颁布的《入城纪律》十二条规定：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佩戴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第四，除地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捕人的现象。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第六，一切入城的部队及机关，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外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严禁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的一定数量之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室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共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第九，除外国侨民事务管理处外，任何机关和干部不许和外国人谈话或发生直接关系。对一切外国外交机关、教堂、学校、医院、银行、工厂、商店及外国人的住宅，应予切实保护，严禁擅入外国侨民的机关及私人住宅。如外侨有犯罪行为者，需呈报军管会处理。第十，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主席、朱总司令所发布约法八章的布告外，不得乱写其他未经上级批准的标语和口号。对城市各种具体政策必须经中央与华东局批准后才可实施，必须严格执行报告请示制度。第十一，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第十二，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质的奖励。对违反纪律、

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入城纪律》十二条得到了严格遵守，纪律严明是党和人民军队给上海市民最好的礼物。1949 年 5 月 27 日早晨下着小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看到睡在马路两边潮湿水泥地上的解放军战士时，他们认识到这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

（五）执政之后党仍然以严明的纪律赢得民心

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腐败问题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解决腐败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明党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用严明的纪律惩治腐败，党的执政地位更加巩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腐败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一些发生在人民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严明党纪，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恒心惩治腐败问题，赢得了民心。反腐，算的是政治账、民心账，强调的是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在治党信心、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获得感。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党员干部队伍得到了极大的整顿，大肆行贿、索贿等现象明显减少了，人民群众反腐满意度逐年提升，2013 年至 2018 年，反腐满意度由 75%增至 93.9%，5 年内提高 18.9 个百分点，党的执政地位更加稳固。

三、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这 6 个方面的纪律，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的政治纪律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不同表述，但基

本原则核心内容始终没变，那就是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如果没有政治纪律的约束，党中央就没有政治权威，党员执行其是，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也将无从谈起，党的领导力也就将必落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是因为不懈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才有了团结一致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政治目标持续奋斗并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局面。

（一）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

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和主张，坚持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政治纪律，中共一大就提出了“两个断绝”，要求共产党员要政治独立。

1927 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首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并将其列为各项纪律之首，同时首设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这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中共五大是在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共五大召开前，中共党员数量和党组织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党员成分复杂、政治素质不高等问题。

中共五大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塞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强调“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领导”，“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中共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纪律”概念，并把政治纪律放在各项纪律之首，把严格党的纪律提到全党义务层面。

在中共五大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

章程决案》中，特别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专章规定“党的纪律”，开宗明义地亮明党对纪律建设的态度，即“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在专章的六条内容中，有五条直接涉及政治纪律，进一步凸显了政治纪律的重要性。

此后，党开始更加积极主动地以强化政治纪律为主要内容的纪律建设，始终“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治党工作的第一位”，将其作为“应对各种政治考验和复杂环境能力的重要手段”，使党始终保持了内部的团结统一、政治上的坚定有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为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的权威，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必须有相应的机构专司监督之责，以保证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此，中共五大还首设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开启了监督执纪的先河。中共五大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依据、有制度地开展执纪监督的新纪元。

中共五大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维护党的政治纪律，包括对未能执行党的决议，或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的党员严格问责，并按照党纪严肃处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王荷波在八七会议后被任命为北方局书记，却因叛徒告密在北京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牺牲前留下的唯一遗嘱是请求党组织教育他的子女，让他们坚持走革命的道路。中央监察委员会共有委员 10 人，他们有 8 人先后牺牲，无一人叛党投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党的政治纪律的忠诚。

（二）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地重视政治纪律建设

严明政治纪律是严明党的纪律的关键环节。党的百余年发展史也

是一部维护和坚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历史。虽然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是在党的五大。但 1921 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对党员提出纪律性要求中，部分要求已具备政治纪律的特征。1922 年党的二大党章中设置了纪律一章，其中也包含了政治纪律的要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制定了较为系统的政治纪律规范，同时通过开展整风运动进一步严明政治纪律。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四个服从”的纪律要求。1948 年，解放战争到了战略决战前夕，为了维护中央权威、凝聚全党力量，中央要求全党各级党组织建立请示报告制度。1948 年 9 月，中央发出《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对各项工作中的决定权和请示备案等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开创和初步探索阶段，为日后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在曲折中艰难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新环境新任务，亟须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为维护政治纪律提供了组织和机构保障。1954 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严肃了党的政治纪律，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1955 年 3 月成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1956 年党的八大对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重要政治纪律作了强调。1957 年之后，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党的政治纪律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和遵守。“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被撤销，党的政治纪律遭到严重破坏。这一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在探索中前进，遇到严重挫折，留下了深刻教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在重

建中继续完善。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一是重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新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二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十二大党章，强调党员干部必须遵守这一重要的政治纪律。三是先后出台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党员干部必须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通报》等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不断完善对政治纪律的规定。四是1983年至1987年开展整党，从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入手，彻底清查和处理“三种人”，进一步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五是开展了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坚决斗争，维护党的政治纪律。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取得新成效。一是丰富了政治纪律的内容，提出维护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四条要求。二是严肃查处破坏政治纪律的违纪案件。三是在全党开展“三讲”教育，强化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四是积极推进以维护政治纪律为重要内容的党内法规建设，出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规章制度。

党的十六大之后，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拓展了政治纪律建设的新格局。一是健全政治纪律建设规定和要求，相继制定或修改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重要法规，提出严肃政治纪律要坚持的“六个决不允许”等要求。二是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惩处力度，严肃查处了一批严重违纪的高级干部。三是相继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教育活动，解决部分党员、干部在政治纪律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升了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的意识。

（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突出政治纪律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作为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任务。首先，制定完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党内法规制度，牢牢抓住政治纪律这个底线，推动党的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党中央还把一些看起来抽象的政治纪律细化为具体的制度文本，有力推动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其次，严查政治纪律违纪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央纪委监督执纪中，政治纪律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考察内容，从近年通报的违纪案例中，“违反政治规矩”一词频繁出现。严查政治纪律违纪问题就是要严格对照“十二个不准”“七个有之”“五个必须”等要求，根据党的政治纪律严查违纪问题。严查执纪使得党的政治纪律真正落实起来，政治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纪律。最后，加强政治纪律的党性教育。政治纪律意识缺失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广泛开展党内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对“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等政治纪律的认识，提高行动自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阐述阐发政治纪律的内涵和要求。在2015年1月13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专门阐述了政治纪律的科学含义和要求。他说：政治纪律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政治方向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政治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则是指有关政治方面的言论、行为。对于各级党组织、党员而言，遵

守政治纪律，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形势发展，2003 年 12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实践要要，为此，党中央决定予以修订。2015 年 10 月，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正式印发。2018 年 8 月 26 日，再次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布，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政治纪律放在六大纪律之首，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党章中关于政治纪律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要求，对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包括：

一是发表危害党的言论等行为。如通过网络、电视、论坛等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言论等。

二是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行为。如组织、参加反对党的集会、游行、示威、讲座等活动，组织、参加反对党、社会主义制度或敌视政府等组织，组织、参加会道门或邪教组织、党内秘密集团，组织、参加迷信活动等。

三是损害中央权威、妨碍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实施的行为。如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等，不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挑拨民族关系，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等。

四是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如伪造、隐匿证据，阻止他人揭发检举，包庇同案人员，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等。

五是叛逃及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行为。如在国（境）外、外国驻华使（领）馆申请政治避难，在国（境）外发表反对党和国家的言论，在涉外活动中损害党和国家尊严等。

治规矩等放任不管，搞无原则一团和气，违反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

2023 年，党中央第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充实完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纪律规矩，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在这方面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牢牢把握党的纪律建设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在总则中增写“坚持自我革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等内容，并在分则具体条文中贯通体现。二是完善保障党中央政令畅通的纪律条款，在政治纪律中增加对不顾党和国家大局、搞部门或者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的处分规定，将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行为由违反工作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三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在总则中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切实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在分则政治纪律中充实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处分规定，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行为由违反群众纪律调整到违反政治纪律。四是充实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处分条款，增写搞政治攀附、结交政治骗子等行为的处分规定。五是针对执纪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增写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资料、情节严重行为的处分规定，进一步完善对党员信仰宗教、个人搞迷信活动行为的处理处分条款。这些修订，有利于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新征程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

进，使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大力营造了旗帜鲜明讲政治、从严从紧抓纪律的氛围，对顶风违反政治纪律、破政治规矩的问题，坚持严厉查处。特别是对存在“七个有之”、顶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严厉查处，绝不手软。除了众所周知的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案件外，还有一些查处比较有代表性。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是三江源的外围屏障和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意义重大。祁连山南麓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寒草甸，因多年的滥挖滥采被人为撕开了一条条裂口，形成多个巨大天坑。

2014年，党中央连续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决制止木里矿区破坏式开采，对环境恢复治理。然而，有人却“另搞一套”，在木里矿区长期非法采煤，严重破坏生态环境。2020年8月，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曝光后，针对有关单位和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不力等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多部门及青海省委组成督查组，对相关问题展开彻查。

2020年9月，青海省原副省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原书记文国栋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在此前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委原常委、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原常务副书记廖建国等多名干部接连落马。针对木里矿区非法采煤问题，青海共立案查处严重违纪违法领导干部15人，其中省管干部4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规党纪建设，为维护政治纪律提供了制度支撑。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四部分专门规定“严明党的政治纪律”；2018年和2023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与时俱进开展法规制度建设，确保了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在新实践中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大力加强政治纪律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一是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不断夯实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根基。二是进一步健全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颁布实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重要党内法规。三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严厉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铲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相互交织形成的利益集团，消除重大政治隐患。四是强化政治巡视，围绕执行政治纪律开展执纪审查，在解决腐败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其中隐藏的政治问题，突出执纪审查的政治性。五是通过规范党的组织生活、完善党内法规等一系列措施，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一步严明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为什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如此强调严明政治纪律？

首先，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政治组织。作为政治组

织，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行为上必然会有具体的要求，在纪律方面则体现为政治纪律。而加入党组织，就意味着接受党的主张，遵守党的行为规范，特别是要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否则就没有基本的资格。

其次，这是由现阶段政治纪律执行情况决定的。长期执政，意味着要掌握公共权力。而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具有腐蚀性。当前，不可否认，仍然有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政治纪律意识模糊，不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何物，虽然口头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在实际工作中却以地方、部门甚至个人的利益为重，甚至阳奉阴违，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防止和解决这类问题，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就需要严明政治纪律。

再次，这是由政治纪律本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的。政治纪律是根本性的、事关全局的纪律。不管违反哪方面的纪律，最终都会侵蚀党的执政基础，破坏政治纪律。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看出，部分党员干部之所以贪污腐败，最根本的原因也是政治上变了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有的地区和单位发生塌方式腐败，原因在于政治生态的恶化，而政治生态恶化往往又从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始。

最后，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大都能从“四个意识”缺失、“两个维护”不力，不讲政治纪律和不守政治规矩上找到病根。严明政治纪律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政治纪律严明，党的建设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政治纪律不严，党的建设面临的许多问题很难得到真正解决。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把严明政治纪律放在首要和根本的位置，只有全体党员干部时时把党的政治纪律牢记心头，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强大的领导力，才能带领全国人民攻坚克难，实现既定目标。

四、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对增强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力是不可缺少的。但纪律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纪律一旦被制定，就要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纪律一旦被触犯，就要得到应有的惩罚。严格执纪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特征，党的各项纪律和规矩一旦确立起来，便坚决执行。通过严格执纪，树立起纪律的威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高纪律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所指出的，“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党的纪律的威严在于遵守，党的纪律的效力在于维护。纪律如果不能得到遵守，就会成为人人践踏的摆设，失去其应有的效力。只有把各项纪律落到实处，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才能真正锻造提升党的领导力。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从不含糊，党才没有被攻破，没有被瓦解，才形成了强大的领导力。

（一）严格执纪一直在路上

严格执纪，从党成立之初就予以高度重视。党不仅在建党之初就制定了“铁的纪律”，而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严重违纪的党员进行开除。陈公博，广东南海人，1892 年出生于广州北门的一个官宦之家，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思想一度相当活跃。后来，在陈独秀的引导下，陈公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党的一大。但不久陈公博不服从党组织安排，拒绝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情况，并单方面宣布脱党，不再受党的约束，还未经组织允许擅自前往美国留学，违反了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而且不

思悔改，影响恶劣，故1923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就这样，陈公博非常不光彩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建党初期，对严重违纪的党员进行开除，并不是个别现象，在1926年前5个月，上海区委开除淘汰的党员就达800人左右。时任上海区委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沈雁冰（茅盾），在评估“大发展，大开除”策略时指出，“这样结果就拿住积极分子，就把党去深入群众”。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违纪现象，党中央强调要严格执纪，以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1935年9月，党中央专门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强调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使他“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不过，为了给张国焘实现彻底的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会议决定把党对张国焘问题的组织结论保留起来。但他未能从思想上清醒地认识自己所犯的政治错误，无视组织给予的机会，最终发展到背叛党和革命的地步。1938年4月17日，张国焘通过书面声明自行脱党，严重背叛了党和中国革命。次日，党中央决定即刻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严肃党内铁的纪律，同时将这一结果在全党范围予以公布，以教育全党同志，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严格执纪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在于发挥警示作用，预防党内类似违纪行为的再发生。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给“黄克功案”的审判长雷经天的复信中，专门要求他当着黄克功和到会群众的面宣读法庭判决和信的内容，教育全体党员、红军指战员和革命分子“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这里毛泽东将“黄克功案”视为对全党进行警示教育的重要机会，彰显了严格执纪的慑力。

面对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党员、党组织暴露出的思想不纯、作风不

纯等问题，党不仅积极开展整党工作、进行教育，还严格执纪问责，严肃处理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各解放区相继出台惩治贪污的条例，规定贪污罪的惩处办法。根据这些法规条例，党和军队严肃查处贪污腐化分子，整顿纪律，以杜绝贪污、维护人民利益。这一时期，党坚持从严执纪，持续整治不正之风，净化党和军队的政治生态，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严格要求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高级干部违反党的纪律的处置极为严格，决不允许党内有因为功劳大就可以违反党的纪律的特殊党员。1951年中共中央处置了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张子善。1952年1月毛泽东指示“三反”运动时强调“运动的第三个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并强调“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①]。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县委书记县长以上干部一律作自我检讨并作出鉴定的指示》，要求县处级以上的干部必须要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批评，要求地委书记、专员以上的干部写出书面检讨并上报中央。1954年中共中央又专门制定了针对全党中、高级干部的轮训制度。这一时期军队内部连续处理了一批生活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在发布的《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违纪的指示》中要求，要对团以上干部进行一次普遍教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进行严肃处理并上报。新中国成立初期严格要求党的中高级干部，严惩腐化堕落分子，使党内逐渐形成了较好的纪律氛围。

改革开放以来，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党的纪律建设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8页。

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面对时代变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严格执纪。正如陈云所言："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数据显示，1979年至2018年上半年，共给予党纪政纪（政务）处分600多万人，在这600多万人中，既有普通党员，也有党的高级干部，在党的纪律面前，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戒。其中，从1982年到1986年，共处分违纪党员65万余人。仅1985年和1986年，就处分省军级干部74人，地师级干部635人。其中包括，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周而复严重违反外事纪律案，航天部广宇公司走私案，吉林省委原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徐吉征包庇案，安徽省委原常委兼秘书长洪清源受贿案，江西省委原副书记、省长倪献策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等等，在党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二）新时代以来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信心推动严格执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信心推动党的纪律建设，坚持严格执纪，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根据《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2012年全国有8500万党员，全国查办案件15.5万件次，处分16.1万名党员，到2017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为8900多万，立案52.7万件次，处分党员人数44.3万人，党员受处分率从1.8‰上升到5‰。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数据，截至2022年12月31日，至少32名中管干部落马，至少37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在2017年至2022年六年中，中管干部落马人数最多，其中2017年至少18人被查。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数据，2023年共处分61万人，其中

党纪处分49.8万人、政务处分16.2万人；处分省部级干部49人，厅局级干部3144人，县处级干部2.4万人，乡科级干部8.2万人，一般干部8.5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41.7万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共处分省部级干部53人，厅局级干部2450人，县处级干部2.1万人，乡科级干部7.4万人，一般干部8.3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41.3万人。2023年，除处理省部级干部人数比2022年少了4人外，处理其他级别干部的数量均有上升。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数据，202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171.8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109.6万人次，占总人次的63.8%；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49.2万人次，占28.6%；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6.4万人次，占3.7%；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6.6万人次，占3.9%。相比于前两年，运用第三种形态和第四种形态处理相关人员的比例稍有增加。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运用第三种形态和第四种形态处理人员的比例均为3.5%；2021年，比例分别为3.3%和3.5%。

所有这些，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严明党纪、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坚定决心。

对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进行处理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严格执纪，树立起纪律的威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自觉，减少违纪行为。没有这样的执纪处理，纪律就是牛栏关猫、形同虚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严格执纪呈现出五个显著特点。

一是严格执纪无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严格执纪无禁区，任何党员干部都没有职位上的安全岛，也没有年龄上的安全期。

纪委监委机关对周永康、孙政才、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原省部级以上干部立案侦查，打破了所谓“刑不上大夫”的猜想，腐败分子无论级别多高，都要接受党纪国法的制裁，一批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的“大老虎”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在坚定“打虎”的同时，也坚决“拍蝇”，重点惩治“微腐败”，尤其对涉及基层群众利益关系人民安危的“蝇贪”进行重点查处，打破所谓“法不责众”的观念。

二是严格执纪零容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严格执纪零容忍，任何违反党纪国法者，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初步形成了“违纪必究”的纪律威信。仅党的十八大期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置问题线索达到 267.4 万件，立案 154.5 万件，处分 153.7 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8 万人。

三是严格执纪常态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严格执纪常态化，坚持久久为功，真正做到标准不降、要求不松、措施不减、氛围不淡，使党纪利剑始终高悬。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例，规定出台以来，党中央坚决贯彻落实，并持之以恒一抓到底，时至今日，党中央对八项规定的贯彻落实力度仍然不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坚持定期向社会发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

四是严格执纪与严格执法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一步理清执纪与执法的关系，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通过完善制度以及机构改革等手段，使执纪和执法在实践中有效贯通起来，使纪律和法律这“两把尺子”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真正做到纪法双施双守。

五是严格执纪与科学执纪有机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监督执纪科学化，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即“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这“四种形态”，促使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明显增强，纪律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当然，党的纪律不是单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规范和约束党员的言行，党的纪律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党员干部形成纪律自觉，减少党员违纪行为。因此党纪严明既要严格执纪，更要科学执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加快推进执纪科学化，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可以看到违反党的纪律，接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干部数量明显增多；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明显增强，纪律的约束力明显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经验时，对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给予了充分肯定。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各形态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

一是以思想引领为前提，增强实践“四种形态”的行动自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其基本原则是抓早抓小，把监督执纪关口前移，通过惩防并举有效阻断违纪进程，防止小问题演化为大问题，防止违纪演化为违法。强化党内监督执纪，必须利用好“四种形态”。强化教育引导，注重加强党员干部政治纪律的党性教育，通过开展集中辅导、专题讲座等方式，将“四种形态”的内涵要求入心入脑，引导党员干部增强纪律和规矩意识。运用报刊、电视、微博、微信等媒体资源，运用“以案说纪”、通报典型案例展等

方式，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消除和澄清“拐点论”“影响论”“抓小放大论”等模糊认识，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思想引领，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增强“四种形态”的行动自觉，在思想上阻断违纪进程，拧紧思想“总开关”。

二是以严肃问责为基础，夯实实践“四种形态”的工作支撑。纪律的力量在于执行，党的纪律建设贵在落实和执行。在党的纪律建设中，纪律的落实和执行也至关重要，执纪有力，制度才有约束力。重落实、重执行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工作方式。首先，要坚持严字当头，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认真落实加强纪律建设的政治责任。一方面，组织开展“两个责任”落实情况全覆盖督导检查及“回头看”工作，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加强专项督导，及时发现问题，制定下发个性化的问题反馈清单，督促整改落实，形成层层压实责任、积极履行责任的良好态势。其次，强化追责，建立健全约谈制度。强化追责问责完善长效机制。建立协同推进机制，纪委监委统筹协调，整合纪律审查部门、执纪审理部门、案发单位等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通过落实“两个责任”追究办法，对单位部门的不正之风案件实行“一案双查”，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由纪检监察机关抓好纪律审查，追究违纪责任；又加强纪法衔接。同时，各级党组织通过加强监督执纪，坚决把违纪增量遏制住。严肃问责越明确，执行越严格，越有利于保障党员各项正当权利和自由。

三是以全面从严为核心，狠抓实践“四种形态”的关键环节。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纪检机关作为专责监督机关，带头落实，关键在党委（党组）。纪检机关要在党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党内监督，要定好位、防越位，不搞“包打天下”和“单兵突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对承担

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进行签字背书，做到守土有责。”[①] 在带好头的同时，更加注重标本兼治、注重预防、强调管住大多数。更加注意督促党委（党组）把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应尽之责，认真贯彻惩纪在前的要求，牢固树立严管厚爱的理念，真正养成“咬耳扯袖”的常态，管到位、严到份，落实好管党治党的重要任务，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大合力。与此同时，坚持克服好人主义倾向，当老好人、怕得罪人，结果往往害了好人，制造“坏人”。我们需要有“敢”的态度，更需要有“严”的尺度。要准确把握政策纪律尺度，教之有理，惩之有据，精准发现问题，力推解决问题，确保监督执纪问责的实效。

四是以规范严谨为标准，健全实践“四种形态”的管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加强问题线索受理工作，拓宽反映渠道，调整和规范问题线索分类标准，为各级纪检机关提供了重要遵循。把握运用好“四种形态”，必须正确把握与线索处置“五类标准”间的关系，规范问题线索处置流程。“五类标准”适用于对党员干部问题线索的“诊”，“四种形态”则运用于对已查实问题的“治”。要把发现违纪问题作为纪检监察室和信访、巡视工作的重要内容，可借鉴社会治安“网格化”管理办法，增强主动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所有问题线索都要从纪律层面认真梳理，全部纳入“五类标准”进行处置。已造成积压的要“起底清仓”，限时处理完毕。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抓紧建设受理、分流、处理、监督等一体化的监督执纪信息管理系统，为监督执纪插上科技翅膀。

①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页。

第八章
制度的力量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是由一整套制度机制安排来保障的。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党的坚强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更加自觉地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立起一系列规则，为治理好世界最大政党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持。中国共产党自身及其事业的发展充分证明，有效的制度机制是增强党的领导力的可靠保障，是中国共产党超强领导力的重要秘诀，对持续推进拥有14亿多人口大国的进步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制度机制支撑和保障

自建立起，中国共产党对制度治党治国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一）从制度不如人到新制度的探索

中华文明有着悠久的制度建设传统。不论是《尚书·周书·周官》

里的“议事以制，政乃不迷”，还是《墨子》里的“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都强调有了制度治理才不会迷失方向。中国古代的“十通”，详细记录了历代制度沿革。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内涵丰富、各具特色的制度逐步发展成为一整套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

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落后于时代潮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西方列强叩开国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但主流的声音认为，中国万事都在西方人之上，唯独制器不行。然而，甲午战败警醒了中国先进分子，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中国不是器物层面不如人，是制度层面不如人。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中国废除帝制，走向共和，开启了旧邦新造的历程，但是依然都失败了。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在陈独秀看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觉悟分三步：第一步觉悟是学术觉悟。魏源、李鸿章这些人认识到技不如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就有了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第二步觉悟是政治觉悟。从康有为到孙中山，认识到制度不如人，主张改良与革命，这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第三步觉悟是伦理觉悟。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激进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掀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认为，技术不行、制度不行，归根到底是人不行，人的素质不行，实际上是思想不行、文化不行。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就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心办一本杂志，促进人的思想解放，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通过改造国民的脑子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一个工人、农民当

家作主的新国家诞生了。俄国人的路，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在中国大地开启了全新的自身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漫漫探索。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度治党及局部执政条件下制度治国的探索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遭遇严重挫折。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 4 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毛会师后，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当时革命军队刚刚建立，队伍思想还比较混乱，各项制度还远未健全。作为军长的朱德认为，军队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在权力上不能过于集中，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发挥更多人的聪明才智。而作为政委的毛泽东则认为，军队打仗更加重要的是令行禁止，权力还是集中一点好，这样有利于迅速作出决策，从而避免贻误战机。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则逐渐变成了前委与军委之间的分权。军委到底是要在前委的领导下工作，还是前委和军委各分管一块？朱毛之争，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1929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专门就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作出决议。在这个决议里，确立了“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的领导制度。决议还规定：“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决议明确规定：“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①] 回答并解决了建党建军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原则性问题，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古田会议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起到了奠定乾坤的关键性作用。

1931 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局部执政条件下制度治国的伟大探索。在党的领导下，开创性地建立了以宪法大纲为主体，包括 130 多部法规律令的新型法治体系，有力保障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事业在各级各地有序推进，也为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延安时期制度治党及局部执政条件下制度治国的探索

延安时期，党的民主集中制度体系、中央领导机构工作制度体系、集体领导制度体系、请示报告制度体系逐步完善，为保证党的坚强领导起到了坚实支撑。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山西太原友仁中学 16 岁的女青年刘茜来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89 页。

到延安，和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谈起了恋爱。黄是江西人，26岁，少年时就参加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在四渡赤水和夺取娄山关的战役中立过大功，又当过师宣传科长和团政委，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毕业后就留下来任队长。恋爱期间，刘茜因忍受不了黄克功的骄横和霸道，便给他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要终止关系。接到信后，1937年10月5日黄昏，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谈话。当刘明白无误地表示要与黄断绝恋爱关系后，黄克功一怒之下，拔枪打死了刘茜。

黄克功在收监期间，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由于他功劳大而从轻发落，还给毛主席写信，请求留他一条生路。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就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杀人致信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和审判黄案的审判长雷经天："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①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在战友情感与法律制度之间，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黄克功被依法处决后，在延安甚至西安、太原等地都反响强烈，人们盛赞共产党和八路军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相比于日渐腐败的国统区，大家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希望的曙光瞩目于延安那一方土地。

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局部执政"，不仅为制度治党提供了宝贵经验，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为了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愿意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各区县广泛发动人民选举参议员，召开参议员大会，选出基层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和参议会常驻机构，参议会制度逐渐在县区以下的基层政治生活中代替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成为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实行了"三三制"，就是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在1941年1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共产党员徐特立当选为参议员，由于共产党员当选人数超过"三三制"的要求，他当即声明退出，由党外人士递补，得到了边区各阶层人民的称赞。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崭新的概念，为人民代表大会勾勒出了初步的轮廓。随着抗日战争结束，适用于抗战期间的政权组织形式完成其历史使命，解放区的政权组织形式开始由参议会向人民代表会议过渡，并逐步实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这时

代表会议”这一概念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含义原则然，该制度真正在全国实施是在1954年。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当历史的脚步走到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在这个重大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1月6日至8日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号召全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会上作结论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完成全国革命的任务，这是铲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新房子”的四梁八柱。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既是建设“新房子”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新房子”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倒行逆施、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越来越被中国社会各界人士所认同。

194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如何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热烈响应，纷纷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五一口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页。

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确定的重要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基本政治制度，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共同纲领》确定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宪法进一步确立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五）改革开放后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民主制度化、法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党中央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立起一系列规则，为治理好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持。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持续推进拥

有13亿多人口大国的进步和发展，确保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

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为主题，专门研究部署。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①] 邓小平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这个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确立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六）新时代制度治党治国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度优势从哪里来、制度优势是什么、如何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进行了深刻阐释，进一步坚定了全党的制度自信，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巩固和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集中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系统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谱，它由13个部分组成，其中，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它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还首次从6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综上所述，制度治党治国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中国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是由一整套制度机制安排来保障的。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备无与伦比的强大制度优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强大的领导力，使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增强党的领导力，必须注重制度建设。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键是要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保证党正确行使决策权和党组织的强大；选贤任能制度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制度，保证党科学行使选人用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执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为党正确行使国家权力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大党，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真正组织起来，实现党的团结统一和力量凝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统一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民主的集中制。[①]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8页。

（一）民主集中制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民主集中制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奠定思想基础、列宁明确提出来的科学概念。列宁在领导俄国工人运动和探索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建党思想，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一词，最早出现在1905年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文件中，代表会议的决议《论党的改组》中说：“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是不容争论的，认为有必要实行广泛的选举制度，赋予选举出来的各中央机构以进行思想领导和实际工作领导的全权。”从民主集中制的概念起源，就可以看出它是赋予党的领导合法地位的重要程序规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苏联不断发展和完善，补充了一系列新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政党，并以民主集中制领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民主集中制从建党起逐步扎根于中国并延续至今。

虽然在我们党的一大到四大的党章中还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这个概念，但在党章条文中体现了这个原则。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第一次明确地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对在严酷环境下严肃党的纪律，领导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在第七条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三条根本原则：“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产生；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并且要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党的七大对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和基本原则做了更加完整的规定。

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民主集中制不仅作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日益确立并逐步完善，而且其作为国家组织制度领导制度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并最终确立。

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强调：“抗日战争中政府必定要采取民主集中制。”

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他明确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组织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权机关的建设中，在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组织形式的同时，也确立了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领导原则。毛泽东强调指出：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①]

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

---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677页。

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新中国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经臭了，"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①。正是在中外历史经验的比较总结中，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新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而应采用与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政权建设中得以确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982年通过、历经数次修正的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二）民主集中制为正确决策和有效执行提供了坚强制度保证

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中，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党的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成为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原因有很多，党靠民主集中制实施组织和领导毫无疑问是重要原因。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议一开始，"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归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于客观原因，不承认主要是因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随后，周恩来做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和李德，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两个报告之后，是自由讨论发言。张闻天率先表示不同意博古报告的意见，他事先同毛泽东、王稼祥进行了多次讨论，撰写了详细的发言提纲，着重分析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的错误。毛泽东重点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阐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在军事上扭转危局的方针。王稼祥明确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党和红军。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发言中，均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

会上，也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就在会上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批评毛泽东是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的。而李德则拒绝接受批评。

遵义会议最大限度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一次在高度民主基础上达成高度集中的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的典范。经过明辨是非，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正是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保证了遵义会议党的决策的正确并使党的决定得到有效的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快

速发展震惊世界。中国速度的背后是什么？虽然一直以来西方对中国有各种偏见和误解，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没有异议：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力就没有速度。从“两弹一星”到“嫦娥”探月，从三峡工程到青藏铁路，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从脱贫攻坚到新冠疫情防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了其强大的领导力。正是中国共产党具有民主集中制这一优势，决定了党在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中可以彰显超强的问题解决能力、共识凝聚力、社会动员力和恢复回旋力。

（三）民主集中制能使党和国家的力量强大

为什么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决策正确并使其快速有效执行？对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有很透彻的论述。

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矛盾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从这两方面的意义上说，“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①]

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①] 因而，也就最有力量去打败敌人，我们的革命战争也正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不仅强调了政权组织应实行民主集中制，而且又论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指出，“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可以立即实施”。他认为“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②]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因为它可以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各级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从而“有效防止和克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分散主义”。更重要的是，它能够促使各级“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在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现象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特别强大且有力高效的领导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83 页。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9 页。
②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351 页。
③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023 页。

所有这些论述清晰地表明，民主集中制体现着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

民主集中制的民主是发挥各方面积极性的可靠保证。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专制主义的倾向，反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毛泽东在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就谈道："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①] 从领导体制上，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中的服从原则，取决于组织、上级和中央的组成和决议是否在相应范围和层次上按民主程序产生和通过。民主集中制是以从下而上民主程序作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换言之，最重要的是要保护"保留少数意见"的权利，拥有保留己见，可能在未来成为多数意见的自由。在领导过程中，强调把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防止权力个人化和个人崇拜。

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都是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作出的。中国的成功离不开国家决策过程中大幅改进的"新型民主集中制"。中国的重大决策，都会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磋商和咨询，最后才形成共识、作出决定。党的上级组织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在中央政府做出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向智库、政府机构、高校、学者、专业人员征询意见，甚至会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激烈讨论中吸取有用的建议。最终形成的决定往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往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广泛共识，而且许多政策已经在小范围内进行过试点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的起草为例。中央文件起草组在2020年3月发出征求意见的通知，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这个起草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集思广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十四五"规划编制明确提出一系列要求，强调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从7月下旬到9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基层代表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意见和建议。8月16日至29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征求意见。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与，留言100多万条，有关方面从中整理出1000余条建议。8月10日，建议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部分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意见。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共有546条被采纳，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共计366处。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广泛的民意支持和意见整合，使得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得到了保证，成为我国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实践。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向党闹独立、极端民主化的教训，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党内民主的实质，是要发扬党员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

责任心。不能使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有些人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是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这是错误的。

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党的力量凝聚和行动一致的可靠保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中央权威，确保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形成统一的步调，采取共同的行动。集中制的原则是防止组织和行动涣散的重要保证。环境越是严苛，斗争越是复杂，则权威和集中的必要性就越凸显。例如，在建党初期，党是在不合法或者半合法的条件下活动的，经常受到残酷的迫害，为了有效地领导斗争，就需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保证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实现正确的集中，才能应对伟大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国家实力逐步强大，美西方等反华反共势力采取了一系列新对策，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面对复杂的党外和国外形势，迫切需要全党统一起来，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为此，十九大的党章修改特别强调了正确集中："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①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运用，服从于形势的需要，取决于党的状况，取决于党进行的活动的具体历史条件。概括起来，正如

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部分修改，于2017年10月24日通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①

历史充分证明，贯彻和执行民主集中制，既能有力地汲取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又能有力地保证党的领导权威，把全党牢固地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民主集中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制度优势，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有效执行、使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和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对比当今西式民主制度遇到的制度僵化、政治困境，民主集中制的优势在国家治理比较中彰显得淋漓尽致。

三、科学精准的选贤任能制度

毛泽东说过，领导者的责任，一是决策，二是用人。用人权是最重要的领导权和执政权，因此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不动摇。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在组织制度和干部制度上形成了非常有效的做法。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86页。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干部和人才制度建设

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以贤能为标尺的选拔任用制度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和各级领导干部产生的重要制度基础。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积累了丰富的治吏经验，建立了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较早地形成了吏员编制制度、官员考核和选举制度。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才造士，为国之本”的道理，在吏治方面留下了很多思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比如，《墨子》中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司马光提出“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等。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干部和人才制度建设。历经百余年历史淬炼，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选贤任能精华的基础上，吸收世界各国的进步因素，不断完善干部选贤任能机制。

毛泽东对干部制度和干部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在全国推动党组织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锻炼出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组织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初步探索建立了干部调研制度、干部学习制度，建立和健全干部部门“经常了解、考核、选拔干部，向党委提供意见”的管理制度，奠定了党管干部的组织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全国逐步建立起由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中组部和各级组织部统一管理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制度。把后备干部的培养制度化，建立了干部职务名单制度、干部考察谈话制度等。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领导制度的弊端逐步暴露，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在干部制度方面，主要的弊端表现为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推动干部提拔使用制度化，建立了退休解除职务的办法，有效克服了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都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重点做好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作为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努力建设五大体系。第一，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第二，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第三，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第四，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第五，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知事识人体系和选拔任用体系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的命题。素质培养体系回答了“怎样成长为好干部”的命题，是五大体系的重要支撑。从严管理体系和正向激励体系回答了“怎样把好干部用好”的命题。其中从严管理体系是必然要求，贯穿于五大体系中的全部环节。通过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确保高

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目标的实现。正向激励体系是发展导向。有激励担当的导向才能激发敢于担当的激情，有保护担当的制度才能形成人人担当的氛围。与传统干部人事制度中的“选、育、用、管”四大环节相比，五大体系中最后提到的“励”，展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新理念。

可以看到，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确保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经过百余年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选贤任能制度，不仅使党的干部队伍如同有源之水，生生不息，更为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性、独特性、优越性愈益凸显。

（二）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选贤任能干部制度

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选拔任用干部以重视政治素养、重视政绩、重视台阶、重视多岗位锻炼等为特色的选贤任能制度。

干部标准是选人用人的衡量尺度，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把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准。毛泽东指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干部要又红又专。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强调首先是要革命化。江泽民指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干部，政治上必须合格，要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胡锦涛强调，选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决防止和纠正重才轻德现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等要求，归结起来就是干部首先要在政治上达标，选人用人首先要看政治素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政治标准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一贯方针、根本标准，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100多年来干部队伍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在选人用人上的集中体现。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选人用人的政绩标准。党的干部的职位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要想成为一名称职的领导干部，必须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做到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旺盛斗志和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自强不息，励精图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用真心，使真劲，扎扎实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进入新时代以来，干部的政绩标准更加科学合理。202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提出要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优化政绩考核内容指标，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这份文件的出台廓清了政绩考核的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通过优化完善政绩考核来“撬动”高质量发展。各地进一步优化考核内容，改进考核方式，把真干假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辨别出来，以奖惩分明、奖优罚劣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推动科学发展。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重视台阶、重视多岗位锻炼。重台阶但不唯台阶。所谓重台阶，是指干部人才选拔使用过程中应当经过的一个个级别。所谓不唯台阶，是指对特别优秀的、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干部，敢于突破常规，不拘一格，把他们破格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必要的台阶和

资历，是干部积累领导经验所需要的。只有把年轻干部放到一定的岗位上，放到一个个“台阶”上，才能对其德才、潜能有比较真切、具体的了解。年轻干部只有经过必要的台阶，尤其是在关键台阶和重要岗位上锻炼得扎实一些，才能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得到群众的认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步登天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行不通的。许多同志有这样的体会，参加工作后，在普通岗位上经历一些难事、急事、大事、复杂的事，能够更加深刻地感受国情、社情、民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接地气’，正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苗助长易夭折。干部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①

实践充分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选贤任能用人制度是科学的富有成效的。它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确保了所选出来的干部是开拓创新的“实干家”、能真正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而不是西方社会那样的只凭口舌博取选票的“演说家”，只开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对选民的承诺。

事实上，中国选贤任能用人制度的优势，正越来越受到全球的认可与借鉴。不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认为，中国式贤能政治的竞争性可能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丰富了人类社会选举政治的理论和实践。欧洲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彭轲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好的共产主义者：当代中国的精英培训和国家建设》，专门研究中国的干部培养，是目前海外唯一一本对中国的党校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他特别注意到，党通过自身的优越性跨过西方政党轮替这一通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49 页。

门槛，更加优化地系统地治理中国。

（三）干部工作各项制度在新时代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进。中国特色的选贤任能用人制度，在这一新的历史进程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展现出更大的优势与活力。

1. 突出科学精准的理念

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要求，为干部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干部队伍建设只有融入精准科学理念，才能把高素质专业化要求抓实抓出成效。

精准首先是凸显专业化和科学化。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必须注重培养专业能力、专业精神，增强干部队伍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能力，拥有更多政策水平高、专业能力强、实践经验多、善于开展工作的领导人才。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干部的专业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使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跟上时代节拍，避免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努力成为做好工作的行家里手。”② 新时代干部的专业化，是在已经基本解决过去干部专业对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新兴行业和战略行业的干部队伍专业化问题。如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但不少

① 《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8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 页。

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修订颁布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制定《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等，实施干部专业化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和发展在实践中培养干部，在基层锻炼干部的制度，有计划、分期分批地从中央机关以及国家机关中选派有文化知识的年轻干部到基层或地方挂职锻炼，对培养干部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还不断完善干部调训制度，根据干部特点有针对性地安排调训，帮助补短板强弱项。

把握干部成长阶段性特征，优化成长路径，通过健全全程培养链条，建立接续培养机制，把理想信念教育、知识结构改善、能力素质提升贯穿干部成长全过程。包括健全系统培养机制，统筹考虑影响干部成长的各个要素，注重“八大本领”培养，强化全方位锻炼，全面提升干部能力素质；健全干部交流制度，推进轮岗、交流常态化制度化，促进干部多岗位锻炼，全面发展。

4. 解决怎么“激励人”的问题

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必须要激发制度活力、激活基层经验、激励干部作为。只有调动和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为，才能创造出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鼓励各地各部门探索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容错机制和保护机制，旗帜鲜明地鼓励和保护勇于改革创新的领导干部，激励广大干部奋发有为，撸起袖子加油干，凝聚形成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2018年，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在坚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干部的厚爱和激励，切实

做到从严管理干部推进一步，干部激励工作就跟进一步。

近年来，各地围绕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作出了一系列探索。例如，浙江省出台“干部为事业担当、组织为干部担当”良性互动机制意见，提出20条举措，打出一套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组合拳。加强政策保障，连续多年实施乡镇干部经济待遇一般高于县级机关同职级干部20%以上、乡镇（街道）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比例提高到20%的政策，实行绩效奖金差异化分配，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年休假制度。注重心理关怀，常态化开展“向组织说说心里话”活动，6个市、57个县（市、区）建立干部心理健康关爱中心，加强心理疏导和压力调适。在非常时期以非常力度关心关爱一线干部，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阶段，及时推出“暖心八条”，整合组织、财政、人社等条线政策工具，有效激励一线干部担当作为的同时，还探索建立不实举报澄清保护机制，浙江省市县纪检监察和组织部门为2746名干部进行澄清正名。对被问责和调整的干部，加强后续跟踪管理，对表现好的进一步使用。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深入整治涉及基层“八多”问题，201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省本级、各市县印发规范性文件全部精简30%以上，省本级、11个地市会议总数均同比精简40%左右，省级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同比削减约90%，省级层面一票否决和签订责任状事项分别精简88.9%、58.1%，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抓落实。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制度基础。与世界其他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具备无与伦比的强大制度优势。在所有制度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力，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保障的。同时，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最大优势也是通过制定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取得最大的执政效果。在百余年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形成了独有的制度优势，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胜利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大成果，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许多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提出来的。通过不断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中国人纠正了苏联式经典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很多弊病，使社会主义制度焕发了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建设征程上，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成功探索，没有中国40余年来的制度变革和探索，就不会有制度优势的底气。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度优势从哪里来、制度优势是什么、如何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进行了深刻阐释，对进一步坚定全党的制度自信，在新的条件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长远的重大意义。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要顺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必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担负好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大职责。”[②]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是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了著名的“合脚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一定要有定力、有主见，决不能自失主张、自乱阵脚。

（二）把党的领导这一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在百余年历史发展中，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没有这样的转化，制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5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度优势就是一句空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对我们党的领导地位、领导方式的准确界定，有利于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各方面智慧和力量整合起来，协调高效地解决党内外各种矛盾和问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有力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有力有效地把517.6万个党基层组织、9900多万名党员、14亿多人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增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所谓总揽全局，就是各级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集中精力抓好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把握政治方向，决定重大事项，安排重要人事任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效地实施党在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所谓协调各方，就是党委要从推进全局整体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统筹安排好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政法、武装以及群众团体等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了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好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提法，始见于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党的十三大和十五大都有强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彻到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体系。[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从六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包括：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

由此可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是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更好地处理党内关系和党与其他组织关系的新结晶、新思路，是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总抓手。

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近年来在实践中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

比如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机构和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党组是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领导机构，在本单位发挥领导作用，是党对非党组织实施领导的重要组织形式。为切实把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覆盖到所有机构和组织，2015 年 6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这对推进党组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 年对《条例》进行了修订完善。《条例》规定，党组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全面履行领导责任，加强对本单位业务工作和党的建设的领导，推动党的主张和重大决策转化为法律法规、政策政令和社会共识，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为了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2019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推动了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明确了请示报告的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的程序、请示报告的方式等。规定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的重大原则和问题，国家安全、港澳台侨、外交、国防、军队等党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事项，以及其他只能由党中央领导和决策的重大事项，必须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报告一下有好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事情能办得更好。各地区各部门党委（党组）要加强向党中央报告工作，这也是一个规矩。"① 通过这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机制，保证了党对各类非党组织的领导。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2 页。

比如完善党领导各项事业的具体制度。事业发展到哪里，党的领导制度就跟进配套到哪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建设步伐加快。为了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党领导经济社会各方面重要工作的制度规定，确保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党管意识形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党管农村工作、党管办学方向等落到实处。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不断推动党对国家各项重大工作的领导。同时，还不断改进完善了党领导实施重大战略的制度机制，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实施"七大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东北全面振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健全党统一领导、统筹协调、督促检查的制度，形成了科学协同机制。

再比如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①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作为首要任务，从机构职能上解决党领导一切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完成了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 页。

制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保证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

以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为例，是要在改革中做到党政群统筹，以加强党对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出发点，以更好、更高效地服务人民群众为着力点，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统筹各类组织，优化各种体系，简化各项程序，形成简约高效的管理体制，不断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基层政权机构设置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必须更多地结合基层实际状况和基层事务特点来安排，科学定位各机构职能属性和工作流程。近年来，各地围绕党对基层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浙江省不断完善条块协同、集约高效的政府负责机制。深化简政放权，整合政府资源，构建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的社会治理部门联动机制。优化“基层治理四平台”和“全科网格”，将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的服务管理职权和人员纳入平台和网格，构建精简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探索情报信息联通、重大安保任务联手、重点人员联管、重大突发事件联处、突出矛盾风险联治的部门联动机制。着力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制度，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又如，北京抓住街道改革这一重点，开启了以“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核心的全方位基层治理变革。职能改革最终需要落实到机构上，这是中国特色的机构、职能与编制三项规定的核心内容。先后出台了《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通过赋权实现了“不平衡权力”的“再平衡”，让街道在承担属地管理职责时，拥有了更多与之相匹配的权力，避免了属地管理成为部门推卸责任的借口。这一系列的职能体系优化，为保证党的领导落实落地提供了有效制度支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有如此强大的领导力，关

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

纵观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深入到国家制度的竞争，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竞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更需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制度的优势，把坚持什么、保留什么、改革什么、完善什么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回答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完善。

第九章
组织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诞生百余年来，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展现了独特而强大的领导力。百年大党的卓越领导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月14日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掷地有声地作出了回答："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纵观近代以来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诸多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终得到历史和人民的青睐，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领导中华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是因为从建党之初就极度重视组织的力量。无数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党的组织性力量、整体性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力的独特而强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无比坚强的重要密码。没有强大的组织力量支撑，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全面领导都难以实现。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领导力的组织支撑和保障

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目前，在全世界，还没有哪一个政党有如此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更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有着严

密坚强的组织，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量。党的强大的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百年辉煌的制胜法宝，是我们党战胜艰难险阻的坚实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织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把群众组织起来了

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问得非常深刻，可谓中华民族根本之问。蒋廷黻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积弱之源，失败之根本，所有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组织起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中国，军阀割据、战争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民权初步》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如'一盘散沙'，人人得以欺之。"他在多次革命失败后发现，无论是同盟会，还是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都极度缺乏组织，因而希望建立一个"列宁式政党"。这里的"列宁式政党"就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指导的、具有高度组织化和强大组织力的政党。只有这样的政党可以改变中国原来松散无序、缺乏行动力的状况。

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孙中山先生的愿望才得以实现，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才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才有了组织性的主心骨和领头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了组织力的重要性。1929年4月，毛泽东就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组织力的概念。在《论持久战》中还把政治组织力的强弱

作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加以论述。1939 年 5 月 20 日，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着重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1943 年 11 月，毛泽东专门以《组织起来》为题作重要讲话，强调要“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并提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毛泽东起草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其中提出，“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1958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高唱着《我的祖国》凯旋。

“强大的祖国”是中国人民一直渴望的。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致，大批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国内群众向志愿军寄送慰问品，捐献飞机大炮，甚至东北地区掀起给志愿军“送炒面”的热潮，文化工作者开展文艺慰问演出，全国人民仿佛一瞬间凝聚出了强大的力量。

从近代以来的“一盘散沙”到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同仇敌忾”，这样的转变究竟蕴含了什么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强大的组织力量。毛泽东谈到抗美援朝伟大胜利时说：“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大气磅礴，声震寰宇。其中的灵魂就是“组织起来了”，组织能使力量倍增。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特别是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解决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问题。

（二）党能够有效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在于党自身的组织严密和坚强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自身的组织严密和坚强。组织严密和坚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极端重视党的组织严密和坚强问题。党的一大在讨论党的性质问题时，曾经围绕一条关于组织问题的规定发生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党要有严密的组织，要有中央，能指挥各个小组，要有纪律，要有民主集中制，反对自由联合。另一种意见不赞成组织严密的、战斗的工人政党，认为用不着什么中央、纪律，发展党员不可限制太严，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至于党员是否实际参加党的组织和担负一定工作，是无关紧要的。经过讨论，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第一种意见。最后，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严格的入党手续，要求“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从而将党员严格地置于党的组织之内，并以严格的纪律相约束。

到 1927 年，由党的五大授权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明确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条规定此后一直延续了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一条重要规矩。

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遇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早有先例。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代表对章程的一个条款出现不同意见，以列宁为首的一派主张党员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以马尔托夫为首的一派认为不需要参加。列宁的意见没有被通过。但在随后选举《火星报》编委时，列宁一派变成了多数，于是就形成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到 1905 年，党章才按列宁的意见作了修改。此后，这一条款不仅成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规范，而且在共产国际成立后，进一步成为世界上所有共产党的共同规范。

为什么一条规定如此重要，甚至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延续了百年之久而没有改变？根本的原因就在“组织”二字上。

中国共产党从筹备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铁路去、到煤矿去、到兵营去、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建立党的组织、群团组织和其他各种外围组织。

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党章、规范组织，将党建成了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力量。从 1921 年至 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的 28 年间，南京地下党组织曾经 8 次遭到敌人残酷破坏；113 名主要负责人中，32 人先后英勇牺牲，任职时间最短的一任市委书记，到任 7 个月就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但是，每一次被破坏之后，党组织又都顽强地恢复重建了起来。

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当组织被破坏后，或部队被打散后，一个普遍和顽强的信念，就是找到组织。“找组织”成了共产党人的一句口头禅。

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翻转过来。”列宁套用这句话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做到了。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也把中国给翻转了过来。靠的什么？原因很多，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组织。

（三）党的组织力的含义和特征

目前，对党的组织力有广义与狭义两种解读。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直接表现为组织形态上的领导；离开了党的组织，党的一切领导、一切工作，就无所依托、无所指使。广义的党的组织力是指党的组织形态的领导力，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不是个体领导力，而是党的组织整体形成的对人民群众、社会和各项事业的领导作用和领导效果。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组织整体的强有力领导之下，“两弹一星”问世，青藏铁路修通，三峡大坝建成，“南水北调”工程成功，“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狭义的党的组织力则是党组织自身的体系之网之密、相互联系之紧、思想步调之统一，进而形成的强大的组织力量。本章说的就是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有三个特征。

一是组织严密，形成体系。我们党有中央组织、地方组织，有发挥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基层组织，还有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党组。不论职务高低，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具有超强的组织力，织密组织体系之网，形成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主要原因。

二是各就其位，各尽其责。党的组织体系各个部分，准确定位、

分工合作、有机联系。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党的地方组织的根本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直接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党员队伍是基本细胞。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委、基层党组织在跑好党的事业发展“马拉松”中各自发挥“最初一公里”“中间段”“最后一公里”作用，各正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三是思想统一，行动一致。全党围绕中央形成统一整体，上下一心、左右联动、步调一致，确保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

由此，党的组织力可以表述为：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形成动员、组织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以及其他组织以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改革发展等的整体力量。

从政治功能维度看，党的组织力首先体现为，把政党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转化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以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党把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作为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并转化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行动，形成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虽然我们党历经艰难困苦，但自始至终初心不改，坚持以建党引领建国，以强党引领强国，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书写了世人瞩目的辉煌篇章。

正因为党的政治功能发挥着推动和牵引组织力的重要作用，在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数十万红军战士长征路上血染沙场，数百万群众推着独轮车赶往前线支援三大战役，数千万青年知识分子冒着生

命危险奔赴圣地延安。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约有370万名共产党员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新中国成立后，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在普通岗位干出不平凡业绩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典型。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以使命支撑组织优势的有力注解。这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历史经验表明，强大的组织力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取得胜利的关键要素。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还是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年代不见硝烟的博弈竞争；无论是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还是攻坚克难的改革发展，党始终能够凭借强大的组织力，把党员聚集起来，把群众聚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其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依托强大的组织力量有效地整合与协调各方资源力量，实现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最本质特征。组织严密和坚强，作为独特而强大的组织优势，具有强大组织动员力、行动力、战斗力，是一把解开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密码”的“金钥匙”。

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要使我们党持续具有强大领导力，从容应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多变的局势，需要党的“中枢神经”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把党的组织体系织密建强，把党的组织根基筑牢夯实，以磅礴的组织力量和雄厚的组织资源，搬掉所有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化解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危机的挑战，切实做到“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由此，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汇聚党的组织优势，壮大党的组织力量，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和实际工作本领，

实现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和有效动员是迫切要求和当务之急。

二、组织体系严密坚强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充分展现出巨大的组织力量。组织之所以有力量，固然需要每一个个体成员或每一个组织要合格、要强，但更需要组织体系严密坚强。我们党从初创时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9900多万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组织的紧密组织。党在长期实践中，积极探索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党组织作用充分发挥的格局，吸纳集合了大量的先进分子和各方面优秀人才，同时培养和储备了大批后备力量，建立了结构严密、功能清晰、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

（一）组织体系严密坚强才能形成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

正是严密坚强的组织体系，成就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是我国首座符合国际标准的跳台滑雪场地。其主体建筑灵感来自中国传统饰物“如意”，因此被形象地称作“雪如意”。这里是承担北京2022年冬奥会跳台滑雪、北欧两项比赛的场所。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时，一位来自河南武校的运动员给习近平总书记表演了一段跳台滑雪，习近平总书记诙谐地对大家说：“你们选人也很讲究，武术运动员练的正好也是飞檐走壁啊！”[①]

其实在冰雪健儿中，“跨界跨项”的运动员还有很多。正是因为我们有严密坚强的组织体系，能在各方面统筹调度、优化选配，才能在短时间内为冰雪队伍注入许多新鲜血液，缓解了人才短缺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一次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距离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包括张家口赛区在内的冬奥会所有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到京张高铁、京礼高速全线通车；从许多冰雪项目从无到有，到有些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无不印证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这种制度优势，关键是靠严密坚强的党的组织体系来实现的。党组织自身的体系之网之密、相互联系之紧、行动步调之统一，形成了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正因为如此，2018年7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②]。

要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深入贯彻，必须确保党的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充分发挥党的严密组织体系的强大组织力、行动力、战斗力。离开了党的组织体系，党的一切领导、一切工作，就无所依托、无所指使，党的全面领导就无法实现。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组织体系展现了强大的内聚力和行动力，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面貌、中华民族和亿万人民的命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

①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靠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人民日报》2021年1月22日。

②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页。

（二）组织体系构建始于建党

构建组织体系的工作，从建党就开始了。1921 年，中共一大的召开成立了第一个党的中央机关，会议的圆满结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党的一大在提出建党基本原则与基本目的的基础上，初步确立了党的“两级组织体系”，即中央局与地方组织。

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第二章第四条明确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由此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单位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原则和传统。

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要求：“所有党员无民族与国界之分，都应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部的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初步确立了所有党员编入基层党组织的原则。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提出：“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服从党的决议、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提出：“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至此，所有党员编入基层党组织的原则和传统得以确立。

1927 年 6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首次提出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二章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党的组织机构，是按照民主的集中制建设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条件，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组织作定期工作报告；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服从中央；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它科学地规范了个体和集体、少数与多数、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确保了党中央对各地各级党组织的统一且坚强有力的领导。

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九章第六十条规定：“政府、工会、农会、合作社及其他群众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凡有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三人以上者，即成立党组。党组的任务，是在该组织的领导机关中指导党员为加强党的影响，实现党的政策而工作。”此后，党外组织设党组的原则和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此外，还有特殊情形设临时党组织。虽然党章并没有就设立临时党组织作出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早已存在并且经常出现。

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已经形成了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到基层组织的一整套科学严密的体系。

（三）织密组织体系之网

中国共产党的每个党员、每个组织，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得井井有条，无一疏漏，数百万党组织、数千万党员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组织整体。

这个组织体系的关键在中央。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这样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则天下之势一矣”。

这个组织体系的“中间段”是党的地方组织。其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令即行、有禁即止。

这个组织整体的“神经末梢”是党的基层组织，是直接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这个组织体系中还有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

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党组。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决策部署，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

这个组织体系的基本细胞是党员、“关键少数”是领导干部。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样的组织体系之网是科学严密的，是坚强有力的，是一种众志成城、无坚不摧的巨大合力。正是因为建立了严密有序的组织体系，我们党才能由一个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长期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

（四）没有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组织是靠不住的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至关重要，党的领袖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至关重要。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维护党的领导核心比什么都重要，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人民紧密团结起来，赢得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胜利。

党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一个政党有没有权威和核心，决定着党的事业发展的成败得失。一个政党的核心如果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则会带动全党走向成熟，凝聚力量和战斗力，并不断扩大党的影响，吸引优秀分子加入，从而推动党发展和前进，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反之，领导核心如果在领导力上有明显短板，即使有人才也会浪费，或者使人才离去；即使有正确的理论和纲领，也会因错误的领导而使之不能很好地实行甚至无法实行；即使已经存在的大好局面，也会因错误的领导而使之逆向发展。这样的事情，在国外历史上发生过。1871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①]失败教训时指出，没有能够形成众望所归的领袖核心，没能建立起力挽狂澜的权威领导，是导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上同样发生过。权威的形成和核心的确立，是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是在伟大斗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和博古，都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党中央，更没有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②]

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要释放党组织的组织力，就要坚持“船重千钧，掌舵一人”的组织原则，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这关系到是否能够将我们这么庞大的党组织体系牢固凝聚在一起。

三、基层组织坚强有力

基层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严密坚强之基，在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实践充分证明，基层组织不强，再庞大的组织体系也是“泥塑巨人”，一推就倒。

① 1871 年，由于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同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法国工人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推翻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巴黎公社，这是巴黎的广大无产阶级通过起义建立的政府，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但是巴黎公社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0 页。

（一）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

在三湾改编之前，已经成立达6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拥有一支独立的军事武装。我们党虽然整合和影响了一些国民党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党组织（支部）都是设在团一级。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就难以直接掌握士兵，团一级即使设了党的组织也难以掌握部队。可以说，我们党掌握或影响的叶挺部队、贺龙部队等之所以在三大起义中被逐次击溃，连一级没有党的组织，缺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问题不仅存在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在毛泽东直接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中也普遍存在。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秋收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合后，毛泽东否定“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把部队引向罗霄山脉建立革命根据地。当部队走到萍乡县芦溪镇时，遭遇敌军和地主反动武装的偷袭，部队伤亡1/3，部队士气低落，士兵不断逃亡、军阀习气严重。9月29日上午，起义部队翻越了大山口，来到一个群山环抱、没有地方反动武装的山塘里——永新县三湾村。

在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解决问题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由于敌军前堵后追，部队一路艰苦作战，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指挥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不健全。原本5000多人的队伍，这时只剩下不足千人。在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农民起义军就是这样溃散的。怎样把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建设成为党所领导下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认为，关键在于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

三湾改编中最重要的措施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爆发时，部队中党的组织是支部建在团上。起义军英勇作战、艰苦卓绝，但党的组织系统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掌握部队。为改变这种状况，毛泽东决定在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三湾改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虽然只剩700余人，但兵精将锐，面貌一新，作风严谨，战斗力强，部队经过短短休整后，于10月3日开始奔赴井冈山，陷入绝境的中国革命从此开始柳暗花明，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几十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通过三湾改编，伴随着“支部建在连上”，还有“班排设党小组”和“在士兵中发展党员”，规定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班有小组”拉近了共产党与普通士兵空间上的距离，共

产党自然成为士兵身边的组织。起义部队一改此前以军官为主要发展对象的做法，将普通士兵作为重点发展对象，拉近了共产党与普通士兵心理上的距离，士兵们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还是自己的组织。正因为如此，“支部建在连上”才会有效解决党对军队基层的领导问题。此后，这一制度很快推广到全军。正是因为党高度重视“支部建在连上”，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取得了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卫国防、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抗击自然灾害等方面，也发挥了坚强的柱石作用。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更加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广泛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工作重心的转移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对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又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一是拓展了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改革开放后，由于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种新变化，党中央明确要求在“两新”组织中建立党组织，并对党组织的设置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后，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不断得到扩宽，各地适应新的情况，创新组织设置方式和工作方式，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互联网企业、海外机构等领域建立党组织，在各类园区、楼宇、商圈、市场、街区、网格、合作社、流动党员集中点建立党组织，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不留盲区和空白点。二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功能作出了新表述。为了配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策的落实，

党中央进一步强调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而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职责是“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开始逐渐由行政功能、专政功能转向领导功能、政治功能与服务功能。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在此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先后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从而为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要健全基层组织，优化组织设置，理顺隶属关系，创新活动方式，扩大基层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可持续发挥作用的组织体系。提出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适应客观形势需要和时代发展趋势，适应组织发展目标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等，更是将基层党组织组建设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反“四风”问题，还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史教育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坚定了全党的理想信念，增强了全党的“四个意识”，并使基层党组织建设宽松软状况得到极大改变。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提出，更是将重点领域瞄向了基层党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制度化步伐加快。这些都彰显出基层党组织建设话语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已达 517.6 万个，遍布各个单位、各个角落。广大而健全的基层组织，把党员、干部和党的组织深深根植于群众之中，做到了“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成为把党的各项决策部署变成群众自觉行动的坚强战斗堡垒。

（三）把支部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很大程度上来自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支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抓好党支部建设是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是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是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中国共产党的100余年，也是抓基层支部建设的100余年。

建党之初，党的基层组织叫作“组”“小组”。党的二大党章规定，各级组织为“训练党员及党员活动之基本单位，凡党员皆必须加入”。党的四大将党的基层组织由党的“小组”改为党的“支部”。这是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把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今。党的五大在党章中将支部单独列为一章。1926年，党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1927年，毛泽东提出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党的六大提出，“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党的七大系统总结了党支部战斗堡垒思想，标志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理论上的成熟。党的八大正式提出“党的基层组织”概念和共产党员“八条标准”，规定了包括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的“八项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党的基层组织基本瘫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支部建设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支部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这一时期党支部建设主要是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恢复完善党支部基本规范，调整加强党支部制度建设。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党的八大党章的基础上，凸显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基层党组织提出的新要求。1986年2月，为适应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变化，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在乡建立乡党委，在村建立党支部，农村党支部组织形式也由原来按照生产大队设置改为按行政村设置。同年9月，党中央对企业党支部的功能定位、职责任务和工作方法等作出全面规范。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就开始探索如何在“三资”企业中建立党的组织并开展党的活动。党的十三大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确定了企事业单位党支部的职能定位。1988年，党中央印发《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规范了支部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成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至十八大前，这一时期党支部建设主要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建立和完善党支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探索推进新兴领域党支部建设。1989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建设这一重大任务，强调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核心作用。党的十四大党章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党在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和改进以党支部为重点的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战略思想基本形成。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外企基层党建工作迎来新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党加大在社会组织、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以及街道、社区中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力度，规定凡有正式党员三名以上的，都应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拓宽领域、强化功能”这一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十六字

方针。党的十七大强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赋予包括党支部在内的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新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要求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推动全党形成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良好态势。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基层党组织要严格履行监督职责”。2013 年以来，在全党先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党中央要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支部要担负好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2018 年 7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调“要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2019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这为新时代加强党支部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是党支部建设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首部关于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主干法规。

《条例》依据新形势新实践的要求，对新时代党支部的定位和作用作出深刻阐述，赋予党支部更加重要的使命和责任。一是明确了党支部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的定位。《条例》规定，“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这一概括表明党支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二是明确了党支部在社会基层组织和党的全部工作中的定位。《条例》规定，党支部“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这一概括明确了党支部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重要作用，要求党的工作要落实到党支部层面，发挥好党支部的重要作用。三是明确了党支部自身的职责定位。党支部既是党员锤炼党性的熔炉，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条例》规定，党支部“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这就明确了党支部在新时代的职责定位。

《条例》着眼于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把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光荣传统同体现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对党支部工作作出全面系统的规范。一是规范了党支部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条例》提出党支部工作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既反映了党支部工作的内在规律，也是党支部有效开展工作的指针。二是规范了党支部工作的运行体系。《条例》从组织设置、基本任务、工作机制、组织生活、党支部委员会建设等方面规范了党支部工作的运行体系。三是规范了党支部工作的领导和保障。《条例》对党支部工作的领导和保障作出具体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应当把党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定期研究讨论、加强领导指导，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这些规范之间互相依存、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工作链条。

《条例》紧紧围绕加强和改进党支部工作作出政治设计和整体安排。一是组织设置有新亮点。《条例》主动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组

织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的深刻变化，探索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要求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二是基本任务有新要求。《条例》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党支部的基本任务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进一步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功能作用有新划分。《条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根据不同领域党支部的实际情况，对其功能作用进行整合和划分，对其工作重点作出明确界定，指导和推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等基层党组织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

四、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党员干部只有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紧跟组织“节拍”，才能时时处处与组织同频共振，形成组织的强大力量。“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党员不断强化组织观念，党组织才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无往而不胜。我们党100余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党员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党的意识强、组织观念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就强，党的事业就生机盎然、蓬勃发展。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只有9900多万名党员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才能使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才能担负起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一）强化组织观念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重大课题

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强

化组织观念、严守组织纪律，既是回望走过的路得出的经验启示，也是必须践行的重大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这方面有许多经典论述。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就说：“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①] 1943年，毛泽东又说，“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②]

改革开放后，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③]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邓小平突出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守纪律”。他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④] 1988年至1989年间，邓小平多次强调，“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各行其是”，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他还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82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④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指出："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错误就从这里犯起"。①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组织观念问题。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强化程序观念，该报告的必须报告，该打招呼的必须打招呼，该履行的职责必须履行，该承担的责任必须承担，少些"迈过锅台上炕"的做法，也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要有担当意识，遇事不推诿、不退避、不说谎，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勇于承担责任。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② 2017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指出："看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站得稳、靠得住，最重要的就是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0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页。

何折扣，不要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①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②

所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个人与组织的内在关系，深刻揭示了组织观念的内涵和要求，深刻阐明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强化组织观念对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为党员干部强化组织观念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上述论述中不难看出，组织观念与党的意识本质上是一个意思，就是党员对党组织的认知和态度，主要体现为对党的纲领、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党员责任等的认知和态度。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所强调的组织观念具有特殊意蕴。

党的意识、组织观念是政治观念。我们党是有着共同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的政治组织，是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的根本要求，是对党员的本质规定，也是党的意识、组织观念的核心内容。

党的意识、组织观念是责任观念。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们党的政治宣示，也是身为党员的政治责任。100余年来，一代代共产党人牢记这个重大责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6页。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使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党的意识、组织观念是担当观念。就是要切实增强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在需要时刻敢于站出来、重要时刻敢于顶上来、关键时刻勇于冲出来，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时刻以身作则，为普通群众树立榜样。

党的意识、组织观念是纪律观念。我们党是按照严格的组织纪律建立起来的党，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时时守纪律、事事讲规矩是天职。必须切实增强纪律观念、纪律意识，真正做到将党的纪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带头严格执行纪律、遵守规矩，时刻提醒自己、管好自己，做到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党的意识、组织观念是身份观念。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全党同志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历史上，无数先辈先烈视共产党员为光荣称号，勇于亮明身份、模范带头，在群众心中树立起一座座丰碑。这样的身份属性必须始终牢记于心。

（二）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词

入党誓词是党对党员要求的精华和浓缩，是党员对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每一名党员的责任与义务的体现，是党员强化党的意识、组织观念的终身守则。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不是虚化的空洞的而是实在的具体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自觉践行入党誓词。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曾说过，入党誓词字数不多，记住并不难，难的是终身坚守。每个党员要牢记入党誓词，经常加以对照，坚定不移，终生不渝。

我们党的入党誓词并不是建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应运而生的。我们党现在的入党誓词是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当时通过的党章首次对入党誓词加以统一，并沿用至今。

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份入党誓词是由毛泽东撰写的。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很快，起义部队就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改变了原先攻打长沙的计划，带着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南移，并在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改编。

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赖毅回忆："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重的考验。"面对此种情况，毛泽东经过深入调查，决定在连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并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力发展党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意通过举行入党仪式来加强对新党员的党性教育。

1927年10月，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亲自主持了6名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毛泽东带着新党员宣读了他亲自撰写的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宣誓的6个人分别是陈士榘、赖毅、刘炎、欧阳健、李恒、鄢辉。

水口入党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并照这种方式组织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

毛泽东这个版本的入党誓词，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实物，这也是它被确定为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入党誓词的重要原因。

这份入党宣誓书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是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文物。入党宣誓书的中间是入党誓词，从右向左分别是："牺牲个

人，言（严）首（守）纰（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正面上方写着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CP”；右侧的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员贺页朵，地点为北田村，左侧是时间，写着1931年1月25号。

入党宣誓书的主人公贺页朵是江西永新县北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工作为掩护，帮助红军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站，负责收集和传递情报。由于表现出色，永新县党组织决定吸收其入党，并为他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因为识字不多，他亲手制作的入党宣誓书中短短24个字的入党誓词中出现了6个别字，但这并没有掩盖贺页朵坚定的革命信念。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永新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宣誓书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革命老区慰问时，贺页朵才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交给了慰问团负责人。

1956年，谢觉哉在博物馆看到这份入党宣誓书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提道：“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的……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贺页朵的入党誓词，与毛泽东所写的入党誓词相比，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服从组织”变成了“服从党纪”，顺序上略有差异。显然，贺页朵的入党誓词就是从毛泽东版本的入党誓词演变而来的。

入党誓词为什么要强调“永不叛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遭到大肆屠杀，党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同时，由于大革命的失败，党内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在白色恐怖下背叛革命，给我们党造成了巨大损失。面临着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入党誓词就格外强调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成为党员加入党组织最重要的承诺。

参与1927年那次水口入党宣誓的6人，成为革命队伍中第一批在连队中培养起来的工农党员。此后，无论斗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险恶，他们都勇敢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入党誓言。6人中，有的在战争中牺牲，有的因病去世，陈士榘、赖毅2人成为开国将军。长征途中，陈士榘奉命在赤水河上架桥，成为红军“四渡赤水”的开路先锋。新中国成立后，陈士榘又率领10万官兵进军大西北戈壁滩，建设导弹发射基地和核试验基地。陈士榘曾这样回忆入党的那一刻：“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使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同样，忆起那个简陋而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那24个字的入党誓词深深刻印在赖毅内心最深处，他说：“从那天起，我像变了一个人。我告诫自己，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

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入党誓词几经调整和修改，但作为一条铁的纪律，“永不叛党”贯穿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的核心内容。

从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到千难万险的长征路，从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从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

整的英勇斗争到抢险救灾、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顽强拼搏，再到无数普通岗位上的知重负重、默默奉献，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在一起，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践行“永不叛党”的誓言。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永不叛党”的忠诚凝聚而成的坚强严密的组织体系。

第十章
自我革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离不开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时也说过：“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②] 这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与自我革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自我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一、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在自我革命的淬炼中锻造出来的

自我革命的概念虽然是新时代明确提出的，但自我革命的思想和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77页。

②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日报》2019年1月12日。

实践却是贯穿于党的全部历史之中的。在持续的全面的自我革命的锤炼中，党锻造出了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建者，为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最基本的哲学方法论，揭示了事物的自我扬弃，即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内在机理，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要积极主张清除无产阶级政党中不正确的思想，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极其重视党员质量，提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想。他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非常警惕，一再提醒执政党的党员不要蜕变成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官僚主义者。斯大林高度重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出如果党掩饰自己的缺点，自己感到满足和欣然自得的话，那么党就要衰亡。相反地，党如果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它就能成为不可战胜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反复提出自我革命的要求。中共一大党纲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同时，表达自我革命政治决心，“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

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①]。这一规定，萌发了思想革命的内涵。1923 年 6 月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相关文献出现了“批评”的概念；1928 年 7 月，《中央通告第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创造无产阶级的党和其主要路线》鲜明地提出“自我批评”的要求。所有这些说明，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了自我革命的基因。

（二）党始终重视并践行自我革命

党的自我革命从建党就开始了，而且一以贯之地重视、全面有效地践行，始终没有间断过。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提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②] 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比喻，首次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明确地提了出来。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发生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③] 这些论述和要求，实际上都是说的自我革命，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和经验的深刻认识和精辟总结。离开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党不可能一次次纠正右的和“左”的错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新的条件下，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3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4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3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 年 10 月—1966 年 5 月）》第 16 册，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0 页。

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党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虽然由于复杂原因，先后出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坚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来改造和锤炼自己，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并使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解放军得到壮大和提高，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邓小平率领全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革命，完成了自身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并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序幕。此后，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相继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我国发展新要求出发，一以贯之地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全面部署，并召开多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改革发展稳定重大工作。为了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党坚持进行自我革命，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行

了持续努力。没有党的自我革命，中国不可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大踏步赶上时代。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达到一个全新的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从强化党的作风建设着手，以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动员令和切入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和阐发党的自我革命。2017 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发表了重要讲话，对“自我革命”进行详细阐述，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在此前后，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 2018 年 1 月 5 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 2019 年 6 月 24 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在 2020 年 1 月 8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在 2021 年 1 月 22 日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在 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在 2021 年 11 月 11 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

讲话中，在2022年1月1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都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论述和阐发。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告诫全党："如果缺少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党就将陷入危险境地，做不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葆青春。"① "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②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豪迈地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他谆谆告诫宣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软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实践充分证明，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进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法宝。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天生的，更不是轻轻松松能够永久保持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的伟大不

①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并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人民日报》2019年7月18日。

②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求是》2022年第1期。

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和强大领导力，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100余年来，党历经百余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其奥秘就在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正是持续不断的、全面的自我革命，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时适应外部环境变迁。由此，中国共产党有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能量，党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得以持续锻造。

（三）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最大优势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党的最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是党长盛不衰、永远风华正茂，赢得时势人心、创造人间奇迹的内在源头和独特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延安时期，黄炎培与毛泽东就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有过一次交谈，史称"窑洞对"。黄炎培说，他听到过、看到过很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事，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段经典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探讨，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同时根据党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就是说，党要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要依靠“两大密钥”：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2024年1月，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样推进自我革命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推进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即：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不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把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严密，把每条战线、每个环节的自我革命抓具体、抓深入。

（四）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的底气在哪儿

自我革命，即以自身的力量革除自己在观念上、体制上、行为上等方面存在的各种毛病和弊端。相对于社会革命是革他者的命来说，自我革命的难度要大得多。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底气到底来自哪里呢？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省传统，如《论语》的“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更是耳熟能详的自省方法。如《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等，都在时刻提醒自我反省。至宋明后，自省传统进一步发展，王阳明曾言：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要求时刻以是非善恶来警醒自我。中华文化中的自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我们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坚定继承者与真正发扬者，从建党之日起就把中华民族深远悠久的自省传统作为政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其转化到勇于自我革命、勇于着力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政治坚守上。

除上述外，还来自五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基因赋予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高远志向和鲜明政治担当，不仅要以实现阶段性的历史任务为目标，更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这种政治基因赋予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勇于推进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也勇于推进改造自身的自我革命，敢于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对自身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

第二，人民立场奠定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坚持对的，发扬好的；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第三，对初心和使命的担当锻造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在百余年的风雨沧桑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不断用自我革命的实际行动来坚守初

心、彰显政治品格、践行使命宗旨。

第四，百余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给予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①] 党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五，不断“赶考”的忧患意识激发自我革命的底气和勇气。面对历史周期率的忧患，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赶考”的状态来应对。但是，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赶考”永无止境，自我革命亦永无止境。

二、持续全面地解决自身问题

自我革命的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讳疾忌医、有病不治，本来可以医好的病症就会拖成不治之症。对党的问题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古人说：“惟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在长期推进社会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就是以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始终

①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 页。

做到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不足，做到知耻而后勇，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决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不断应对好自身在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风险考验，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一）党一成立就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党在幼年时期，就对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并以各种方式自觉清除体内的“毒瘤”。

1. 1922 年安源党支部解决官僚习气、挪用公款等问题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安源就成为湖南党组织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1922 年 2 月，中国产业工人的第一个党组织——安源党支部成立，同年 5 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以下简称俱乐部）成立。1922 年 9 月，在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老一辈革命家精心策划和组织下，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并取得胜利，被邓中夏评价为在全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取得了“硕果仅存”的完全胜利；刘少奇则评价说是做了一件“绝无而仅有的事”。

大罢工的胜利使俱乐部迅速壮大，成员一度从 700 多人增长到 1.3 万多人，上缴的部员费急剧增加，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俱乐部演讲大楼等内部机构和场所相继设立。这样一来，俱乐部日渐庞大，常设办事机构主任团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又有了一定数额的资金，逐渐出现了官僚习气渐盛、管理失职混乱、侵吞挪用公款等腐败现象。这一系列问题，使得俱乐部在工人中的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

这种情况下，以刘少奇、李立三、毛泽民、朱少连等为代表的党组织在领导社会革命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进自我革命，果断领导俱乐部开展了“八月整顿”。

“八月整顿”的基本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包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惩贪腐行为，杜绝为谋私利而损害大众利益；加强建章立制，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开展审计和信息公开，发挥监督作用。这些工作，自始至终贯穿着“从严治党”精神，开创了党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自我革命的先河。通过这些工作，及时将党内的风气扭转过来，保证了俱乐部之后的全盛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2. 1923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解决党员违纪问题

1923 年 2 月，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工人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使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达到了顶点。这次大罢工遭到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二七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共 52 人，受伤者 300 余人，被捕者 60 余人，1000 余人被工厂开除，流亡在外。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界和共产国际募集了一批捐款，党组织在京汉铁路工人中成立了济难委员会，专门管理这些捐款，用于救济失业工人和在二七惨案中遇难、被捕的工人家属。但由于缺乏有力监管，济难委员会发生了负责人张连光卷款潜逃和张德惠贪污侵吞救济款的事件。一些信仰动摇的党员，也趁机勾结工贼散布谣言，对党恶意中伤。

为严肃党纪，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3 年秋改组了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同时，对违纪党员进行纪律制裁，会议决定：“郭平伯、

郭寄生、周无为、张子余四人，执行大会决议，开除党籍；张绍康，陈天均已登报脱离，亦应开除”；“胡鄂公在未能证明其确未帮忙贿选以前，仍旧停止出席小组会议；熊得山、汪剑农因与胡有连带关系，亦应同样办理”。

3. 八七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问题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会议检讨和反省过去的工作，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①

在检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八七会议制定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此次会议还对党的组织进行优化，吸收了新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工农分子，实现了“再造党”，“党的灵魂和躯壳”都换掉了。

4. 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解决党的思想不纯等问题

1927 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后，农民成分的党员逐步增多。为了使其成为合格的工人阶级政党，毛泽东提出了思想建党原则，提出“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并通过举办党团训练班、整训、会议等途径，“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②。并于 1928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第236 页。

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38 页。

年厉行“九月洗党”，对边界党组织进行整顿。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中的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第九次全军党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确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会议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①]。为此，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纠正单纯军事思想、极端民主化思想、非组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主观主义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思想等错误思想，不断提高党内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每个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

古田会议后，党更多地创办干部教育培训机构，有系统地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有效地清除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党在中央苏区开始局部执政以后，针对执政中发生的腐败变质行为，党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建立了相关制度，开启了肃贪风暴。

（二）党成熟后更是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1935年党召开的遵义会议，批评并结束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党走向成熟。成熟后的党更是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

1. 延安整风开创以党内集中教育形式解决党内问题的先河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5月，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为标志，至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在整风中，毛泽东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营造了与人为善、团结同志，同时又敢于批评、帮助同志的良好局面，有力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化。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25日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对这场运动予以高度评价：“延安整风就是集中行动，使全党端正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破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明确了今后努力方向，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延安整风后，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相继在全党开展了集中教育活动，有效解决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急需解决的问题，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对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发挥了重要作用。

2. 以历史决议形式分析和反省党犯过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由于一些原因，在革命过程中犯过右的或“左”的错误，在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后，党对中国的革命规律有了全面深入的掌握。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分析和反省了1927年至1937年这10年犯过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作出正确定论。这个决议不仅从史实和理论上厘清了党走过的路程，汲取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而且突出强调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坚持真

①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26页。

理，修正错误”等自我纠错自我革命的理念和方针。在其后召开的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党的七大以后，制度化、系统化的自我纠错自我革命意识与机制在党内渐成常态，蔚然成风，成为党的组织肌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严重错误。党在1981年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党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成功和失败、正确与错误进行了反复比较，其对自身历史经验的认识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总结道：“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①] 更难能可贵的是，由此开始，党对自身错误的反思和纠正逐渐摆脱运动方式。如决议中所说，党不仅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那样严重的错误。主动的、科学的自我纠错自我革命机制，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自觉，党的自我纠错自我革命能力和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境界，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即第三个历史决议）

①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中，“坚持自我革命”被归纳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

3. 以组合式综合式方式方法解决党自身的各种问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党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更加主动、更加科学，手段日趋丰富，能力日益增强。

这首先表现在，解决党的各种问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明确提出并坚持“四个自我”即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个自我”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药动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强身之举。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就是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古人云：“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也；犹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当治也。”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在自我完善上下功夫，坚持补短板、强弱项、固根本，防源头、治苗头、打露头，堵塞制度漏洞，健全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就像人一样，身子弱了就要补，免疫力下降就要加强。如果不管不顾，身体就会每况愈下，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就会追悔莫及，正所谓“蚁穴不填，终将溃堤”。在自我革新上求突破，深刻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在自我提高上下功夫，自觉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全面增强执政本领。

这也表现在解决党的各种问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持组织层面上的目标导向和多种方式的结合。所谓组织层面上的目标导向，即

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号召力。这一目标在新时代还有一个“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形象说法。怎样才算自身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所谓多种方式的结合，首先是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也解决制度问题，实施以德治党和依规治党双轮驱动，注重内在约束与外在规范的相互贯通，自律和他律相统一，把高标准和严约束相融合。此外，还有坚持“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相统一、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加强党内监督和接受人民监督相结合、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协同推进等。

这还表现在解决党的各种问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注意处理好若干关系上。一是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解决党内问题相统一，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斗争，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勇气，但不能因为党内存在问题就削弱甚至否认党的领导，走到自断股肱、自毁长城的歪路上去。二是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守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初心使命不动摇，同时要以新的理念、思路、办法、手段解决好党内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三是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统一，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捆住一些人乱作为的手脚，放开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手脚，把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形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四是坚持组织推动和个人主动相统一，既要靠各级党组织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又要靠广

大党员、干部自觉行动，主动检视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不断增强政治免疫力。

三、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

解决党的问题必须持续全面，包括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方面的问题，但也要有重点，那就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长期解决不好，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来看，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历来是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形象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这两个方面问题愈加突出，成为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一以贯之注重解决的问题。

（一）持之以恒推进反腐败斗争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严惩腐败作为自身一贯坚持的政治立场，党的百余年历史也是一部党为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反腐倡廉的历史。

党成立之初，就清醒认识到腐败的危害性，及时开启反腐败斗争。1926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反腐文件，拉开了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序幕。1927 年，选举产生了党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监察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反腐败斗争开始在体制上有所依托。

中央苏区红色政权建立初期，反腐肃贪就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

任务列入议事日程，从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党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运动。其间先后查处了几起贪污腐败大案，包括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被处以枪决，并没收其个人一切财产。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被判决死刑，中央苏区“惊天第一案”于都县集体贪污窝案的4名贪污犯被判处死刑，其他犯罪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警醒党内同志，提防“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边区党委、政府还高度重视制定法律法规，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威慑和惩治。1939年通过并颁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以法律形式权威地规定，凡贪污1000元以上者均处以死刑。尽管党委和政府三令五申，尽管党的领导人常常提醒，可还是有一批干部贪污腐化，肖玉璧贪污案就是其中一桩震动边区的大案。肖玉璧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他资历老，战功多，据说因作战而留下伤疤数十处，称得上是一位对敌斗争英勇的优秀革命战士，他1933年4月参加革命，曾任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贸易局副局长，案发时任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共贪污公款达3050块大洋。当时，陕甘宁边区一般工作人员每月的津贴为1元到15元，肖玉璧贪污3050元就相当于一般工作人员2000多个月、160多年的津贴收入。这成为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一起大贪污案。陕甘宁高等法院检察署经侦查终结，认为证据确凿，向边区高等法院提起公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理后判处其死刑，1942年2月执行死刑。肖玉璧被判处死刑后，曾写信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坚持原则，表示“我完全拥护法院的判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腐败毫不容忍的鲜明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转移到全力领导和平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敏锐地意识到，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变化，使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当时，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450万名党员的大党。部分新党员、新干部缺乏思想教育和党内政治生活锻炼，部分老党员、老干部革命意志衰退，滋长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部分地方还存在党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在整党进行过程中，全国同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及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天津地委原书记刘青山、天津专区原专员张子善贪污案就是“三反”运动“打老虎”的典型案例。刘青山、张子善都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的老干部。二人进城后，却经受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大肆利用职权贪污公款，腐化堕落蜕变为人民的罪人。最终，党中央批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曾有人以二人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由替其说情，毛泽东的回答是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全国范围内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投机诈骗、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等严重犯罪活动明显增多，且犯罪活动大多与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有关，党中央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从1982年到1986年，一场全国范围内打击经济领域

犯罪活动的斗争全面展开。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因利用职权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被执行死刑。他成为改革开放后在打击经济犯罪中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执行死刑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时代特征，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针对腐败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甚至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1993年党中央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从十四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开始，每年中央纪委召开部署工作的全会时，党的总书记都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工作部署和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进反腐败斗争，意志品质顽强、领导坚强有力。2012年12月6日，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成为党的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一位省部级干部，当时就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党的十八大期间的5年共有440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8900余名厅局级干部、6.3万名县处级干部，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受处分，追逃3453人，48名“红通人员”落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党心民意，向腐败问题坚决亮剑，赢得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国际广泛赞誉。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比例，由2012年的75%增长至2017年的93.9%，提高了18.9个百分点。这表明，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也是在争取民心上的压倒性胜利。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强调：“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多次强调，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二）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作斗争

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十分无用。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觉得“泥塑的神像”比喻太笼统，专门写了一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列举了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老爷式的官僚主义、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等。毛泽东还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此后，党中央提及官僚主义时，往往伴随着形式主义。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谈道，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随后，党中央下发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文件。2001年，党中央召开十五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官僚主义引发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事业发展的一大祸害。”为了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和人民事业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警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并坚持不懈与官僚主义、形式主

①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确保“十四五”时期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21年1月23日。

义等不良风气作坚决斗争。

早在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防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22 年 7 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其中就已经包含着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警惕。1927 年四五月间，党的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明确提出工人领袖存在官僚化的危险。

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并没有经验，难免出现一些问题，尤其是领导机关出现了脱离基层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① 毛泽东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1934 年 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印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期通过发扬先进经验、推广优秀典型，克服苏维埃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此外，中央苏区还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参加生产劳动，颁布惩治官僚主义的条例，坚决撤换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

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和党员数量获得很大发展，在抗日根据地开始局部执政过程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开始滋生。毛泽东对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4 页。

种情况高度重视，他说：“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① 党通过发动整风，确立调查研究制度，提倡科学的领导方法，实施精兵简政等方式进行了坚决整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是高度警惕。1952 年，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立场鲜明地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1960 年 3 月，毛泽东又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这一份党内指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所谓“五多五少”，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经过整治，“五多五少”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解决。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仍然是危害我们事业的恶劣作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全党同官僚主义展开了坚持不懈的斗争。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他列举了官僚主义的 24 种表现和危害，对官僚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3—935 页。

江泽民领导全党制定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第五条就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指出形式主义的要害是贪图虚名，不务实效，劳民伤财。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他领导全党采取许多措施，努力“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顽症”。胡锦涛针对党内的官僚主义陋习，痛心地指出：“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一些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一些本来可以缓解的矛盾进一步恶化。”他多次强调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持续深化“四风”整治。在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下，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多次作出指示，党中央印发通知明确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提出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签“责任状”等一系列硬举措，切实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精准施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法，让广大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一线工作之中，他还强调，要持续为基层减负，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资源真正用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来。

（三）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因此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既要坚持“打虎”无禁区，也要坚持“拍蝇”零容忍，重视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坚决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亮剑，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2017年12月，中央纪委发布《关于2018年至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部署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扎实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专项治理从2018年开始，一直推进到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任务，之后还要不断深化治理成果，推动巩固脱贫成效。这次专项治理，重点要治三个方面：一是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腐败问题。把农村低保、危房改造、易地搬迁、产业扶贫、对口帮扶以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作为监督检查重点，对贪污侵占、行贿受贿、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挥霍浪费、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依旧严惩不贷。二是相关责任落实不力的问题。地方党委、政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履行主体责任不力，态度不坚决、工作不扎实、敷衍应付，相关职能部门履责不力、监管不严、推诿扯皮，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要严肃追责。三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盲目决策、弄虚作假、数字脱贫，扶持对象、措施到户、脱贫成效不

精准，以及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虚假“摘帽”，也要严肃处理和坚决纠正。从2018年4月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开通“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曝光专区”，地方纪委监委网站也纷纷开通曝光专区。实践证明，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发挥作用明显，既强化了压力传导，又推进了责任落实。近年来，又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过渡期专项监督。紧盯乡村振兴重点规划、工程项目，严肃查处工程建设、融资平台等领域腐败和不正之风，推动解决资产底数不清、产权责任不明、监管问效不力等问题。仅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腐败和作风问题1.9万个，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7万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7万人。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吹响了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的号角。近几年，坚决查处涉黑涉恶腐败，严肃惩治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干部，推进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常态化，通报曝光典型案例。仅2021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9931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9569人，移送检察机关1037人。

近年来，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民生领域投资持续加大，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民生领域“蚊蝇”式“微腐败”现象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19年以来，面对民生领域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尤其是教育医疗、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贪污侵占、失职渎职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加大了整治力度。2023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754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5366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8695人。查处的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3类问题，分别占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的42.1%、23.8%、15.3%。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

解决党的各种问题，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通过推进党的建设和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实现的。党的建设进行得好，党的自我革命就好，党就能保持纯洁性先进性，党的领导力就强，党的领导就坚强高效。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党建维度讲，就是一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我革命史，就是一部勇于刀刃向内、不断炼就“打铁必须自身硬”功夫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推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才能保证党的自我革命持久有效，才能保证持续锻造和提升党的强大领导力。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和推进党的建设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具有强大领导力？最关键、最根本的在于其自身这个内因，在于其能不能搞好自身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①]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在“三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0页。

大法宝”的有机统一体中，党的建设是党实现对中国革命领导的根本保证，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则是党所掌握的两个武器。由此可见，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能动的关键一环。毛泽东历史性地把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这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目标要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是为建设一支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断自我革命、不断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个伟大工程的不断推进，为夺取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继承发扬“伟大工程”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党的十五大提出，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今天我们回过头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是不断自我革命、不断解决自身问题，以成功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巨轮乘风破浪前进的过程。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伟大工程”置于“四个伟大”之中，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清醒和坚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自我革命，从作风建设开始全面解决党自身的各种问题，努力实现“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彻底扭转了以往那种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不力、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呈现出全新气象。在这个过程中，党建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2022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提“五个必由之路”。其中，“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最新论断。

（二）把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根本保证

管党治党其实是党的建设的另一表述。1962 年底，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刘少奇在主持召开组织工作座谈会时强调：“健全组织部就是说党要管党。”1963 年 1 月，中共中央对《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纪要》的批示中指出：“党要管党。党的建设，是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也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法宝之一。”①

关于怎样管好党治好党，把党建设好，在长期实践中党提出了从严的要求。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将“从严治党”首次写入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经验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总结。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92 页。

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十六大党章首次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总纲。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其丰富内涵诠释了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全体党员、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职责；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勇于执纪问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①

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党的十九大召开。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十九大党章修正案五次出现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总纲部分首次写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化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治党”，并且将其纳入党的建设基本要求。在具体的条文部分，十九大党章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分别阐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任务和党组的任务时，也都强调要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首次写入党章。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在总纲第三十一自然段，将“强化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修改为“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所有这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

党章是我们立党、治党、管党的总章程、总依据和总遵循，是其他党内法规的“母法”，是党内具有最高权威和最强约束力的根本大法，其他党内法规是党章在具体领域的细化和延伸。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就从源头上根本上保证了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只要全党不断增强党章意识，牢固树立党章权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深入推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也就在其中了。

（三）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并上升到制度机制层面

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六条宝贵经验，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六个统一”的宝贵经验，不仅深化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而且对引领新时代党的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和意义。

2022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他指出，100余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这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必须”深刻阐释了坚持自我革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联系和内在机理，用“九个坚持”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了进一步阐释。

2023年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并且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和方针，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一大法宝。强调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在这个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党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验，深刻阐释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7个方面的丰富成果和5个坚持的新要求。

7个方面的丰富成果，即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始终摆在首位，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修复政治生态，推动全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实现党的团结统一。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使党员、干部补足精神之钙，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以作风建设新气象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全面从严，

以严明纪律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让党员、干部切身感受到党的严管和厚爱。把制度建设贯穿党的各项建设，与时俱进完善党章，聚焦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制度创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搭建起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四梁八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开展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查处一大批腐败分子，消除党内严重政治隐患，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5个坚持的新要求，即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就要构建到哪里，无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都要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局限于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对象上全覆盖，面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做到管全党、治全党，重点是抓好“关键少数”，管好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把手”，在管党治党上没有特殊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坚持责任上全链条，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让每名党员、干部行使应有权利、履行应尽责任，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压力层层传导，责任环环相扣，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感使命感，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坚持制度上全贯通，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六个必须”“九个坚持”“七个方面丰富成果”“五个坚持”都是党在新时代推进自我革命的宝贵经验，是对党推进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的深化。

只要我们深刻认识这些经验和规律，并按照党的二十大的要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逐步将其上升到制度机制层面，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也就在其中了。

（四）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

党委是不是真管党建，党委书记是不是真抓党建，党委班子成员是不是履行党建责任，是关系到能不能管好党治好党的关键问题。然而，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连发“三问”振聋发聩，强调“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向全党发出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动员令”。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为党的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遵循，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发挥其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作用。2019年重新修订该条例，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章为根本遵循，

把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原则和首要任务，聚焦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严字当头，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责不力、泛化简单化等问题，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各省区市党委和纪委、中央部委党组（党委）和纪检组建立健全约谈函询、述责述廉等制度，制定落实责任细则和问责条例实施办法，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论述，紧紧抓住落实党建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全部工作之中，保证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很好效果。

新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保证党的自我革命有力有效，必须抓住落实管党治党责任这个“牛鼻子”。如果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就难以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总的来说，从多方面努力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才能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也才能不断提高党长期执政的能力，锻造和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这才是中国共产党无往不胜的领导力密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以中国梦点燃14亿多人民内心的蓬勃之火，领航中国步入了新时代。然而，前路绝非一片坦途。如何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更考验着领导者的责任担当。“打铁还需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自我革命的力度，有力、有效地纠正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薄弱问题，把对人民的

责任、对党的责任，落实到使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领导力的大提升，不仅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也带来全党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的信心和更加坚定的“四个自信”，中国人民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展望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惊涛骇浪，还是要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持续锻造党的强大领导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5]《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0]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1]《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2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25]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

[26]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27]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8]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29]《坚持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把作风建设要求融入党的制度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7月1日。

[3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3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2]《〈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33] 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3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

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1949—978），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36]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012 年版。

[3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版。

[38]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 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

[3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版。

[40]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年版。

[4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4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

[4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45]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

[4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47]《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法规制度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6 年版。

[48]《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年版。

[49]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5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年版。

[51]《孙中山全集》第 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52]《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53] 魏源：《海国图志》，岳麓书社 1998 年版。

[5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55]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读者出版社 2021 年版。

[56]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57] 何毅亭等：《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奥秘与中央党校》，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

[58] 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年版。

[59] 杨春贵主编：《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60] 甄占民主编：《长青之道：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 年版。

[61] 谢春涛：《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新世界
版社 2016 年版。

[62] 晋乾泰：《中国共产党纪律学》，红旗出版社 1993 年版。

[63] 张英伟：《党章中的纪律》，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5 年版。

[64] 郭迪润、唐铁军：《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现实·要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65] 李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版。

[66] 何增科：《廉洁政治与国家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
版。

[67] 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68] 张士义、刘志新、洪向华：《新时代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共党史出版社 2018 年版。

[69] 任仲文：《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
版。

[70] 王炳林：《大国追梦》，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

[71] 赵理文主编：《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2014 年版。

[72]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正定》，中共中央党校
版社 2019 年版。

[73] 王毅：《讲党课：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人民日报出版社
019 年版。

[74]《中国精神》编创组编著：《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奋
故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0 年版。

[75] 李建强主编：《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年版。

[76] 夏春涛：《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

[77] 李君如：《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

[78] 辛鸣：《着力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和战略定力》，《人民日报》2017 年 9 月 13 日。

[79] 齐卫平：《党的作风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7 期。

[80] 李蕊：《中国共产党榜样教育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

[8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求是》2021 年第 14 期。

[82] 齐卫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逻辑》，《红色文化学刊》2018 年第 4 期。

[83] 杨俊：《论“党的规矩”和“党的政治规矩”的基本内涵和简明定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 年第 6 期。

[84] 崔若曦：《十九大报告对党的纪律建设的制度创新》，《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8 年第 3 期。

[85] 刘卫东、王建华：《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生成动因与实践要求》，《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9 年第 1 期。

[86] 任建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意义、要义及对策》，《贵州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87] 杨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性纪律性》，《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 年第 3 期。

[88] 王同昌：《十九大对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部署与创新》，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3期。

[89] 任晓伟、刘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征服困难的历史验及其时代创新》，《理论与改革》2021年第1期。

[90] 朱仁印：《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历史经验》，《中国党政干部坛》2018年第6期。

[91] 王锁明、李欣：《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至关重要》，《唯实》018年第3期。

[92] 刘先江、刘静：《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百年探索的基本经验》，《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期。

[93] 吴建雄：《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百年回望及经验启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94] 刘洁、王雯姝：《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思想的提出时代内涵》，《理论视野》2019年第6期。

[95] 何虎生：《增强核心意识，树立核心权威》，《人民论坛》016年第33期。

[96] 何建辉：《论党的领导核心的确立及其特征》，《江南大学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97] 杨志玲、赵立永：《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制度保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期。

[98] 顾训宝：《执政为民视角下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逻辑分——学习习近平有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论述》，《中共济南市党校学报》2021年第1期。

[99] 樊得智、杨世伏、苏奔、张法娟：《把抓好党支部作为管党治党基本任务——党支部建设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党建研究》2018年第12期。

[100]《全面从严治党要把纪律挺在前面》，《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4月28日。

[101]《构建统筹联动的权力监督格局——推进纪律、监察、派驻、巡视四个监督全覆盖的实践与思考》，《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6月28日。

[102] 徐庆全：《习仲勋与改革时代》，《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10月21日。

[103] 熊若愚：《把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到实处》，《学习时报》2020年3月23日。

[104]《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正式发布》，《人民日报》2021年9月30日。

[105] 王志伟、王九龙：《97.7%受访青年认同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受访青年感到无比敬佩的精神有长征精神、抗战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中国青年报》2021年9月23日。

后　记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学术研究类）“中国共产党百年领导力研究”课题（批准号为21STA009）成果。本书由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组织编写，冯秋婷担任本书主编，拟定了全书的框架、提纲并进行了多轮改稿、统稿。各章作者如下：第一章，程冠军；第二章，雷强；第三章，李少军；第四章，代江波、吴小雪；第五章，桑丽；第六章，张国玉；第七章，王世谊、晏俊杰；第八章，郑寰；第九章，江文；第十章，张磊。程冠军、李少军参与了本书组织联络工作，樊克克对全书引文、注释、参考文献作了核对规范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每一位作者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因各种原因书中难免有疏漏与不足，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冯秋婷

2024年5月11日

中国共产党
领导力密码

ISBN 978-7-5035-7786-4